

目 录

一九八三年六月

第三期（总期5期）

革命回忆录

抗日战争期间的一段回忆……………赵健民（1）

毛泽东同志交我带到聊城致范筑先将军

亲笔信的回忆……………黎玉口述（40）

李士钊笔记

转战在鲁西北……………李聚奎（49）

战斗在卫河两岸……………王化云（53）

鲁西北抗日游击第一支队的创建与斗争……………周乐亭（85）

译文选登

在孔夫子故乡的战争……………（美）伊·福·卡尔逊

李士钊译（95）

鲁西北抗日根据地……………（日）马场毅 梅风译（134）

日记节选

《陈赓日记》节选……………陈 赓（148）

马景汉笔记摘抄……………马景汉（174）

人物传记

- 我们的好政委肖永智同志许 法 (203)
怀念宁都兵暴的发起人刘振亚同志袁血卒 (215)

党史资料

聊城地方党组织一二战时期

- 发展演变概况谢玉林 吕保明整理 (225)
聊城地区第一、二战时期党员统计表 (249)
中国共产党几个时期党员人数 (251)

抗日战争期间的一段回忆

(一九四〇年十月——一九四二年二月)

赵 健 民

一、大连寨之战

一九四〇年九月，我所在的八路军一二九师新编第八旅（该旅共有三个团，即：二十二团、二十三团和二十四团），奉命到冀南三分区（该分区在邯郸以东，威县以南的鸡泽、临清、临西、曲周、永年、肥乡、广平、邱县和馆陶县境内）集结整训，寻机打击敌人。在这次全旅集结前，我们这个部队都是以营为单位，分散在卫河以东的鲁西地区同敌人进行周旋的。有时，偶而也以团为单位进行一些活动，但为数很少。象这次全旅三个团集结在一个地区进行活动还是第一次。干部战士初次见到这种场面，无不欢欣鼓舞，个个摩拳擦掌，求战情绪很高。

那时，冀南三分区所属各县都驻有日军。邯郸是日寇的大本营，主要有日军独立第一混成旅团。在大名，驻扎着该旅团的一个联队。在曲周、永年、广平、肥乡和鸡泽县，各驻扎着该旅团的一个中队。在馆陶、临清和邱县，各驻扎着日军驻山东聊城独立第十混成旅团的一个中队。日寇仗着先

进的武器装备和占据各县城，以及公路沿线重要城镇的有利条件，常向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特别是驻邯郸的日本独立第一混成旅团，经常组织日伪军向我抗日根据地发动突然袭击。有时，独立第一混成旅团和独立第十混成旅团，同在华北方面军冈村宁次司令官的指挥下，也不断向我抗日根据地实行疯狂的大扫荡。但是，我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经过四年的抗日战争，已积累了许多打击日寇的经验，特别是我八路军指战员，在过去以营为单位进行活动的对敌斗争中，也积累了一定的战胜日寇的宝贵经验。我抗日根据地中心区，经过减租减息斗争，广大群众都已充分发动起来，并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抗日团体，如农会、青救会、妇救会和儿童团等。各乡村也都建立了党的抗日民主政权。广大抗日群众在当地的党组织领导下，为了有力地配合我八路军进行反扫荡，从一九三九年冬开始，在通往根据地各村的要道上都挖有一米七、八深的壕沟。这样，就大大地限制了日寇的坦克和汽车的行动。所以，尽管敌人多次疯狂地向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但最后都遭到了失败。

十月上旬，我们新八旅三个团开始分散到曲周、永年、广平、肥乡、馆陶和临清方向，以团为单位进行活动。主要任务是帮助抗日根据地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斗争。当时，我们三营所在的二十二团是在曲周县和永年县一带活动。一天，正当我二十二团所属二营在曲周县东南二十华里的大连寨村内驻扎时（当时，我们三营住在大连寨以南的某村；一营住在大连寨东北的某村），曲周县城的敌人纠集了一个大队的兵力，携一三式山炮一门，突然向驻大连寨二营的阵地

进行袭击。在强烈的炮火掩护下，敌人很快攻占了二营大连寨村西头的阵地。二营全体干部战士陷于苦战中，情况十分危急。这时，正在二营检查工作的王近山副旅长，立刻命令骑兵通讯员疾速赶到三营告诉我，敌人正在向我大连寨的二营猛烈进攻，情况紧急。命令我三营跑步赶到大连寨增援二营。我接到命令后，马上紧急集合部队，跑步向大连寨前进。当我们三营赶到大连寨东南一华里处的一条壕沟中时，我见到了王近山副旅长。他用手指着大连寨方向告诉我说：现在日寇有四、五百人，已攻入大连寨村内，二营全体指战员正在村内逐屋同敌人进行战斗。命令你营派一个连从村南攻入村内，协助二营向敌人进行反击；一个连从大连寨村南向西进击，防止敌人从大连寨以南包围二营；其余两个连从大连寨以南迂回到大连寨西南，包围敌人。我接受任务后，立刻命令十二连胡中华连长，带领全连顺壕沟攻入大连寨村内。然后又命令九连从大连寨以南，利用坑塘地形向西攻击前进。最后，我率十连和十一连，顺大连寨以南约一百多米的一条东西向的壕沟向西迂回前进，摆开一个侧击和包围大连寨村西头敌人的阵势。敌人发觉我营向西运动，使其侧背受到威胁的动向，急忙组织轻重机枪和掷弹筒，在山炮的配合下，向我营阵地猛烈轰击。由于我营是处在壕沟之中，地形对我非常有利。所以，尽管敌人火力强大，只有少数掷弹筒弹落入沟中，对我营造成一些小的伤亡。但对我营久经考验的干部战士来说，威胁并不大，全营冷静沉着地按计划占领阵地。这时，我料定敌人在集中火力向我轰击之后，必然会组织步兵向我阵地发起冲锋。于是，我就命令十连和十一连一方面

注意观察敌人的动向，一方面组织好火力，做好反击敌人冲锋的准备。命令各连敌人不到一百五十米以内不打，并约定，以我的匣枪的三响为向敌人发动反击的信号。同时，我和营教导员沙延孝同志，也时时观察着敌人的动向。果然不出所料，过了一会儿，敌人的强大火力慢慢稀疏下来了，我们清楚地发现在大连寨以西，约有两个中队二百多敌人，以班为单位，成散兵群的队形，各自举着一面小太阳旗，敌中队长在敌群稍靠后的位置上，手持军刀指挥着敌群。敌大队长也在敌群最后的位置上，手舞军刀叽里哇啦地指挥着左右两个中队的敌人，向我营阵地冲来。我立刻命令十连和十一连，以班排为单位准备好排子枪和手榴弹，并做好白刃格斗的准备。当敌人冲到我营前沿阵地不到百多米远的地方，在我匣枪三声响的号令下，机步枪一齐开火象雨点一样朝敌群打去，只见敌人象被割倒的“谷个子”一样一个个纷纷倒下。随后，我带领十连和十一连一齐跃出壕沟，向敌人猛扑了过去，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破了胆，哭爹叫娘、连滚带爬丢下七八十具尸体向后逃去。正在我干部战士收拣敌人枪弹时，敌人的轻、重机枪和山炮又开始狂叫了起来。为了避免重大伤亡，我命令十连和十一连撤回了原壕沟中的阵地，并要他们严密监视敌人，做好打退敌人第二次冲锋的准备。我们刚撤回阵地，就接到十二连胡中华连长和张德政指导员的报告，他们连已经攻入大连寨村内南部，正在同二营的全体指战员并肩战斗，痛击村西头的敌人。紧接着，九连张金钰连长也来营指挥所报告说，他们连已进入大连寨村西南部，正同敌人在相隔不到百米处对峙中，我判断和分析了当

时的敌情，对他们说：看样子进攻大连寨的敌人兵力是一个加强的大队。目前在二营和十二连对面可能是敌人的一个中队，在十连和十一连的对面可能是敌人的两个多中队；在大连寨西北约一华里多的地方是敌人的一个预备中队。我还告诉他们，向十连和十一连阵地发起第一次进攻的敌人，虽然被我们打退，而且伤亡惨重，但从敌人又组织火力向我轰击看来，敌人还要伺机反扑。看来敌人要发动第二次冲锋，你们九连要和十二连紧密协助，随时抓住战机，向大连寨村西头的敌人发起攻击，以便有力配合十连和十一连歼灭大连寨之敌。在我向九连连长张金钰同志下达任务时，敌人发现了我营指挥所所在位置。正当我同九连连长张金钰同志交谈时，敌人突然向我营指挥所方向打来几枚掷弹筒弹，其中，有一枚八八式掷弹筒弹落在我和张金钰同志身边不到一米的地方，吱吱冒着白烟。在这万分危急的一瞬间，我的警卫员程春潮同志，一个箭步冲上去拾起这枚掷弹筒弹又向敌人的方向扔回去，这时掷弹筒弹在敌阵地前开了花，营指挥所所有人员无不为程春潮的英勇行动，齐声喝采。

当王近山副旅长接到我们三营打退敌人的第一次冲锋，并歼敌七八十人的报告后，就派了一位作战参谋到我们三营指挥所传达他对我营全体指战员的鼓励 and 指示。他说：在今天的战斗中，你们三营打的勇敢、打的顽强。你们勇猛战斗的行为使敌人丧胆。你们为大家树立了榜样。你们给大连寨西部敌人造成的重大伤亡和沉重打击，紧紧地拖住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是给二营一个有力的支援，稳住了二营的阵脚。你们一定要坚守阵地，发扬成绩再接再厉，坚决打退敌人第

二次以至第三次反扑。他还告诉我们：一营也调到大连寨参战来了，他们正从大连寨以北敌人的左翼，包围敌人攻击前进。最后他还说，你们二十二团三个营，今天一定要全部歼灭这股敌人。作战参谋走后，我把王副旅长对我们三营的鼓励和指示，以及一营来参战的消息，一一向全营指战员作了传达。战士们听后，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个个磨刀擦枪、斗志昂扬，都准备在这次战斗中，多杀敌人，多立战功。

自我们打退敌人的第一次冲锋后，敌人在野战工事里，不停地用轻重机枪疯狂向我十连和十一连阵地扫射，妄图用密集的枪弹，挽回他们失败的命运。为了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程春潮同志在壕沟里冷静地判断着敌人机枪射击的方向。当他判明敌机枪射击方向后，就探出身去，向西北方向观察敌人的动静。当他观察完敌情撤回身来后，就把这个方法作为经验介绍给大家。当时，我只是觉得他介绍的这个经验有些道理。却没料这个经验少用几次是可以的，如果用的次数多了，就容易把自己暴露给敌人，造成不良后果。于是，我们就按着这个经验去观察敌人的动静。就在我们第三次探出身去观察敌人动静时，突然从我们左前方敌人的野战工事里射出了一排步枪子弹。程春潮同志不幸中弹倒下。我急忙跑上前去扶他靠在我的怀里，仔细一看，一颗子弹正好打中他的头部。鲜血象喷泉一样直往外冒。我赶紧用一块毛巾替他包扎好伤口。这时，他只睁开眼睛用手指了指左前方的敌人的阵地，头歪到我的胳膊上慢慢地闭上了眼睛。我大声呼喊着他的名字——春潮！春潮！可他象睡熟了似的，再也没有睁开眼睛……。此刻，我的心就象刀绞一般难受。望

着这位跟随我三年的最沉着勇敢的年轻战士，过去的往事又一幕幕浮现在我的脑子里，我难过极了。

自一九三七年冬我建立党的抗日武装以来，程春潮同志就一直作我的通讯员和警卫员。在历次的战斗中，他都身带双枪（驳壳枪和马捷克式枪）守护在我的身旁。面对着凶恶的敌人，他总是沉着冷静，机智勇敢。每当遇到恶战时，他总是镇静自若地鼓动周围的同志们，勇敢地同敌人进行战斗。每当我在战斗中带领部队向敌群冲锋时，他都是走在我的前面。而当我带领部队摆脱敌人的追击而撤退时，他总是跟在我的后面进行掩护。就是这样一个好同志，他竟为了党和人民，为了早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过早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宝贵生命，这怎能不使我和三营全体指战员为他的牺牲而悲痛落泪呢？

正当我们为程春潮的牺牲而悲痛时，十连三排的文化战士栗玉安，右肩负重伤被抬了下来。我见他伤势很重，就安慰并劝他到后方医院去养伤，等伤养好了再归队杀敌。我命令营卫生员和十连三排的几个战士，把他轻轻地放在担架上送到后方医院去了。栗玉安同志也是一九三七年冬我建立党的抗日武装时，参加八路军的，那时他才十六、七岁。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他一直给我当公务员。一九四〇年春，我才让他去十连三排当文化战士的。

刚送走了栗玉安同志，我就接到了十连和十一连的报告，他们已观察到敌人又重新组织好了力量，正准备向我阵地发起第二次冲锋。我接到报告后，就一面命令十连和十一连重新组织好火力准备在敌人向我冲锋时，更多地杀伤敌

人，一面我探出头去向西北一望，见敌人把它西北后方的预备队一个中队也调上来了，敌指挥官手舞军刀，象赶羊似的驱赶着敌兵向我阵地扑来……。望着凶恶的敌人，我的眼里射出了仇恨的火花。为了彻底打垮敌人，我命令九连和十二连当十连和十一连战斗打响后，立刻向敌人发起冲锋。当敌人离我十连和十一连阵地只有六、七十米时，两个连的机枪和步枪形成交叉火力，一齐向敌猛烈地射了过去，接着又是一阵手榴弹，敌人又丢下六、七十具尸体，狼狈地缩了回去，这时，我发现敌人的一个指挥官还在手舞军刀，拼命地驱赶着敌兵向前冲，但经过两次惨重打击的敌兵，谁也不听指挥官的命令，爬在野战工事里一动也不动。见此情况，我就命令通讯员吕春和用枪瞄准敌指挥官。吕春和手起枪响，只见敌指挥官应声倒下。九连和十二连，在十连和十一连打响的同时，也乘机向大连寨西部的敌人发起了冲锋。敌人在大连寨村西部占领二营的阵地很快就被夺了回来，但十二连连长胡中华、指导员张德政和九连指导员张少村，都在这次冲锋中牺牲了。在一营和二营的配合下，在我营各连的勇猛反击下，敌人首尾不能相顾，只得丢下一百多具尸体，向曲周方向狼狈逃窜了。当我和营教导员沙延孝同志，手提驳壳枪指挥各连追歼残敌时，我们发现了敌人丢下的一三式山炮。这时，我们就越过敌人的尸体，朝西北方向的一三式山炮奔去。就在我们快要接近山炮时，隐藏在山炮右后方几个坟堆下的敌人，突然向我们打来一排冷枪，教导员沙延孝同志不幸在我右边中弹倒下。我和通讯员急忙闪在山炮左边，对准敌人射出一串串仇恨的子弹，结果了残敌的性命。然后，我奔向沙延

孝同志身边，扶起他的身子一看，一颗子弹正打在他头部右上方。我摸摸他的胸膛，惊异悲痛地感觉到他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战士们见此情景，悲愤地怒吼着“为教导员报仇！为教导员报仇！”……象一群猛虎似的，向残敌扑去。战斗很快就结束了。这次大连寨战斗，我们全团歼敌有一百四、五十人，杀伤敌人一百多人。共击毙、击伤敌人三百多人。同时，还缴获敌人山炮一门；歪把子机枪四挺；掷弹筒六枚；新三八式步枪一百余支。在战斗总结时，王副旅长说：今天大连寨的战斗，我们虽然没有全部歼灭敌人，但由于大家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大大地削弱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使敌人丢盔弃甲，扔下这一百多具尸体和山炮夺路而逃，这是给日寇的一次沉重打击。敌人再也不会轻易地出动一个大队的兵力向我根据地扫荡了。这是大家共同努力，团结对敌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他还一再表扬我们三营和一营的全体同志。他说：由于你们指挥正确，方法得当，使敌人始终没有靠近你们阵地一步，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你们的战斗任务，为这次战斗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希望你们一定要好好地总结这次战斗的经验和教训，争取在今后的对敌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在提到二营时，他说：二营虽然在战斗一开始有两个连没有很好地掌握部队，丢了大连寨村西头的阵地。但就二营全体来讲，由于同志们不畏强敌死守阵地，拖住了敌人，很好地配合了兄弟营的战斗，同样也为保证这次战斗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了防止敌人进行报复，他命令我们各营赶快打扫战场，然后撤回到大连寨东南的根据地中心地区进行休整。

在打扫战场时，我命令营军需长宋汇东、书记长程玉璋和营卫生员等几位同志，负责组织战士们，把营教导员沙延孝、十二连连长胡中华、指导员张德政、九连指导员张少村和警卫员程春潮，以及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二十二位战士的尸体，随部队一起抬回大连寨东南根据地中心区进行安葬。按人道主义精神，我让另外一部分战士就地掩埋日军阵亡士兵。在掩埋日军士兵时，我们发现这些为日本军国主义卖命的士兵，大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而且个个肥肥胖胖皮肤白嫩。战士们见此情景，一股愤怒的烈火窜出胸膛。有的战士扑到敌指挥官身边，要扒出敌指挥官的心来；也有要敲掉敌指挥官的大金牙；还有的要把敌碎尸万段。经我反复宣传八路军的对敌政策后，他们才强压怒火把敌人的尸体就地掩埋掉。

在我带领部队向北撤的路上，我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想起了在大连寨战斗中牺牲的营教导员沙延孝、十二连连长胡中华、指导员张德政和九连指导员张少村等同志。

沙延孝同志出生在一个回民家庭里。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前，他是我山东地下党寿张乡师党支部的一个活动积极分子。他对发展寿张乡师党的力量，积极开展冠县地下党的工作都有很大贡献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对组建我党的抗日武装力量，也是有卓越贡献的。一九三九年秋，他到我们三营作教导员的工作期间，不管干什么工作，他都干的很出色，无论是他的领导艺术和作战的指挥才能，还是他在回民中开展党的工作，都是其他同志所不能代替的。一九四〇年夏季，他带领两个连克复邢柳邵就是

他作战指挥才能的体现。（当时，我带领两个连克复了大柳邵。）他的牺牲，是我营的重大损失，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个优秀党员。

十二连连长胡中华同志出生在山东省堂邑县凤凰集一个贫农家庭里，从小他就给地主作雇工。受尽了地主的剥削、压迫、欺躏，饱尝了人世间的痛苦折磨。一九三七年冬，他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三八年参加了我党在堂邑县组建的抗日游击队，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游击队里，他作战勇敢，为党工作积极，很快地由一个普通战士提升为班长，后又被提升为排长。一九三九年初，党派他到筑先纵队第五营当连长。一九三九年秋，党组织为了加强三营，就把他所带的五连一百多人，原建制拨归我们三营编为十二连。胡中华同志待全连干部战士情同手足，亲如兄弟。他密切联系群众和干部战士打成一片，常以普通一兵出现。在营、连作游艺活动时，他和战士们配合默契，常以滑稽的表演动作引起大家捧腹大笑。战士们都觉得他没有一点官架子，都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看待。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却在这次大连寨战斗中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洒尽了自己的鲜血。这又怎能不使十二连和三营全体干部战士为他的牺牲而惋惜和悲痛呢？

十二连指导员张德政同志，出生在东北。“九一八”事变后流浪在关内。一九三七年秋，在山东第六区行政专署政训处当上尉政训员（当时我是少校政训员）。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中，他是大家公认的优秀共产党员政训员。一九三八年春，党组织派他到第三支队（这个支队是在二十

九军的一个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战斗力较强的支队)邵吉胜营当少校营政训员,他在这个营做党的地下工作,成绩是卓著的。后来该部队受国民党的影响,日渐反动。党组织就让他撤出了这个部队。一九四〇年春,党组织调他到我们三营十二连任指导员。一九四〇年夏季,邵吉胜部侵占了聊城西南的李海和白堂。我八路军组织了新四旅、新八旅和冀鲁豫部队对邵吉胜部进行围攻。在战斗打响前,他临危不惧,一个人深入到李海西门外几十米的地方向邵吉胜喊话,劝其投降,他的这种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受到三营广大指战员的称赞。在大连寨战斗中,他和胡中华连长密切配合,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带领全连指战员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奋勇冲杀,直到为打败日本侵略者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的英勇牺牲,使十二连全体指战员失去了一位好领导、好战友,也使我营失去了一位优秀指挥员和好同志。

九连指导员张少村同志,出生在山东省长清县,参加革命前他在济南高中上学。一九三七年冬,他在第六区行政督察公署我地下党领导的政训处工作。一九三九年秋,党组织调他到我们三营任九连指导员。为了把九连建设成为一支能攻善守的坚强队伍,他深入到干部战士中,耐心细致地做政治思想工作。在活跃连队文化生活方面,他也是有建树的。他除教全连干部战士唱当时流传在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歌曲外,他还结合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先进典型素材,自己编写歌曲教全连干部战士唱,以此来鼓励大家的斗志。由于在他的努力下,九连全体干部战士会唱的歌是比较多的。在历次全营的歌咏比赛以及和兄弟部队会合唱歌时,九连总是名列前

茅，他的眼睛虽有些近视，但在每次战斗中都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在配合十二连攻打大连寨西部的战斗中，他身穿一件羊羔皮袄冲杀在全连的前面。当攻到大连寨西南部时，他胸部负重伤。由于流血过多，他刚被送进医院就牺牲了。他的牺牲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当营部宋汇东、程玉璋和卫生员组织战士们，把战斗中牺牲的二十二位烈士抬到大连寨东南根据地中心区准备安葬时，我望着成“一”字形摆放着的烈士遗体，好象他们没有死。他们那生龙活虎般的形象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就象一队就要出征去同日寇拚搏的勇士一样，排着整齐的队伍等待着我的出发命令。在这二十二位烈士中，他们大多数都是在一九三七年冬和一九三八年参加我所组建的党的抗日武装部队的，多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都是有觉悟的贫下中农子弟，在漫长的抗日斗争岁月里，从不会打仗到会打仗，锻炼成长为坚强战士。在那行军作战常有一日吃一餐饭甚至一天吃不到一顿饭的情况下，在那每人每月只有一元钱生活费的艰苦年月里，他们不怕困难，艰苦奋斗，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们想的是为民族争生存，为全国人民求解放，为把日本帝国主义早日赶出中国去，早日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国家，使四万万同胞过着安居乐业幸福美满的生活。他们都是我同生死共患难的好同志和亲密战友。他们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但他们的英雄形象与山河同存，与日月同辉。

翌日，我带领全营干部战士到二十二位烈士墓前，向烈士们举行告别仪式。周围村庄的群众约有六七百人也闻讯赶来参加葬礼，他们有的抬着盒桌，向烈士致奠酒祭礼，有的

烧香烧纸，全体向烈士们行跪拜礼。在告别仪式上，许多干部战士扑在沙延孝、胡中华、张德政、张少村和程春潮等同志的墓上，泣不成声地喊着烈士们的职务和名字，哭诉着大连寨战斗打败日寇的情况。并坚决表示：一定要接过烈士手中的枪，继承烈士们的事业，前仆后继奋勇杀敌，坚决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整队向烈士行完三鞠躬礼后，我向全营干部战士和前来参加告别仪式的群众，发表了演说。我说：今天我和大家怀着极为悲痛的心情向烈士们告别，此时此刻我觉得有很多话要说……烈士们为反抗日寇的侵略，而无私地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他们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很好的学习的，我们大家想一想，谁无父母？谁无兄弟姐妹？谁不向往同家人团聚过幸福美满的生活？可是，自从“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吞了我国东北三省，随后又占了热河。“七七”事变后，日寇又大举向我中华民族的大好河山发动了全面进攻，妄图吞并我炎黄子孙经千万年创造的神圣祖国，使我四万万五千万中华儿女做亡国奴。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当局，竟在“九一八”事变中，采取不抵抗主义、卖国主义和逃跑主义，把我中华民族的大好河山——东北三省拱手交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他们还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臭名昭著的“塘沽协定”，以此来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占我东北三省和热河省为合法。就这样他们还觉得卖国不够，他们不顾全国人民抗日的呼声和唾骂，竟又派卖国贼何应钦同日本驻屯军，梅津美治郎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使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华北五省的控制处于合法化。“七七”事变后，国民党二百多万军

队处处打败仗，丢失了我中华民族的半壁河山。试想？我们要想不当亡国奴，打败日本侵略者，依靠国民党的力量能行吗？不行！绝对不行！我们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抗日民众自己的力量，在敌后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和发展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同全国抗日军民一道，团结国内外一切抗日力量，形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赶出中国去，夺取抗日斗争的最后胜利。

我们大家都知道，人生一世谁无死？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我们营这二十二位烈士，他们是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为不使我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当亡国奴，为保卫我国神圣领土的完整，打败日本侵略者，为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而死，他们的死是重于泰山的。而相反，那些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充当炮灰，为日本侵略者效力卖命的汉奸亲日派，他们的死是比鸿毛还要轻的。今天我们为这二十二位烈士而悲痛流泪，这是自然的，也是应该的。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他们的遗志，在今后长期的抗日战争中，英勇杀敌，不断地使我们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歼灭日寇的战斗中得到巩固壮大和发展。同时，我们还要在保卫抗日根据地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反对汉奸亲日派和减租减息的各种斗争中，继续帮助他们提高觉悟，组织起来，武装自己。只有这样，我们的抗日根据地才会一天比一天巩固、发展、壮大。烈士们安息吧！让我们每个活着的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踏着烈士们的足迹奋勇前进！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在告别仪式结束后，我们接到了旅司令部要我们三营开赴永年以北的双塔村休整待命的命令。在我们向周围村庄的各个群众组织表示谢意和告别后，我率部队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二、冲破封锁上太行

大连寨战斗结束后，新八旅的负责同志向军区首长汇报了我们二十二团在大连寨的战斗情况。在总结大连寨战斗取得的胜利的经验时，旅首长表扬了我们三营和一营。同时，还特别提到了我。他说：由于三营营长在这次战斗中亲临前线，身先士卒，并把营指挥所同连指挥所设在一起。所以情况明指挥灵，在协同一、二营向敌人反击中，敌人的两次冲锋都被他指挥的十连和十一连打了回去，致使敌人最后丢下枪炮和上百具尸体落荒而逃，为保证大连寨战斗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还把我的简要情况向军区首长做了介绍，说我是个具有十年党龄的党员（实际上当时我只有九年的党龄），曾经做过山东地下党的负责人。军区首长听完汇报后，表扬了我们二十二团全体指战员。当时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同志对汇报情况的旅首长说：一个有十年党龄的山东地下党的负责人，现在做营长不太合适吧？我看应该把他送到延安军政大学去学习，你们看如何？在场的其他军区首长和八旅首长，当即表示同意刘主任的意见。八旅首长回司令部不久，就接到军区调我去延安学习的调令。同时，军区派

了一位姓陈的红军干部来接替我的营长工作。还另派了李陵同志到我们三营担任教导员。在我即将离开三营前，我把三营的整个情况向两位新上任的营领导一一作了介绍，然后把营里该交的工作都交给了他们。最后，我又到营里各连进行座谈，作了一些政治思想工作，而后告别了全营的干部战士。用我的一匹骑了三年多的黄彪快马换了一匹银灰骡子（因为骡子上山比马耐性好），带上通讯员吕春和和饲养员谭峰先，依依不舍地离开三营，踏上去旅司令部的路程。营里许多干部战士得知我要离开三营的消息后，都赶来为我送行。他们送了一程又一程，谁也不愿回去，后又在我的再三劝阻下，他们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我们返回营地。我们到了旅政治部，负责同志告诉我们，去延安学习的具体日期还没有定下来，要我们暂时在旅司令部住下来，等待通知准备出发。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下旬，有一天我们接到了过平汉铁路和敌人封锁线，去太行山根据地的通知（当时一二九师司令部驻扎在太行山）。我们就立刻整装上了路。当时和我们同行的有去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接受训练的四十八名连排干部（在他们当中有我们三营十连郭树铭副连长和九连三排李先起排长，他们两个都是共产党员）。还有新八旅骑兵连派了三十多匹马，护送的三十多名伤员和残废军人。还有二十多匹骡子，驮着冀南行署购买的准备印钞票的纸和印色。我们这支队伍由二十四团的一位团参谋长，带一个营的兵力护送。

一天夜里，我们从永年以北根据地，来到西部根据地游击区的一个村子住下（这个村子紧靠着敌占区）。这里是距

邯郸东北的平汉铁路和敌人的封锁线约有三十多华里的地方。为了不让敌人知道，部队封锁了该村对外的一切消息。这个村子土地肥沃，麦苗长势很好。可是听村子里的乡亲们气愤地讲，每年当庄稼刚一成熟，日本鬼子、汉奸和伪军就到处催粮，我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打下的粮食全部都被那些饿狼抢光了，一年到头来，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穷苦生活。这个村子有个特点，就是因为离煤矿近每家都有一个煤火炉子，火炉口都有五寸以上。当地老百姓就用它来取暖做饭。晚上，二十四团参谋长告诉我，敌人为了阻止和破坏我抗日军民的活动，他们在平汉铁路两侧挖有两米多宽，三米多深的封锁沟。我们这支人马要想通过敌人的封锁沟，就必须把沟填平。根据这支部队的实际情况，研究了行军队形，部署了战斗力量，准备用两个排的兵力填封锁沟，其余部队担任大队人马的警戒。一切部署好我们才休息。

下午五时，部队吃过晚饭。六时就整队离开了这个村子向西出发。二十四团参谋长带领掩护部队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三十多匹马驮着三十多名伤员和残废军人；紧接着是，二十多匹骡子驮着印色和钞票纸；我和通讯员吕春和及饲养员谭峰先走在去太行山随营学校受训的四十八名连排干部的前面。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行军，大约在晚上十一点多我们到了平汉铁路附近。担任掩护的两个连往北、往南都派出了警戒部队。二十四团参谋长带领一个连去填封锁沟。当大家知道很快就要过平汉铁路时，非常高兴。这时，九连李先起排长和另外两个排长到我跟前要求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铁路，想去仔细看看铁路是个什么样子？我理解他们此刻的心情，

就批准了他们的要求。他们看完铁路后，回来非常高兴。同时向我提出了许多问题。比如，铁路为什么就只有两根钢棍呀？火车怎么在这两根钢棍上走呀？我一一向他们做了解释。正当我们交谈的起劲时，东北方向的一个村子里出现了一大堆火光。根据当地的敌情，我们知道，这是村子里的汉奸组织，向日伪据点发出的信号。就在火光出现的一眨眼功夫，北边鬼子炮楼的机枪就向我们集结的方向叫了起来。这时封锁沟还有近一米左右没有填平。为了迅速摆脱敌人的袭击，二十四团参谋长命令向南向北掩护的两个连和前部连集合，伤员残废军人，学习受训干部跟进，爬坡过沟向西前进。就在担任掩护的二十四团部队和三十多名伤残人员，三十多匹骡子和学习干部刚过封锁沟后，敌人的铁甲车就从邯郸方向沿铁路向我们扑来，并不断向我们打机关炮。这时，我们以最快的速度离开封锁沟向西前进。部队过封锁沟朝西刚走不远，敌人的铁甲车就扑到了我们刚过封锁沟的地方，但它毫无办法，只是卧在铁轨上一个劲地向我部队的后面打机关炮。当部队前进约有十多华里处时，前面的伤员和骡子突然停了下来。我上前一一看，才知道在过封锁沟后，由于担任掩护的二十四团部队行军太快，已同我们被掩护的部队失去了联系。在我们前边停下来的只有十几个伤员，有几个和牵马的骑兵跑散，坐在地上喊“首长呀！马没有了我怎样走呀？驮印票纸和印色的三十多匹骡子跑散的只剩十几匹了。看到这突然发生的新情况，我感到很严重，伤员和残废军人丢一个在敌占区，必然作敌人的俘虏，驮票纸和印色的骡子，丢一匹都使我们经济上造成大的损失，我必须挺身而出组织大家找回失散的

伤员残废军人和驮票纸印色的每一匹骡子，并组织大家一起在天明前赶到太行根据地中去。我立即向四十八名连排干部们做了动员。我说，现在我们大家的处境很危险，在我们后面有敌人的追兵，前又有敌人的据点和炮楼，你们大家又没带武器，万一要是遇上敌人，我们这支部队是要受损失的。我们大家只有团结起来，把失散的同志们找回来，互相帮助，有组织的西进，能在天明前到根据地，我们才能避免损失。我们大家一定要团结互助，赶快分头到附近把失散的人马找回来，天明前离开敌占区。开始我看干部中有些人有犹豫表现，只有我原带的三营的郭树铭、李先起，应声“坚决服从命令”。我就说我是共产党员二十二团三营营长，大家听我的指挥，我们互帮互助，是共产党员的要站出来起模范作用，这时群声响应，“愿听营长的指挥”，我就把大家组织起来，命令郭树铭和李先起，分别带领一部分同志向着伤员和牵骡子的同志所指失散的方向，去找失散的人马。过了一会，由于失散的人也在找队伍，所以失散的人马都被找了回来。但仍然没有同担任掩护任务的二十四团前卫队取得联系。此刻，敌人的铁甲车还在不停地向我们集结的方向打机关炮。有部分同志有些沉不住气，催我快走。我向他们解释说：大家先不要慌，敌人的铁道装甲车只能在铁路上跑，它是下不来铁路的。我们现在必须抓紧时间找一个向导，这样我们才能继续前进。随后我又命令郭树铭和李先起同志，携带我和吕春和同志随身带的两支匣枪，到附近村子里找来了一个向导。当我们往前赶路刚走不远，向导就溜掉了。无奈，我们只好看着北斗星继续前进。拂晓时，我们来到一个村边，我又让郭树

铭和李先起两位同志，再去找来一位老农民向导。这位老大爷一见我们是八路军，就用手指着村子东头说，在那里有日本鬼子的炮楼，你们要赶快离开这里，敌人发现了你们是有危险的。我们仔细一看，果然在村子东头敌人的炮楼隐隐约约可以看见。这位老大爷用手指着一条路说，你们从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前面有一条沟，过了这条沟再经过一片起伏地就到了沙河边，过了这条河就到了抗日根据地了。我们就按着向导所指的方向继续前进。这时，炮楼里的敌人，发现了我们。于是机枪的射击声夹杂着掷弹筒声，一齐向我们这个方向响起来。敌人经过一阵射击后，就从炮楼里出动了三十多个鬼子兵向我们追来。突然，一条深沟阻断了我们的前进道路。我马上意识到，这是向导告诉我们的那条沟。我仔细一看，此沟足有六、七米深。稍微有点斜坡。再向别处看，没有其他道路可以通行。眼看后面的敌人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忽然在我脑子里掠过一个念头，往下跳！我只好横了横心，命令大家往下跳。我顺着沟沿第一个滑了下去。接着后面的人马和骡子也腾空而起，象天兵天将从天而降一样落到沟底，我回头一看伤员残废军人、骡马无一伤亡，不过队形太乱了，大家散乱着向西狂奔。我高兴极了，指挥着郭树铭李先起组织队伍。我和吕春和手提匣枪掩护，两支匣枪一条一条地射向敌人，后面的敌人追到沟边，见我们全部没有一个掉队的都西进了，见此情景一个个都吓楞了，它们不敢越沟追赶我们，敌人只好停下来向我们乱放一阵枪后，撤了回去。

八点多钟我们过了沙河，到了抗日根据地边沿的一个村

子。我们找到一位村干部问明了通往太行山涉县（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的道路后，就沿着村干部给我们指的一条大路到了一个小镇。这个镇子叫册井镇。镇子里设有镇政府和八路军机关。镇子上市面繁荣，农副产品和日用品琳琅满目。我们找到镇政府干部说明了我们的情况和去向，他们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做了热气腾腾的饭菜。吃过饭休息时，大家感慨地说，今天多亏三营营长，要不是他领着我们大家，说不定早被敌人抓去作了俘虏。二十三团的几个干部和几个伤员同志说，我们这次行动就象当年的“岳家军”一样，冲破了敌人的道道难关，取得了胜利。有的同志讲，三营营长是我们共产党的“岳飞”，是他在关键时刻号召我们共产党员团结一致，依靠党的力量闯过了道道难关。我说，你们不要光表扬我，闯过封锁线是靠大家的努力，我们八路军只有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依靠广大党员的团结力量，才能战胜敌人。休息片刻后，我们告别了当地群众和干部，继续向一二九师司令部所在地涉县赤崖前进。当部队离开册井镇向前走了一段路程后，我们来到了太行山前一个名叫“抓蛟岭”的关口。只见关口两边的峭壁足有一千五六百米高，直插云霄。通往山顶只有一条较宽的盘山道。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山路行军，我们爬上了抓蛟岭主峰。我站在峰顶遥望，向北向南都是挺拔陡峭的山峰，一眼望不到边际，回头东望，群山皆在眼下，再向东远望便是河北大平原了，在这里我才感到古人说的“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这个“高万仞”的形容太合适了。向西望虽然仍有更高的山峙立，但太行山顶已呈平缓之势了。在通往向西去的山坡上全是羊肠小道，非常难

走。若是骑马上山行走是较难的。为了解决伤员们上山的问题，我们同当地村干部商量，借来了几头小毛驴。晚上，我们部队来到一个小山村住下。这里的老百姓待我们非常热情，端茶、倒水、做饭忙个不停，我们就象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晚上，老乡们还硬拉着战士们去看当地的地方戏。第三天我们到了涉县县城。经过县城我们顺清漳河向西又走了十多华里，就到了赤崖一二九师司令部。

我们来到师部后，伤员们很快被送到了后方医院。三十多匹骡子驮的钞票印色和纸也被很快送到了冀鲁豫边区政府所在地的麻田。在师部，我首先向作战科长梁军同志，汇报了一路来师部的经过情况，他听后很满意，并表扬了我们。然后，他把我介绍给了组织科长王家祥同志。王科长很热情地把我们三人安排到师部招待所住了下来。第二天，王科长来招待所告诉我，经他同有关部门联系了解，延安军政大学已经停办了。由于敌人对我通往延安的道路榆次、太谷地区封锁很严，要想去延安，过封锁线困难很大。他用商量的口吻征求我的意见，他说：现在看来去延安困难很大，是不是先在师部营以上干部随营学校学习一个时期，等北方局党校开学后，再到学校去学习。我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也就同意了他的意见。第三天，我拿上王科长给开的到随营学校学习的介绍信，就到了涉县县城东边的一个叫河南店的地方，找到随营学校报了到。在这个随营学校里，有一百多名营以上干部在这里接受训练。当时，在学校里教“联共党史”课的是牛荫冠同志。到校的几天，邓小平政委和刘伯承师长为师直属队干部和我们作了一二九师的动员报告。我记得邓小平政委

首先给我们讲了当时全国抗日斗争的形势，然后向我们介绍了一二九师对敌斗争和抗日根据地巩固发展的情况。他讲一二九师有九个新编旅加地方军，有近十万人的武装，根据地人口有一千多万。最后，他号召我们全体学员，学习期满回部队后，要发动群众大力开展减租减息斗争，主动寻找战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断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努力奋斗！刘伯承师长主要给我们讲了自从“百团大战”后，抗日战争发展的形势。他要求我们要努力作好青年工作和妇救会的工作。他说：谁要是作好了青年工作，谁就有好的抗日部队。动员报告结束后，我们观看了被我八路军俘获后，经过教育转变过来的日本兵，为我们作的刺杀表演。

在随营学校学习约两个多月时间里，我给北方局写信，汇报了我在山东地下党工作的情况。在信上，我把我从作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到作济南市委书记和山东省工委组织部长，以及“七七”事变后，我从敌人监狱里出来，按地下党发动武装的指示，把范筑先的一个支队改造成一支党的抗日武装组织后，从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到一九四〇年下半年作了三年营长的情况一一作了汇报。我还在信中写了冀南军区首长决定送我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来到一二九师司令部后，因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停办，而且去延安的路上很困难的情况。最后一二九师政治部蔡主任决定要我到北方局党校学习，并提出到北方局党校学习的申请。

一九四一年四月，北方局批准了我的申请，并决定让我参加党校第五期学习班。于是，我就带着一二九师为我开的

到党校学习的介绍信，到了辽县桐峪北方局党校，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三、在北方局党校学习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八日早，我同一二九师师直机关、三五九旅、太行一分区等单位的十一个团级干部去桐峪北方局党校学习。桐峪在涉县赤崖（一二九师司令部）王堡（师政治部）的西北方，辽县县城的东南部，相距赤崖约八九十里，这是我太行山根据地的最中心地区。早饭后，我们自王堡顺清漳河谷地往西北行走不久即进入太行主峰山区。只见两侧山山相连异峰突起，从山脚到山腰柿子、核桃、板栗等满山遍野。在山腰林中，电线杆不时隐约可见。据谈在根据地，不仅八路军（十八集团军）总部与一二九师可以电话相通，连三五九旅及几个与中心区相连的分区也均有电话相通。所以遇有日军扫荡，几小时内即可通知全区。日军所到之处我电话员即将电话机搬上山上观察敌人行动，向上级报告情况。日军虽看到我山上的军用电话，但因惧怕我民兵冷枪射击和怕踩响我民兵埋设的地雷，故多不敢上山破坏我方电话线。清漳河谷宽者八、九里，窄者四、五里，两岸农民可引水灌溉，农作物茂密茁壮。村舍相望，鸡鸣狗吠相闻，农民在田间劳动，堪称根据地富庶宝贵之区。

通讯员吕春和家系山东冠县与我同村，饲养员谭峰先家系山东范县，两人家居均属平原腹地，都从未见过山，自过平汉路从小山到大山，特别上太行山以来，所见所闻处处感

到新奇，今日见清漳河两岸风光更是分外高兴。近中午时到达麻田镇，此镇有居民四、五百户，街旁店铺相连。在路东一家店铺，掌柜的见我们十多匹骡马，二十多个人，热情地让我们进店房休息。问过店东，不仅骡马用的草料俱全，人还可以吃上鸡蛋炒大米饭。稻米即为附近农田利用清漳河水引灌生长的。我自一九三七年离济南后就没有吃过大米，至于同行学习的多系红军干部对大米更是胜过山珍海味，我们一行二十多人饱餐一顿。饭后出麻田北行数里再离清漳转向西北。路虽大道，但系向高处行走，过一两山对峙之垭口即进入桐峪谷地。谷地为一干河，河两岸农田尚好。山坡、山腰柿子、核桃树一片碧绿，大道穿林荫而过，两侧远处高山在望。下午五时，过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五金寺（其北方局所驻过的村庄）西北行不几里就看见桐峪镇。镇处于河西岸其北、东北，东为大山横列，镇西有突出高山，状如圆锥直插云霄。

我们进桐峪时，天已黄昏，见店铺櫛比，其繁盛当在麻田以上。经联系，我们住进了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招待所。次日早饭后，罗瑞卿主任热情地来看望我们。随后由组织部介绍我们去北方局党校。

北方局党校设在桐峪正南偏西四、五华里的下武村。地处河沟以西的山坡之上，有上百户人家，差不多每家都让出一房为党校所用。

我们到党校后，见到了校党总支的黄书记，向领导报了到，管理科就派人将我们带到一户姓张的房东家，在他的西屋住下。七、八天内来报到参加党校学习的有太行军区副司

令王树声（司令员刘伯承兼）、三八六旅政治委员王新亭、决死纵队政治委员×××、太行一分区司令员秦基伟、二分区司令员曾绍山、晋中分区政委赖际发、冀南二分区政治委员吴富善、三分区（新八旅）政治委员肖永智、四分区参谋长雷绍康、骑兵团政委况玉纯，冀鲁豫来的有团长阎栋三、吴大明、团政委刘振国等。除军队团以上干部外，还有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等四区的地方县委书记以上干部等共约二百多人。

从同学交谈中进一步了解到晋冀鲁豫边区的一些具体情况和全区党的领导机构。当时北方局书记为杨尚昆（已去延安）、组织部长刘锡吾、宣传部长李大章。全区政权组织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副主席薄一波、戎子和；下为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四个区党委，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太岳区党委书记薄一波，冀鲁豫区党委书记苏振华、副书记张霖之、冀南区党委书记宋任穷。军事方面，一二九师兼晋冀鲁豫边区军区工作，统一领导指挥太行军区（一二九师兼）、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政委薄一波）、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宋任穷）。全区正规军、地方军整十万人。一二九师原属太行、太岳、冀南，正规军九个旅，冀鲁豫正规军三个旅。各战略区的群众通过减租减息都得到一定的发动，较普遍地成立了工农青妇以及姊妹团、儿童团的群众组织。我党牢牢地扎根在敌后人民之中，力量是无穷的。在四年多的抗日战争中党政军民均得到一定的锻炼，配合敌后晋察冀、冀中、山东和新四军等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以及全国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日本帝国主义想要灭亡中国是万万不可能的。

我们这期党校在“五一”开学，上课在一个地主的家庙里，自带小板凳和马扎。党校的主要教师是杨献珍和张衡宇。杨献珍同志讲《联共（布）党史》，是党校的主要课程，占全部学时的十分之六、七，张衡宇同志讲《中国革命问题》。张衡宇同志的课也讲得很好，后来在敌人扫荡时牺牲了，听说是因为衡宇同志近视，敌人扫荡，撤退时未能隐蔽好，走到跟前才发现是敌人队伍，他拔枪射击，英勇牺牲。他们讲课有讲义，但上课的时候还引了许多生动的材料，举出许多事例来说明马列主义的原理，所以我们学员都做笔记。十八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北方局组织部长刘锡吾同志，也都给我们讲过课。刘锡吾同志讲的是地下党在敌占区依靠群众、发展组织，积极开展对敌斗争的情况。他举了许多北平和唐山一带的活动事例。由于我在抗战前五、六年的时间一直在山东进行地下党的工作，听了他讲的情况后很受鼓舞，对地下党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提高。我们党校还几次邀请当时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左权同志（黄埔军校毕业）来给我们讲课，但他很谦虚，都谢绝了。领导同志中，给我们讲课次数最多的是彭德怀同志。他当时是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北方局负责人（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同志当时去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彭德怀同志给我们做了七、八次报告，都是讲国内外形势，介绍全国抗战的局势和根据地发展建设的情况，阐明党的方针政策，论述对日军作战的战略和战术变化。他的报告常引红军反围剿

的经验，长征经验，统战工作和国民党又团结又战斗的经验等，他的报告生动活泼、深入浅出，他对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情况非常熟悉，了如指掌。经常介绍晋察冀、太行山、冀鲁豫、冀南、太岳等地区对敌斗争的情况。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给我们讲晋察冀的情况，他面孔严肃，声音低沉，告诉我们日军正在晋察冀扫荡，有一天多未通电报了，形势紧张得很。他很有信心的说，聂荣臻同志一定会利用根据地各种有利条件，粉碎敌人的扫荡的。果然过了两天我们得到通知，晋察冀敌人扫荡被粉碎了。

在党校学习期间，使我感到有较大提高的就是听了杨献珍同志讲的《联共党史》和张衡宇同志讲的“中国革命问题”。杨献珍同志对马列主义的理论很有研究，他的记忆特别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许多经典著作他都能背下来。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的重要论述、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怎么办》、《两个策略》等。讲课时，他在黑板上写出了提纲，然后不看讲稿，背着讲，有关原理，论述讲得非常清楚，并且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加以阐述说明，使学员们听了都很受启发。记得在讲联共党史开始时，他就给我们说，毛主席对联共党史评价很高。毛主席讲：“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材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

在中国是应该如何的工作了。”杨献珍同志介绍了毛主席对联共党史的评价，又举出许多事例说明毛主席的论述，这就使我们学员一开始就感到学好这门课程的重要，都觉得非常有兴趣。他说，马克思的第一国际、恩格斯的第二国际在组织上都是松散的，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一国胜利，而列宁领导俄国的工人阶级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关键就在于他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具体地解决了俄国革命的问题，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们中国革命也是要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成功。他的这些讲述，使我们这些长期处在斗争第一线，有着一些实践经验的同志顿开茅塞。抗战前在临清乡师翻看过李达写的《现代社会学》。在济南乡师搞地下党斗争时，我曾经读过《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当时译为《反杜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当时译为《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还看过张汝心写的《现代哲学》（唯物辩证法）。感到这些著作所说的原理都非常对，用这些理论能解释通社会的发展，不但对过去，对现在而且对未来的发展都讲得很明白，让人信服。在济南乡师入党不久，团省委负责人宋天民给我讲，现在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但必须由共产党领导才能取得胜利，感到很新鲜，有些不理解。后来从报刊上又看到过上海神州国光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有的说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后来知道这是托派的主张。说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才是正确的，是我们党的主张，也知道有瞿秋白同志化名

写的文章。我们当时只能在报刊杂志上凭自己分析来学习马列主义，不可能深入系统地了解 and 掌握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当时对党提出的土地革命、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这些主张都感到非常符合斗争的实际，十分正确，但对这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紧密结合，思想上还认识不清楚。这次到党校学习，系统地听了杨献珍同志和张衡宇同志的讲课，也有机会阅读了毛主席的一些著作，如《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的战争战略问题》、《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又听到彭德怀副总司令、刘师长、邓政委等领导同志的报告和讲话，更多的了解了全国革命的形势，第一次从刘邓首长的讲话中听到了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这就在思想上、理论上得到了比较大的提高。记得在《联共（布）党史》课程快要结束时，同学们都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绝不会象希腊的英雄安泰那样，被敌人把他和生育抚养他的母亲——大地隔开，举在空中而扼死了。养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母亲就是人民群众，我们要永远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听着这些议论，回想创建游击队和在抗战前线艰苦斗争中，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支援，心情格外激动。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杨献珍同志给我们上课时告诉我们，现在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希特勒法西斯向苏联公开宣战，世界大战爆发了。德国有二百个师团，四百万军队，飞机、大炮、坦克几路向苏联进攻。他也告诉我们，苏联早就做好了战争的准备，斯大林防线是巩固的。彭德怀同志也来给我们做报告。他说，日本还有军事力量进行更大规模地进

攻，日本有陆军三百万，而东北和关内仅有一百多万，还有一百多万军队，另外海、空军的力量，特别是海军大部分还未动用，因此，它还会在西太平洋发动对英、美的进攻。现在爆发的苏德战争是一次世界性的大战，希特勒搞法西斯主义，是个战争狂人，他早就虎视眈眈，阴谋侵略苏联。张伯伦、达拉第的绥靖政策，助长了他的野心，所以战争初期苏联是会相当艰苦的，但是苏联人民奋起进行卫国战争，是完全正义的，会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支持，所以最后一定胜利。

彭总还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他说蒋介石拥兵数百万，并不真心抗日，他下令张学良不抵抗，拱手让出东三省；逼走冯玉祥，杀死吉鸿昌，破坏了察北抗战；指使何应钦签订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十九路军在上海挫败日军，他又拒不支援，致使淞沪抗战失败，南京沦陷。但是事情是复杂的，当日本人威胁到他的根本利益时，他还是要抵抗的，如长沙抗战等。总的来说，他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现在国民党在黄河北岸的部队，朱怀冰、侯镜如积极搞摩擦，侵犯我根据地，已被我歼灭。中条山前还有七个军，是抗日的，但也有可能受顽固派的操纵向我们进攻。因此我们既要争取他们积极抗战，又要作好他们向我们进攻的准备。

一九四一年秋，山西和河北南部的日、伪军互相配合，发动了对太行山根据地的扫荡。我们党校奉命转移，从下武出发，经峻极关下太行山，直到柴水，我根据地军民奋起抗击，把敌人打退，我们又回到了下武村。

当时，在桐峪一带住着许多机关，粮食供应不上，总部

就动员我们党参加运粮。我们出去一百多华里，用布袋装上百把斤粮，肩扛回来，许多团长、旅长、分区司令都去扛粮完全和战士一样。

由于党校是在根据地的中心，西北是晋中分区，西面是太岳军区，东面是冀西分区，南面是一分区，所以在党校的生活是很丰富的，很活跃的。除了上课学习外，还经常举行报告会、演讲会，每天都能看到《新华日报》，还演出文艺节目，不但有唱歌、话剧，还有京剧。一二九师的宣传队唱歌，演剧，搞得很好，学生和老百姓都看。记得看过他们演出的一个话剧，叫《棋局未终》，是以国共合作为题材的，情节大致是国民党军队里的特务杀害了到该部队进行联络工作的共产党干部，这个军的参议是个开明人士，愤起揭露国民党特务的卑劣行径，促使军长觉悟，认清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剧的结尾是下棋，剧中人说了一声“跳马”，幕布就拉上了。观众都说没有完，喊着让继续往下演。这时一位演员出来向观众解释说，故事就是没完，国共两党还要继续合作下去，但前景如何得拭目观看，所以说剧目是棋局未终吗。在桐峪，还演过京剧《岳飞》，化装、锣鼓齐全。有岳家军大败金兵，十二道金牌催岳飞回京。演到最后岳飞被秦桧奸党严刑拷打，“受胶刑”，鲜血直流（用红墨水），看得我直掉泪，很受感动。我们还看过一二九师宣传队演的曹禺名作《雷雨》和《日出》。还看过朝鲜人民义勇队（有百把人，一二九师给发的枪）演出的反映朝鲜人民与日本侵略者顽强斗争的节目。这些文艺宣传活动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抗战的决心和士气。

在党校期间，星期天休息时我们还常爬山。桐峪是一条山谷，东西都是大山，西边有一圆锥样的高峰，叫小麦蛟（音）特别高，大约海拔有两千多米，山势非常陡。记得四一年夏的一个星期天，我吃过午饭就去爬这个高峰。山上树木茂密，野草丛生，打柴的老百姓劝我不要再往上爬，说上去下不来。我也不信，就继续往上爬，越往上树木越稀少。直到太阳偏西才爬到山顶，上边凉风习习，到处是狼豹等野兽的粪便。从山顶放眼望去，四周是祖国的大好河山，想到日本侵略者还象野兽一样蹂躏着国土家园，心情格外激动，很想早日回到前线冲锋杀敌。下山时天已昏黑，摸着树石下山，回到下武村已夜十一时了。

一九四一年底我们在党校毕业了。党小组长洪荒同志（我也曾当过小组长）给每个人都做了鉴定。我准备去山东，跟我上太行的通讯员吕春和当时只有十七、八岁，我进党校后，他就去学文化，有很大进步。饲养员谭锋先，一直赶骡子为根据地运粮驮东西。我毕业要走了，组织上就动员说根据地很缺人，谭锋先干的不错，就留在根据地了。

确定我回山东是北方局组织部定的。四一年到党校后不久，在五、六月间，一次听彭总报告时，我见到了原来在济南时领导过的兵工厂党员张洪涛同志。他告诉我，他是北方局组织部组织科副科长，我就和他说我毕业后想回山东，因为在那里搞了几年地下斗争情况熟悉。他赞成这个想法，并向组织部长刘锡吾同志作了反映。同时我也给黎玉同志发了电报，提出想回山东工作。不久张洪涛告诉我，北方局了解了我的情况想留在北方局组织部工作。我一心想上抗战前

线，就说，我反映我的意见，希望能回山东工作。刘锡吾同志还亲自找我谈了一次，看到我的决心很大，就同意了我的要求。这时新八旅政委肖永智同志知道了，就找到刘锡吾同志说：“赵健民是我们新八旅的干部，怎么能去山东呢？”刘向他解释说，赵健民对恢复和发展山东地下党做了许多工作，他那里的情况又熟悉，还是回山东工作更合适。肖也说他来党校学习就是刘志坚主任说他是 有十来年党令的老党员，是山东地下党负责人。最后肖永智同志也同意我去山东。结果北方局组织部就给我写了去山东的介绍信。

四、到冀鲁豫三分区

由于当时敌人大搞治安强化运动，平汉路封锁很严，路西一侧挖有二、三米深，二、三米宽的封锁沟，来往过路很不容易。为了使党校毕业的这些干部安全返回工作岗位，领导上决定从三八五旅抽两个团护送过路，路东也从新八旅抽一个团迎接，我们去冀南、冀鲁豫的学员总的由肖永智同志负责带队，同行的还有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同志，出发前肖政委做了临时动员，要求很严厉，谁也不许掉队，掉了队要军法论处。过封锁线时，天不黑就出发了，七、八十华里，到半夜一点钟就赶到了。我们一到路边，就被附近的汉奸发现，点火向日军报告，炮楼就开了枪。指挥员立即下令全体战士马上填封锁沟，一声令下，人人动手，很快把封锁沟填平了一段，大家赶紧跑步过路。路西的过去了，路东也有一、二百人要去路西，还未等他们过来，日寇的铁甲车就赶到了。

一时间枪声大作，机关炮连连发射，子弹向蝗虫一样密集飞过来，洩光弹不断地射向天空，路口全被封锁住了。我们赶紧往东撤。不一会儿，就听肖政委喊“田厚义吗？”（田是二十二团长）我仔细一看果然是二十二团的队伍。见到了老部队，心里非常高兴。

天明的时候，我就看见了路东要过路的原来是张霖之、段君毅、曾思玉、许梦侠，还有冀鲁豫妇联主任郭军等同志。是去北方局汇报工作，然后也到党校学习。但路过不去了，再组织也很不容易，只好返回了。张霖之同志问了我的情况，听我要去山东，他很惊讶，忙和许梦侠同志商量要留我作三分区司令员。我说去山东是北方局的决定，有组织的介绍信。他便拿了信去找李大章同志。李说，“如果你们有要求，我可以代表北方局批准。”霖之同志又问我的意见，我说我个人意见是去山东，如组织决定，我就服从。他便给杨得志、苏振华同志发电报，请求批准留我作三分区司令员。过了两天杨、苏首长回电同意，并要我过卫河去见杨得志司令员。张霖之、段君毅他们没有过路，还想等几天看看是否有机会过去，于是就叫我带着去冀鲁豫的干部先走。

大约四二年一月间，我们几十个干部，还有警卫员和一些马匹，从南馆陶以北，过了卫河，当时河已结冰，我们就从冰上走过去，为了防止骡马跌倒，叫警卫员在冰上撒土，象一条土路。到达冠县西北后庄住下。后庄是我根据地，党支部很强。村干部见到我们都很高兴。那里还有我的一个同学叫徐书铭，他高兴地说：“健民回来了，做好吃的！”在后庄我了解到冠堂封锁沟已经挖成，李采有敌人炮楼，从唐寺

以东平沟可以过沟。天黑后，由村干部给带路再走，白天我们休息，晚上就从唐寺以东过沟，村干部带民兵把沟给填了一块。到了冠县西南屯里住下，屯里也是较巩固的根据地，村干部见到我们非常热情，特意做了好饭好菜（大葱炒肉）招待我们。在屯里我得知三分区司令部住在耿楼。

第二天，我们到了耿楼。我带着张霖之同志写的信，分区的同志也接到了杨、苏首长的电报。当时地委书记是申云浦同志代理、政委张希才、副司令赵尊康。他们见到我后，都非常高兴，专门安排了房子。

我同冀鲁豫干部到后庄并南来屯里后，外边就传开说，“赵三营”回来了。冠县的伪军立即下令加强戒备，出城十里得日军批准，说是赵三营回来了可得小心点。侦察参谋杜唐佑得此情报后立即向分区参谋长阎海清同志作了汇报，阎即来张希才政委处报告，这时我正和张希才、申云浦同志谈话。阎走进来说：“这个赵三营这么厉害，吓得伪军都不敢出来了！”申云浦、张希才同志忙笑着告诉他“这不就是赵三营的营长么，现在是咱们的分区司令啦！”

我和去冀鲁豫的几十个干部就在耿楼过了旧历年。我们分区司令部尽力招待这些同志，蒸了馒头，炖上肥猪肉，大家有说有笑非常高兴。我也给家中母亲捎了信，告诉她我从太行山回来了。她还特意蒸了一锅饅子馒头（用猪油、盐和花椒面和面）捎到分区给我和同志们吃。

过了年，我就去见军区首长。分区司令部派了半个骑兵团（有五、六匹马）护送，到了观城以东红庙（当时濮、范、观三县是我巩固的根据地，日本人没有占据过，就是来

一下也不敢住)。见了二纵队司令员杨得志同志、军区司令员崔田民同志、二纵政委兼军区政委苏振华同志。杨、苏、崔三位首长见了我很热情。他们说：“你是地下党的老同志，又是本地人，过去三营在三分区一带名声很响，相信你一定能把分区的工作搞好。”

我回到分区后，即和其他同志一道积极开展工作，发展壮大武装力量，加强根据地建设，不断打击敌人。当时分区的武装力量有：分区基干团三百来人，战斗力中等（三营是四百多人，最多到过六百多人，能攻能守，只要下令什么战斗任务都能完成，战斗力很强）。每县有一个县大队，冠县大队七、八十人；堂邑大队六、七十人；莘县大队不到一百人；朝城大队六、七十人；聊西和聊阳莘边也是两个县级单位，当时还属于秘密状态。由于堂邑大队被敌人挤出县境，只能在冠县一带活动，我就把堂邑大队改为马颊河支队；同样把朝城大队改为徒骇河支队。当时三分区的武装力量还打不过莘县的伪军（有一千几百人，作战时能出动千把人。有电话联系），但能打过冠县的伪军（六、七百人）。日本鬼子来了，我们只采用游击战术。由于在党校的学习，我的军事工作经验也得到了提高。特别是看了刘师长写的《一二九师两年来的战术报告》收获更大，刘师长论述了游击战、伏击战，举了许多生动的战例，告诫军事指挥员不要单纯的军事观点，要注意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建立巩固的敌后根据地。并要积极进行争取伪军的工作。在组织战斗时，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机动灵活，打不赢就走，不打无准备的消耗仗等，在战略战术上懂得更多了。我们分区设有电台，能直

接和军区通电报，经常得到上级的指示。这样，我就从一个营的指挥员，走上了军分区指挥员的岗位，并兼着地委常委，从主要作一个营的军事工作，到担负一个地区党政军统一领导进行全面对敌斗争的工作，军事、政治、地方各方面工作的知识和经验都提高了一步。不久，我就组织了全分区武装力量进行了北社庄战斗。

毛泽东同志交我带到聊城

致范筑先将军亲笔信的回忆

黎 玉口述

李士钊笔记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国民党政府所属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和其他旁系部队虽然数目不少，但有的不战而退，有的一触即溃。中共山东省委对原属西北军，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矩的估计是：他为了保存实力也会不战而退。我们根据抗日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和军阀韩复矩在一旦日军攻进山东，他就有可能逃跑的估计，在韩复矩逃跑之前，我们还是要争取他抗日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准备自己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这是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决定在山东全省具体布置和发动四面八方的抗日游击部队。其中对于鲁西北地区的工作方针是：团结驻聊城的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范筑先将军，在鲁西北地区搞抗日武装部队和抗日政权，同时决定不放弃通过这个地区原有的合法政权机构，组织和创造共产党人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民主政权，在上层通过范的政治部——实际上由中共鲁西北特委所绝对掌握——和我们的秘密党员张维

翰、张郁光、齐燕铭、姚第鸿和王幼平等同志进行工作，促进范筑先将军先后委派共产党人担任县长和游击支队司令，成为一个华北敌后最早的抗日根据地。韩复榘率领十万大军不战而逃，并被蒋介石设阴谋在开封会议时将韩逮捕，以后又在武汉被枪杀，已成为历史上的一个章节，而范筑先将军则坚决抗战到英勇牺牲，则成为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而且成为光荣的一页。

中共山东省委把开展鲁西北新政治局面的任务，交给省委组织部长张霖之同志，他作为省委代表驻在聊城，负责领导这个广大地区的工作，这是省委一九三七年十月间在济南定下的决策。党对驰名华北的“抗战老人”范筑先将军的争取团结工作，中共中央联络部的代表彭雪枫同志，早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就亲自到过聊城作了具体部署，范筑先将军作为一个国民政府的地方官员，是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责任感的。他能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在山东敌后坚持抗战，并和共产党团结合作，这在当时的局面下是很少有的。

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山东省委和山东纵队——山东八路军领导机关的前身，带领由抗大、陕公学生所组成的近二百人的干部大队回山东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叫我给范筑先将军带来了一封亲笔信，这是毛泽东同志对范筑先将军亲自进行的统战工作，也是进一步争取团结范筑先坚持抗战的重要措施之一。信件的主要内容是同情他并鼓励他，在山东敌后坚持抗战的重大贡献和深远的政治影响。因为当时山东西北部的抗战局面，在华北和全国的范围而言都是很有起色的，武汉和延安的党报和进步报刊，都赞誉范筑先将军是一

位著名全国的“抗战老人”。

毛泽东同志的亲笔信是用毛笔写的，重点是对范筑先将军进行统战性的鼓励和慰勉。同时我还由延安带来了武汉出版的毛泽东同志著《论持久战》一书，也是我亲自交给他的。当时的中共鲁西北特委书记是徐运北同志，以前的刘耀先（即刘宴春同志）病了，党的工作是由省委组织部长张霖之同志所直接领导的。这时特委已掌握了范筑先将军这一部分的政治局面和抗战武装力量。

我们由延安动身时，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和八路军山东纵队领导机关的干部，组成一个具有双层性质的干部大队，以后的明确职务如下：

黎 玉：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兼山东纵队政委。

张经武：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

江 华：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

吴克华：干部大队长兼政治部军事科长。

高克亭：山东纵队政治部组织科长。

李 林：山东纵队政治部总务科长。

王 涛：干部大队党支部书记。

当时省委和山纵有个核心领导的党委会，就是以上几位同志所组成的。

我们到西安时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休息了两天，临动身前适巧朱德总司令由前方骑马回来，他告诉我们要在河南浍池过黄河，然后到晋东南的长治十八集团军总部，在那里左权同志代表总部招待我们，四个大盘子菜都很丰富，他还详细地说到山东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性质。我们由山西长治出

发，经过太行山到南宫、临清而后到聊城的。

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到聊城时，首先接待我们的是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张霖之同志，鲁西北特委书记徐运北同志、其次是几位重要的秘密党员张郁光、齐燕铭、姚第鸿、赵伊坪等同志。我们都驻在聊城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当时的鲁西北军事教育团内，袁仲贤同志是教育长，他负责招待我们的生活，我们和干部队伍都住在这里。

范筑先将军曾在他的司令部办公室中请我们吃饭，司令部、政治部科长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场面很朴素大方，在长桌上摆了五六个大菜盘，肉很多。范说：八路军最讲究艰苦朴素，不讲究排场，饭前大家先座谈，他很高兴地问我们的姓名和年龄，他说：八路军集中了优秀英俊的青年干部，人才济济呀！并说：我已快六十岁了，老气横秋了，要向青年同志们学习。互相敬酒时，都很诚肯实在，没有客套话。

以后又在军事教育团礼堂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范筑先将军和政治部所属政治宣传文化教育机关的全体干部，都出席了这次大会，实际上这是一次我们带的干部大队，与中共鲁西北特委和政治部的干部胜利会师大会。范筑先将军在会上首先致词说：去年日寇进攻山东，我们鲁西北军民独留黄河以北孤军抗战，今年春天八路军一二九师进军冀南，使我们才有了友军支援。我六月间在河北省威县会见了徐向前副师长，并参观了他所领导的八路军一二九师部队，学习来很多宝贵的抗战经验。今天又见到你们中共山东省委和八路军山东纵队的诸位同志，以及大队的同志们到聊城来，还带来毛主席写来的亲笔信，使我感到无上光荣，今后一定不辜

负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对我们的指导，在抗战中一定要做出更多的贡献。他还表示要与聊城共存亡。

在欢迎会上，我和张经武同志先后代表中共山东省委和八路军，向坚持抗战的范筑先将军表示敬意，并代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向鲁西北的全体军政干部致以亲切的慰问。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关系，中共鲁西北特委在聊城还处于未公开状态，共产党和毛主席这两个响亮的词汇，在聊城举行的大会上公开出现还是第一次，使这次大会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了。

当我们发言时，范筑先始终站在台上没坐下来，但在一个国民党的代表发言时，范则坐下来用侧背对着他，从这一件小事上，可以看出范的政治态度明确，反对谁？赞成谁？这就成为最显著的对比了。

我和张经武同志等到聊城时，张霖之同志就告诉我说：范的政治局面和武装力量，部分已开始有了分化的趋势，因为原为旧军队出身的范的参谋长王金祥，已被由武汉来的国民党反动派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等人所收买，他们正在进行阴谋破坏和分裂活动。我们为了争取范筑先，并把范的几支武装部队变成进步武装力量，曾想把王金祥抓起来，但后来未搞成。当时在冠县、馆陶的第十支队是党的基干武装部队，可惜张维翰司令未来参加这次大会，我们也未及到第十支队去进行访问。

在那次欢迎会上，我们青年同志在会上演唱了几支抗战歌曲，其中有苏联十月革命时代的曲调，中国工农红军在江西时代填词的“上前线”和贺绿汀的“全面抗战”等。很

受到当地同志们的欢迎，这些歌曲后来都很快传遍鲁西北和山东各地，此外，中共鲁西北特委的同志们还在政治部救亡室，举行了一次茶话形式的欢迎延安战友的座谈会。那次会是由政治干部学校副校长（留日学生，左派教育家）张郁光同志主持的，他首先代表主人发言说：今天是欢迎娘家人的会，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感谢娘家人带来了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和毛主席的声音，使我们受到深刻难忘的教育。中共山东省委驻鲁西北特委的代表张霖之同志在发言时说：同志们经过千山万水长途跋涉来到聊城，带来了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对我们今后的工作开展，有了更明确的指针。我们一定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奋斗，以不辜负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会后聚餐，还请我们吃了聊城的著名特产“熏鸡”，大家吃得津津有味。当时中共鲁西北特委机关报《抗战日报》总编辑齐燕铭同志，特派该报记者到我们的住处，进行了专题访问。为了我们下一步要去泰西和鲁中的军事行动需要保密，我嘱咐他不要发表新闻报导。我和张经武同志都给他题了词。

我们本来想在聊城多住几天的，但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制造谣言说：八路军来了，他们要和政治部的共产党人里应外合夺取聊城。所以我们决定不再多住，以免影响团结抗战而赶快走了。我和张经武同志向范辞行时，也谈到这些谣言的事。范斩钉截铁的对我说：我绝不相信这种谣言，我更相信八路军也绝不会办这种蠢事，你们还是多住几天吧，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为了要赶路，希望早日到达鲁中山区的沂蒙抗日根据地。

我们离聊城之前，还留下了几个干部，其中包括邵汝群（即邵玉琢，朝城人，一九三七年抗战前聊城山东省立第三师范毕业，地下党员）和田兵（即王从化、临沂人，第三乡村师范学生。）两个同志，还留下两个老红军骨干，一个团级和一个营级干部。我们从聊城出发东进，过泰西抗日根据地，见到泰西地委的负责人张北华、段君毅等同志，又住了三四天，才又继续东进到沂蒙山区的。

赵健民同志一九三六年被捕前，原为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七·七”事变后，经过党的营救从济南监狱中出来，而后就由他的叔叔带他回到冠县故乡去，在冠县一带组织抗日武装部队。先在范筑先将军第六支队当过营长，以后又在“筑先纵队”担任营长。但是当时党中央不知道他在何处，直到一九四〇年才打听到他的下落。

一九三七年十月中间，中共山东省委决定把在韩复矩第三集团军政训处长余心清主办的政治训练班中的共产党员与民先队员，以及其他爱国青年都尽量多派到聊城去。鲁东，鲁南也去了少数人，都没有扎下根，只有在鲁西北聊城的范筑先将军部，而且有我党影响下的政治部（先叫政训处）协助接受了这一批爱国的青年学生。这些人中包括有留日学生，平津的大学生中“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分子，也有部分山东本地和济南部分爱国的大中学生与小学教师。当时为了储备干部，组织武装力量，我们尽可能的把他们派到鲁西北地区去，同时利用第六专署旧政权的形式，可以在县政府进行公开合法的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

山东省委一九三六年春天曾派刘宴春和徐运北同志到鲁

西北，是为了整理恢复并建立中共鲁西北特委，同时广泛地组织救国会，发动和吸收抗日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一切抗日群众到抗战中来，这是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

调张霖之同志到山东省委工作，是我于“七·七”事变后向中央提出的要求，经中央组织部研究同意的。原来的中共鲁西北特委书记是刘宴春同志，当时黄河以北山东所辖的地区叫“鲁西北”，党的名称也因地为名。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宴春同志因病离职，才由徐运北同志当特委书记的。刘宴春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同志，抗战前他在鲁西北做了大量工作。

聊城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为日寇所攻陷，鲁西北特委机关与山东省委联系暂时中断。一九三九年二月成立了以张霖之同志为书记的中共鲁西区党委，原范筑先将军部党的第十支队和其他几个支队的进步力量，先后改建为八路军“筑先纵队”和“先遣纵队”，正式归一二九师领导。一九四〇年下半年，中共鲁西区党委划归中共冀鲁豫中央分局，鲁西北地区就和中共山东分局没有关系了。

※ ※ ※

笔者附记：本文初稿系一九七七年二月十八日，在北京访问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部副部长黎玉同志的谈话记录。一九七八年一月中共聊城县委档案组，曾打印出来送请黎玉同志亲自校审，同年一月二十日，六月一日，十月二十日作过三次校订补充。一九八一年夏天我又在济南访问过一九三八年与黎玉、张经

武同志同时到过聊城的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山东省政协主席高克亭同志，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李林同志，再次作了回忆与补充，整理后又请黎玉同志于一九八一年八月二日作了第四次校订，当他们四十四年前路经聊城五天中，我作为一个青年新闻工作人员，参加了各种会议采访和接待工作，许多活动情况都是亲自参加过的。本来写过一个长篇报导稿，由于他们正在行军并涉及保密，而未在报纸上发表，事情过去已经快要半个世纪了，回想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此文几经核对，今后以此稿为准。

李士钊

一九八三年五月

轉战在鲁西北

李聚奎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①，敌人向鲁西北驻聊城县的范筑先部进攻。范与八路军统战关系较好，原来一直在鲁西北坚持抗战。敌人进攻聊城时，被他的参谋长王金祥（鲁西北的反共头子）欺骗。王金祥要范筑先留城内正面阻击敌人，坚守城墙，他说他带着大部队在城外从侧面打击进攻之敌。敌人正在进攻时，他带着部队跑到濮阳去了。敌人打进城时，范筑先牺牲在城墙上，范筑先的政治部主任姚××（共产党员）②亦同时牺牲。范筑先在世时，我党为了开展鲁西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就是以范的名义进行工作的。范的政治部长张霖之同志就是区党委书记③，范筑先个人也知道，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决定，范总是找张霖之同志商量后才办。所以，范筑先的牺牲，对我党当时在鲁西北的统一战线工作还是一个损失。

①日寇进攻聊城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十五日聊城失陷。

②姚为姚第鸿，政治部副主任，同时牺牲的还有共产党员政治部副主任张郁光。

③这时还是鲁西北特委，张霖之同志是中共山东省委代表。（省委组织部长）。

范筑先牺牲后，我由冀南去鲁西北。先到冠县找到了鲁西区党委书记张霖之同志，商量由地方党和十支队抽调一些干部组织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纵队司令部。但没有队伍，我由冀南去冠县时，只带了两个警卫员，在青年纵队警卫连借了一个排送我到冠县。由区党委从地方上和十支队抽调的一百来人组成了先纵司、政、供、卫机关，因没有队伍行动不便，报告师部批准，才从冀南调来一个二百多人的营，归先遣纵队建制。为了纪念范筑先，将原来以范筑先名义成立的十支队（约一千人，有党的组织，主要干部都是共产党员，如史钦深、赵健民、陈中民等同志）改名为筑先纵队（后来扩大到两个团，两千余人），对内由先遣纵队统一指挥。归先遣纵队统一指挥的还有青年纵队①的第三团、津浦支队（均在高唐以南地区活动）②。先遣纵队和筑纵在冠县、馆陶、堂邑、莘县、朝城、阳谷等地活动。

一九三九年二月中旬③，敌人开始了对鲁西北地区的大扫荡。莘县敌人向北扫荡，我以筑先纵队的两个营和先纵的一个营，在莘县城北的魏二庄伏击该敌，将敌击退。在追击中缴获敌人大车八辆，步枪十余支，山炮筒一个。为了反击敌人的扫荡，我采取敌进我进的办法，留筑先纵队在朝城、冠县地区活动，我率先遣纵队的一个营由堂邑以北转向高唐以南的刘来寺④，准备同津浦支队、青纵三团会合，乘敌人向我根据地扫荡之际，我军进到津浦路沿线向德州、济南段进行破袭。我在堂邑以北出发前已电告青年纵队三团、津浦支

①、②请参看《陈赓日记摘抄》一文注释。

③一说为十二月。④即琉璃寺。

队各来一位领导于三月五日拂晓前到达刘来寺等我共同商谈行动计划。青纵三团参谋长刘昌义、津浦支队队长孙继先于拂晓前到达刘来寺，我亦同时到达。我们正在交谈情况商量行动计划，队伍还未进房子，由高唐来的敌人突然撞到了刘来寺的北门口。鲁西北的村子大多数有围墙，我哨兵把围墙门一关，阻止了敌人进村。我当即决定要孙、刘二同志迅速回去，津浦支队向刘来寺以北由东向西侧击敌人，青纵三团即来刘来寺正面攻击敌人。但孙、刘回到驻地时，两处均发现敌人，来犯之敌都是汽车和骑兵。在平原地区我白天运动不便，同时我部队又是新组织不久，缺乏有经验的战斗骨干。为此，只好就地固守。如敌向我攻击时，我即以反突击打敌人。如此反复多次，敌人攻击未逞。我部于黄昏时突围，向东南方向转移，避开敌人的扫荡锋芒，转到黄河以南的大峰山（那时济南至开封段黄河无水）准备休整，三、五天后看情况即回鲁西北地区。

到大峰山以后，接师部电令，要津浦支队回鲁西北，先纵率的一个营和青纵三团去太行山接受任务。按师部电令部署，津浦支队回鲁西北。我率其余部队经梁山、豫北的滑县于三月底到达太行山的林县。几天后，师部指示转移到冀西，即邯郸、邢台之间的西部地区。当时的任务是与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及CC分子张阴梧联系（搞磨擦），阻止他们向南来，同时维护我太行山区冀南的交通，并负责护送我军去冀南、山东人员。

一九三九年七月，根据师部指示，青纵三团留在原地执行任务，我率先纵机关及一个营经冀南去鲁西北。这时，原

来的鲁西北特委改为鲁西区党委，鲁西北只划为一个地委，在军事、行政、党的关系均属山东省委和一一五师领导。先遣纵队和筑先纵队仍属一二九师建制。

一九四〇年六月，奉师部电令将先遣纵队的一、二团（第二团只有一个营）及筑先纵队的两个团和两个纵队的机关共六千余人合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新八旅，并转到冀南的三分区，鲁西北的工作全部交一一五师接受①。

我于一九四〇年六月调任山西的太岳区决死一纵队任副司令员，薄一波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李成芳同志任参谋长，周仲英同志任政治部主任。

（摘自李聚奎：《我的经历》一书，标题和注释是编者加的）

①、一九三九年七月六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命令，老黄河以北的鲁西北军事斗争，归一二九师领导。

战斗在卫河两岸

王化云

一、回故乡

一九三六年秋，我离开北平回到了南馆陶——我的故乡，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我是北平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学生。一九三五年八月大学毕业后，和北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付庆隆一起创办了北平精业中学，我担任校长。这时，国民党与日寇签订了《何梅协定》，华北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当时北平大、中学校里的大批进步青年学生要求抗日的活动很活跃，精业中学的学生也踊跃参加了“一二九”救亡运动，为国民党所注意，有个叛徒供出我校有几个学生是共产党员。一天晚上，警察到学校抓走一个学生，一个职员。这个学生叫严树勋（现在改名叫陶明，在辽宁省军区工作），被送到高等法院审判，那个职员过了十多天就释放了。陶明的案子分到刑二厅，厅长张跃鸾，是我大学班上教刑事诉讼法的教授，通过这个关系，向他说明这个学生没问题，又找了律师为他辩护。经过两个多月的活动，以保外就医的理由，花钱找了保人，将陶明保释出狱，陶明出狱后就离开北平到延安去了，付庆隆是教育局职员，要求

学校开除一批进步学生，我不同意，因此我们有了分歧，他说我掩护共产党在学校里活动，还在报上散布我是共产党，并准备武装接收学校，我在北平呆不下去了，经天津回到了家乡，我离开学校后，当了校长，在抗日战争中当了汉奸。

我在家住了个把月，接到聊城第六区专员公署张维翰同志的信，约我到聊城去。到聊城后，经张维翰介绍会见了山东聊城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范和张都是南彦寺人，距南馆陶只十五华里，因此也是我的同乡。见到范司令，我谈了北平和天津的形势，以及国民党汉奸和日寇的活动情况，大意是说：看来中日战争不可避免了。汉奸殷汝耕成立了冀东伪政权，在北平的国民党的军政大员都撤出去了（这是《何梅协定》其中的一条：国民党撤出北平），宋哲元的二十九路军驻在北平，看来日本人是决心对我们实行侵略了。范筑先一面听着一面在思考，我看得出来，他有些忧虑，也感到形势的确越来越严重。

当时，张维翰等人和省立第二中学、第三师范的几个朋友一起，正在进行反对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第三师范新校长冯谦光①的斗争，冯谦光是何思源的嫡系，一九三七年初，何思源撤了原校长孙芳时的职务，委任冯为校长。张维翰等人的目的，是把冯谦光驱逐出第三师范，搞臭何思源，把聊城教育阵地上的国民党CC分子赶走。我由于没有正式工作，也参与了这场斗争。有一天，张维翰面集我和汪伯岩（三师教员，临清人）等人商议，决定由我执笔拟定一个宣传品（实际上是控告书），列举何思源把持山东教育界所犯下的

①实为冯光荣。

十大罪状，散发各地，同时决定分三路到济南、南京和北平造舆论扩大影响。我和汪伯岩去南京。到南京后，先去教育部找着一位姓杜的司长（来南京前我们听说他和何思源有矛盾，所以找他），递上了何思源和冯谦光的罪状。杜看了以后说：何思源的问题，教育部准备调查落实，进行处理。离开教育部，我们又到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立法院散发了传单，这时何思源了解到教育部也有人对他不满，看形势不妙，借口身体不好离开教育厅养病去了。

从南京返回聊城后，张维翰对我说：反何运动就搞到这里，可以停止了，并告诉我说，彭雪枫同志由北平到了聊城，讲了目前的主要任务是促进国共合作，搞统一战线，主要目标是抗日。我们也要转到这上面来，下一步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国民党的军事部署情况，既然中日战争迟早要打起来，我们应当熟悉军事，有所准备。说完交给我一封信，

“这是写给我大哥的，你带上再到南京去一趟，找他会帮忙的。”张的大哥叫张维玺，是西北军的一个军长，当时在南京国民党陆军大学高级将领班学习。维翰信中写的大意是：现在看起来中日战争不可避免了，我们想学习一些军事知识，了解一下中央政府在军事上的策略以及有些什么打算，希望尽可能给一些军事方面的文件。我就带着维翰同志的信，第二次到了南京。

张维玺在南京鼓楼附近的一座小楼里，和孙连仲等几位将领在一起学习。我找到他说明来意，递交了书信。张看了信后，让我先找个地方住下来，过几天他找我。大约过了五、六天，张维玺通知让我去一趟。他告诉我，已经给搞到了一

部分文件，看桌上放一包文件已经封好了，他又给我办了一个护照，我就带上文件回聊城去了。

路上很顺利，没有碰到什么意外，回到聊城把文件交给张维翰，我上济南去了。后来知道这一部分国民党的军事文件，是彭雪枫同志托维翰要的，张维翰把文件给了彭雪枫同志。

二、兵荒马乱赴聊城

三七年五、六月份，时局越来越紧张，报载日本人指示特务不断到市政府挑衅闹事，市长张治忠竟毫无办法。过了没多久，张维翰和范筑先也先后到了济南。范筑先到济南的目的，是想摸一下山东省主席韩复矩的底。将来战争一旦打起来，有些什么对策。维翰同志对我讲：范专员是向韩主席请示对策的，看来不可能有什么结果，我们最好是找范专员谈谈，劝他留在敌后坚持抗日，打游击战。有天晚上，去范住的旅馆去看他，张维玺也在范处，从范的表情来看，当时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因为当时韩复矩的政策并不是留在山东坚持抗日，而是带兵南逃，保存实力的政策。这一点，不仅韩复矩如此，当时所有的军阀都有这样一种思想，只要有实力就有地盘，失掉实力也就等于失去了地盘，所以范筑先见到韩复矩，也得不到要领。那天夜里，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中心意思是：中日战争不可避免，靠国民党来抗日是靠不住的，我们如果想抗日救国，就必须留在鲁西北，坚持抗日战争。国民党第三路军必定会撤退走的，我们就动员群众打游

击战争。总之，坚持留在家乡土地上，与日寇周旋。范专员是个旧军人出身，他虽同意留在鲁西北坚持抗战，但不懂打游击，我们就向他建议与共产党合作。红军一直打了十多年游击战，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合作以后完全有把握打好。范筑先沉思了很久，最后表示愿意跟共产党合作，但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才能跟共产党联系上，张维翰告诉他：

“有我们负责帮助找关系。”（因为张维翰同志已参加了党组织，并且通过赵伊坪跟彭雪枫也接上了关系。）谈后，范筑先和维翰同志就回聊城去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了，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第三路军（韩复矩的第三集团军）设立政训处，余心清担任政训处长。余原是西北军军官子弟学校育德中学的校长，张维翰、牛连文、赵伊坪都是北平育德中学的学生。这时，赵伊坪同志进入政训处工作，经赵介绍我也到政训处工作。余心清找我谈话，决定派我到七十四师政训处工作。七十四师政训处当时住在潍县，处长是原第三师范校长孙芳时，我们彼此都认识。到潍县以后，委任我为少校政训干事，决定让我带二十名服务员（都是高中或大学生，统称服务员）到即墨县建立政训处的办事处，负责这个县的政治宣传工作。我换上军装，带上师部开的介绍信，就带领二十名服务员由潍县乘车到了即墨。县长当时是一个姓史的，原是韩复矩军法处的一个处长，见面后很客气，连声表示“欢迎”，并说吃、住都给作了安排，住的地方，就在县政府后边一处闲房子里，一切生活费用都是七十四师发给的。安置了以后，紧接着就召开了一次会议，商定第一步先开展宣传工

作。要让老百姓都知道，中国是个大国，日本是个小国，它想灭亡我们是完全办不到的，我们只要团结一致，抗战一定能取得胜利。当时决定，除留少数人在县城活动外，其他都下到各区去工作。

临下去之前，有三个当地人找到我要求参加我们的工作，一个是即墨中学的教员叫王唯一，黄埔军官学校毕业的学生；一个叫代秉林，是我在北平精业中学任校长时的一个学生；还有一个是北平大学的学生叫于笑虹。他们给我们谈了一些即墨县的情况，帮助我们开展工作。即墨城里天天有集，我们就每天到街上贴标语口号，散发宣传品，有时还向群众发表演说。在这期间，我们还亲自到乡下走了一趟，看到各处的宣传工作都初步开展起来，抗日救国的声音逐步传播开来。

九月初，政训处通知我回潍县，我把即墨的工作交待给一个服务员，就回到潍县，见到处长孙芳时。这时，国民党军队败退的消息像雪片似的飞来，平、津早已失守，敌人正在沿津浦线向南推进。第三路军总部来了命令，调七十四师到平原、禹城一带作战，让我把人员调回随部队行动。韩复矩的第三路军一共有四个师，调两个师到前线布防，一个师在山东德州和河北沧州交界的一带，七十四师开往平原、禹城，我立即坐火车到青岛，又从青岛乘汽车赶到即墨，见到史县长说明情况，又和王唯一等人告了别，就带领二十名服务员回到了潍县。

等我们赶回来，部队已经出发走了，没多久，在德州、沧州一线的部队往后撤，这时孙芳时带着政训处也往济南转

移。我到了济南第三集团军政训处，见到了赵伊平同志，他告诉我：平、津来了很多大、中学学生，以政训处的名义办个训练班，训练班由姚第鸿、齐燕铭同志主持，借用齐鲁大学的一部分房子，已经开始学习。这些学生学习热情很高，叫我去训练班给讲一下宣传抗日的经验。同时我也把在即墨县工作的情况向赵伊坪等同志谈了谈。孙芳时处长派我陪同山东日报的一名记者（叫什么名字记不起来啦）一起到平原、禹城去慰问军队。我俩带上政训处募集的慰问品乘火车到了前线，见了师长李汉章，李派作战处长接待了我们，到一些连队看了看，就返回济南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初，赵伊坪同志告诉我，第六区保安司令部政训处张维翰来电要求我调到聊城工作，政训处同意我回聊城工作。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孙芳时处长，离开七十四师政训处到第六区保安司令部驻济办事处去了。办事处的主任是牛连文同志，他当时正在替聊城政训处和省里交涉领取活动经费。他告诉我，先住下来等几天，待经费领到以后，你给带回去。我一直等了十几天，他才把经费领回来，有五块钱钞票。我在军装里边做些袋子，然后把钱缝了进去，牛连文还送我一支手枪和一些子弹。就在我动身之前，有两个聊城在济南上中学的学生，因回学校没有路费，找到了办事处来，连文同志叫我把这两个学生带回去。这时，济南的形势很紧张，日寇飞机不断来骚扰、扫射，城里一片混乱，七十四师也撤到了济南以南。连文同志也派人在长清县乡村找了一处房子，作为办事处的后方，存放运往聊城的物资。我和这两个学生乘办事处的汽车，到了这个后方住了一夜，第二

天赶到肥城城里，找到支应局，又给我们派了一辆马车送到平阴城，这天下着小雨，找了个饭店吃了饭，就从平阴过黄河了。过河的渡口叫胡西渡，属七十四师的防地，因为我带有七十四师的护照和政训处的证件，守卫渡口的营长对我很客气，马上派一条船把我们渡过了河。过了黄河，我们就沿着通往聊城的公路步行前进。待赶到顾官屯，天已经黑下来了，找了一家小店住下，等聊城来接我的人。这时战争已经打了几个月，大路上看到有向南方逃亡的各色人等，还有不少前线溃退下来的散兵游勇，这些人走到哪里，抢到哪里，乡村一片混乱，老百姓都很恐慌。就在这天半夜，一帮败兵到了顾官屯，又抢东西又放枪，村子里顿时乱成一团，跟我来的两个学生很害怕，吓得直哆嗦。我安慰他们，不要怕，这是一个小客店，他们不会到这里，真来了有我对付。果然这伙人没有到店里，在村里抢了一阵子就走了。

第二天上午，聊城派了骑兵带一匹马来接我，我骑马回到了聊城政训处。这时范筑先不在城里。我把给政训处带来的经费交给了张维翰同志，也把济南的情况向他说了一下。维翰同志也给我说了说聊城的情况，然后决定让我担任政训处总务干事。政训处设在东街的一个当铺里，设宣传、组织和总务三个科，宣传干事是邵子言，组织干事是冯基民，总务上有两个会计，一个叫王寿山，是本地人，一个叫王新三，胶东人，原名叫王墨臣。政训处里从平津流亡来的学生很多，都叫服务员，总务科给他们发些零用钱和政训处一些开支。过了几天，忽然接到情报，说日寇要进攻聊城，政训处由邵子言和我带领政训处一部分人员撤到城外。当时我们

这些机关人员都是徒手，政训处只有廖云山同志（是红军长征的干部）带一支枪。政训处机关人员撤到了城东南二十多里地的一个村子，住了二、三天，接到通知，日本人在堂邑北边让范筑先打了一次埋伏，跑回去了，我们又回到城里。

三、冰天雪地奉命西行

大约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驻馆陶县的政训干事王乐亭同志回聊城汇报工作。据乐亭同志讲，抗日战争打起来了，馆陶、冠县的县长统统逃跑了，地方上的土匪头子都乘机拉起了队伍，号称是“抗日义勇军”，实际上他们并不抗日，而是向老百姓要粮要人，扩充势力。各地的地主为了保卫自己，也都组织起武装，地方上很混乱，又加上这年大水灾，闹得民不聊生。王乐亭说在那里开展工作很困难，要求政训处派人到馆、冠一带帮助工作。张维翰向范司令请示后，决定派我和刘志远同志到馆陶和冠县，去收编当地的土匪部队和地主武装，发展抗日力量；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活动。委任刘志远为第六区保安司令部上校参议，我是政训处的少校干事，代表范司令去工作。

馆陶、冠县历来属东昌府管辖，馆陶城与冠县城相距只有四十多华里，这两个县是山东省的西北部边境，与河北省大名等县为邻，有一条卫河，把冀鲁两省连接起来，东可以出击津浦线，西可以出击平汉线，卫河可作天然屏障，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

我和刘志远同志奉命到馆陶和冠县去作收编土匪、民团

武装的工作。另外还有一个孙廷甫同志，是鲁西特委到馆陶去工作的。出发时，我换了便衣，又买了一件皮袄和自行车（因为刘和孙都有自行车），带上政训处捎给赵健民同志（当时在冠县）的匣枪子弹，三个人就踏上了通往馆、冠的大路。

这时已经下了大雪，由于我不会骑自行车，加上路滑不好走，过了堂邑走了二十多里到了冠县境，天已经是暮色苍茫了。正走间，碰到了一伙土匪有二十多个人把我们给截住了，不由分说把我们带进一个村子关了起来。以前，我们已了解到在这一带活动的土匪头子是石洪典，外号叫山根子，号称有几千人，也是我们要收编的主要对象之一。夜里这帮土匪审问我们，并搜去了我们带的钱、子弹，连我穿的皮袄和刘志远的毛袜子也给脱去了，我们说是奉范司令的命令，到冠县来找石司令的。他们就把我们赶到一个房子的套间里，派了几个人在外间烤着火看着我们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一人给了一个窝窝头。吃罢以后，要我们跟着他们到司令部去。走了约有两个小时，到了李辛村村西头一座小庙前，让我们在这儿等着，他们派人到司令部去报告。这天天气很好，雪住天晴，我们就蹲在地上晒太阳。不大一会，从村里走过来一个人，我一看，觉得很面熟，他也看出我来了：“那不是化云同志吗？”“是啊”，我边回答边站了起来。他问我怎么到这里来了，我就把经过简单说了一下，没等我说完，他就对看守我们的那一帮人说，这是我的朋友，你们不要管了，请我们到一农民家里，坐下来就叫人给我们倒水喝。这是个什么人呢？他叫郭芳臣，是一个地下老

党员，和我过去的一个塾师郭瑞符都是冠县三里庄人，他们是本家，过去我上学时，彼此都见过面。三六年我们到聊城后，他为打一桩官司找到了我，我通过张维翰的关系曾帮助过他，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党员，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从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他说石洪典的司令部就在这里，他打入石部当了石的秘书长。当他听说我们的东西还被搜去时，大发雷霆，当即把那些人叫来训斥了一顿，并命令把东西如数交回，不一会儿，土匪把东西送来了，但几百粒子弹只交回了一小部分（因为那时候子弹特别宝贵），钱也没交够。我们一想，算了吧，硬要也不大好，也就没有再追究下去。重新坐下来以后，我们就把来的意图告诉了他，郭听后表示完全赞同，并说他马上去找石洪典。这天下午，郭陪同我们到另外一家和石见了面。石当时有四、五十岁，身披大衣，腰里插着盒子炮，还系着红绸子，一副绿林英雄的样子。郭向他介绍说：这是山东第六区保安司令部的刘志远上校参议，王化云少校政训干事，奉范筑先司令的命令来找司令的。然后说到范司令要求把各地抗日的武装收编为政府的部队，统一指挥，抗击日寇的大道理和范司令的抗日决心。我们还告诉他说：“我们和范司令都是馆陶人，都是老乡，范司令又待人宽厚，归他是可靠的，不会吃亏。”郭芳臣同志也从一旁予以撙掇，石表示同意接受收编，归范司令领导，接着商定了一个意见：我们三个人留两个在这里，另外一人带上石的代表上聊城见范司令，请给部队编制和番号，谈妥之后，石很高兴，还摆上酒菜请我们吃饭，然后回到郭给安排的住处。我们感到收编石部的工作很顺利，大家很高兴，就睡了

一夜好觉。

第二天一大早，芳臣同志来说：石可能要变卦，咱们一块去见他，看他怎么说，石见到我们说：“你们和我说的，我是完全赞成。可是我们下边弟兄们意见很不一致，是不是暂不派人去见范司令，等以后再说。”我们一听就知道是变卦了。我们说，石司令再和下边商量商量也好，可是为什么变卦这么快呢？芳臣同志告诉我们：在临清住有日本人一个联队，司令叫高桥，他也要收编武装为皇协军，派了一个叫牛月广的汉奸来见石洪典。牛和石在一块当过土匪，牛拉的队伍也已投降了日寇，编为皇协军，牛又是当地人，和石的部下也有关系。牛劝石不要归范筑先收编，说范没有多大实力，皇军的力量很大，不久就要攻打聊城，扫荡鲁西北，消灭范的部队。不如投靠高桥司令，保证能得到好处。这么一说，石洪典动摇了。

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和芳臣同志分析认为，石现在不愿归范司令收编，但他为人直率，尽管是土匪出身，但对日本人的所作所为没有好感，不可能立即投日寇的。我们应该继续做工作，把他争取到抗日这一边来。但是，目前的处境，我和志远同志已不便继续出头做工作，就决定让芳臣同志以后逐步地去做石的工作，芳臣同志劝石把牛月广打发走后，我们又和芳臣同志交换了一些意见，并商定，如果这里的事有了进展，可迅速写信给赵健民同志。我们要马上去找赵健民做收编韩春河部的工作，今后就以健民同志那里为联系点。

第二天，我们在冠县北义村找到了健民同志，他带了十几个人，只有几支枪，我侄儿王振华（也是从北平流亡来的

学生)也带有一支匣枪,我把特委给健民同志的信件、子弹给了他,并将我们来这里的任务告诉了他。他给我们介绍了这一带的情况。这一带是韩春合活动的地盘,他也有好几千人,据健民同志讲,韩过去当过兵,后来又当了土匪,这个人的工作很难做,他手下有个叫陆子衡的参谋长,是个年轻人。这个人还可以。目前赵正在做他的工作。我们几个人商议一下,决定刘志远同志就留在这里,和健民同志一块继续做石、韩两部的工作,我回馆陶,做馆陶和邱县一带的土匪队伍和民团的收编工作。

因为这里有几千土匪活动,经常出来骚扰百姓,路上十分混乱,老百姓走路都提心吊胆的。为了安全起见,赵健民同志派人把我送到了冠县城北三里庄,到我塾师郭先生家里吃了饭,老先生让他的侄儿郭九峰送我上馆陶去。因这时南馆陶镇的情况我不了解,就先到了也村我岳父家住了一夜,问了一下南馆陶的情况。第二天,我二内兄送我回到了馆陶老家。

四、完成收编任务 创建抗日政权

南馆陶镇紧靠卫河,河东为小街,河西为大街,商业繁荣,是个水陆码头,卫河航运北通天津,南达新乡,千里卫河只这个镇有一座浮桥,又是西到邯郸,东到济南的交通要道,同时,也是馆陶县第七区公所所在地。我家住在河西大街上,父亲王仿古是个秀才,过去当过七区区长,曾在王占元(南馆陶镇人)做湖北督军时,做过相当于县长的官,

是县里一个士绅，我到家先做我父亲的工作，日寇要灭亡我国，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军队节节败退，范筑先司令与八路军合作，坚持要在鲁西北抗战，已经组织起来一支抗日队伍，打了几次胜仗，我和平、津、济来的大学生有几百人，在第六区保安司令部政训处工作，与范合作抗战，中日战争要打一个长时期，但最终是能够把日本打败的。我这次回来，是奉范司令的命令，收编民团、土匪，把他们改编为范司令指挥下的抗日武装的。希望父亲能帮助我做好这项工作。我父亲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愿意帮助我工作。接着我找到王乐亭同志和山东第四专区韩多峰专员派到馆陶县的县长韩子直，他们两人住在第七区区长兼南馆陶镇镇长张星五的大队部里，即王占元的房子里，人们称作将军府，可是他俩都是外地人，张星五对他俩不大理睬。我们三个人商量如何进行工作，当时馆陶县的情况是，有三部分地主武装：馆陶县东北部的李风藻有几百人，详细情况王、韩不了解，西南第八区区长郝国藩组织起来约千把人，队部在房儿寨；第七区就是张星五的武装，他有八个中队，有一千多人，是最强的一支地主武装。这些地主武装的口号是保卫家乡，不提抗日。此外在馆陶县的西北部和邱县、临清、威县连接的地方，有几股土匪部队：一是王金甲部，住在距南馆陶镇二十多里的徐村一带，有几千人；徐村北的吴作秀（修）部有千把人；靠近馆陶、邱、威三县边境是王来贤部，号称万人，这些土匪部队的口号是抗日，但暗地里与日寇勾结。对他们的情况还不清楚。商定先进行收编七、八区民团的工作。

张星五家是地主，和我家是邻居，彼此大声说话都能听

见。另外张家在镇上开有一个油行，其中有我们家对的股份。张过去曾在旧军队里当过兵，大个子，满脸黑麻子，心狠手毒，家里有小老婆，又霸占牛家一个女人，是个恶霸地主，周围老百姓，包括地主在内没有不怕他的。我和王、韩商定后，第二天就去找张星五了。见了他就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来是范司令派来的，任务是收编武装，组建抗日力量，也向他宣传了抗日救国的大道理和范司令已经组织起来一支强大抗日武装等，跟范司令走，共同抗日，是光明大道，并告诉张星五，范司令和我们是同乡，过去当过旅长，打仗有经验，已跟日本人打了一仗，消灭了一部分日军，还有张维玺的弟弟张维翰是第六区政训处的处长，跟他们一道抗日是可靠的。张星五当即表示说：“范司令和张维翰都是咱这里人，二弟（张过去一直这样称呼我）既然是把话说明白了，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范司令只要一来，我就归他收编。”

过了二、三天，我又去房儿寨第八区郝国藩的队部，郝是拐渠村人，他为人老实。我和他郝家有几个同学。张维翰的哥哥张维衡（做过陕西长安县县长）也在队部，我把聊城的情况，向他们作了详细介绍，并说范司令、张维翰同志派我来收编地方武装，组织抗日队伍，七区张星五已同意归范司令，我想你们不会不同意吧！他们表示完全同意。说范司令、维翰都是自己人，八区没问题。

我在房儿寨住了一夜，即返回南馆陶。王、韩听说郝国藩愿意归范，都很高兴。这时范司令派司令部上校参议王唯一来与我联系。我把这里工作的情况给他讲了，请他给范司

令报告，并希望范司令能在春节前后到这里来。王走后时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日本人步步进逼，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重要城市一个接一个沦陷的坏消息纷纷传来，张星五、郝国藩投范抗日的决心就动摇了。暗地里就与大名府日寇勾搭。有一天晚上，有几个镇上的同学来告诉我：“大名日本人派汉奸来劝张星五投降，街上已贴上大名日军的布告，听说房儿寨都挂上了太阳旗。”我听了非常着急，次日一大早我就到将军府找张星五，我说：“星五兄！咱这儿出了汉奸，街上贴了大名日本人的布告，你知道不知道？”他装出吃惊的样子说不知道，马上喊了勤务兵，叫去把布告都撕下来。然后他向我说他不愿意投降日本，可是大名、临清日本人都占了，他们有飞机大炮，我们抵抗不住，我当镇长，要是吃了亏，大家都埋怨我。我说范司令最近就要来，投敌是可耻的，也是犯罪的，怎么办你应该找七区的父老商量。张当即说可以给大家商量，明天上午把他们都请来，二弟你也来参加。我回家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父亲说不能投日本、当汉奸，叫我去找几个有影响、有势力的人去说服他们。当时乡间很乱，七区有名的地主大多住在南馆陶，半天时间我都串连了。第二天上午在将军府开会，我父亲带头主张归范司令，反对投日本人，大多数人都同意这个意见，张星五虽然是大队长，可是他的八个中队都是各村集中来的，大家不赞成，他也指挥不动，他说：大家说好，就这样办，二弟赶快催范司令来。

稳住张星五之后，我又赶到房儿寨找郝国藩、张维衡，我质问他们说：“原来说的好好的，你们为什么又变了卦，现在你们要当汉奸还早一点，中国还没有亡。”郝、张连忙

向我解释说：这是权宜之计，大名离这里只几十里地，打来了怕顶不住。你放心，范司令一来，我们就归范司令。我说那也不能挂太阳旗呀！郝说马上把太阳旗扯下来。我又说，七、八区如果投日本，其他几部分土匪打的是抗日的旗号，他们以打汉奸的名义来进攻，对七、八区是不利的。郝、张表示同意归范，并盼他早点来。这一场反复算暂时平息下来啦，当晚我回南馆陶。

一九三八年新年刚过，馆陶县民团总团长兼第四区区长沈兰斋来找我，他和张星五、郝国藩等一些区长们都是把兄弟，听说我代表范司令回到南馆陶，就赶来了，我把他安排到我家华宝昌商号里住下来。他先去看了张星五，晚上我把韩子直、王乐亭都约来见了面，我把聊城情况谈了谈，沈说馆、邱、冠等几个县，国民党官员逃走后，地主、土匪都拉起队伍来，群龙无首，一片混乱。范司令如能把这些队伍收编起来，对抗日、对地方老百姓都有利，既然七、八区都同意归范，西北边三大股土匪队伍我和他们有关系，我帮助你给他们联系。我们商议决定先做王金甲的工作，因为他就距南馆陶二十多里的徐村住。我父亲听说后不放心，因为我们家也是地主，这里的土匪经常借口敲诈，害怕我被他们扣住了，不想让我去。我安慰父亲：不要担心，我是范司令派来的代表，他们都正想找出路，不敢把我怎么样。我父亲这才稍稍放了心。然后我骑了一头小毛驴去徐村。沈兰斋与我约好先到一天在徐庄等我。在我快到村头时，看到村头有不少人，原来是王金甲和沈兰斋带着队伍出村二、三里路来欢迎我。到了司令部，王设宴招待我和沈兰斋。饭后，就谈我

奉范司令的命令来这几县收编队伍，组织抗日武装，并把当前抗日战争形势和范司令现有部队的情况告诉了他。因为沈已做了工作，王金甲有思想准备，王当即表示：只要范司令来，就归他收编。

我和沈继续北行。赶到吴作秀部的驻地。这时吴的母亲死了，正在家里料理丧事。沈出了个主意：借此机会去吴家吊丧。我二人到吴家给他母亲吊了丧。接着就到吴家谈了范司令收编武装的事，吴极表接受我们的意见。吴为什么会这样爽快呢？这里边有个原因：在这三股部队中，就数他力量小，又夹在王来贤、王金甲二部之间，就怕被他们吃掉，归范收编，就有了靠山。当时他还提出一个要求，让他的队伍向南馆陶靠近，住在王金甲部南边。我说回去给张星五商量后通知你。由吴处北行，到了沈兰斋的一部分民团驻地——立寨。

立寨是个很坚固的屯子，由于周围土匪活动频繁，周围不少地主都逃到这里。这些地主都靠沈兰斋给他们顶门面，沈家也搬在这个寨子里，我的同学韩金亭家也搬到这里，和他商量去找王来贤的事，沈说：“那里你就不用去了，李尚令、李延令弟兄在王的部队里，尚令以前是我们南馆陶第二高小的校长，延令在北平朝阳学院学习时就熟悉了，通过他们弟兄可以做王来贤的工作。”我回到南馆陶，把吴的要求告诉张星五，并说馆陶镇受王金甲的威胁，如果让吴部住我镇北边，这里就更安全了，张表示同意，不久，吴就把队伍拉来了。

不多久，西北军的一股队伍窜到房儿寨，大约有一个营的兵力，头目叫高德林。七、八区的人都很恐慌，害怕打起

仗来，我立即从馆陶赶到了房儿寨，见到高德林说明身份后，劝他投靠范司令，他不同意。我向他提出：“不投范司令可以，但这是范的防地，希望不要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他表示同意，住了几天就走了，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后来这个人投了日寇，当了皇协军。

过了春节，范司令派王唯一又到馆，冠来了一趟。王告诉我，堂邑、冠县的三股土匪（指栾省三、石鸿典、韩春合三部）现在还没有归收编，范司令决定亲自率两个营来，用武力解决，给我的任务是动员七、八区的武装，夹击这几股土匪部队，同时给了我旗号、灯号、口令、作战时间、部署以及会师的地点（冠县城东十里铺），范司令带人从东往西打栾、石两部，我们由西往东打韩部。

我把命令传达给郝国藩和张星五，他们都表示同意。这两个区大约出动了七、八百人的兵力，组成十来个连队，按预定时间分两路向冠县进发，由于这些土匪都是乌合之众，加上又是一次袭击，战斗打响后，他们也不知道来了多少人，一触即溃，可是我们派人到十里铺联系时，没有联系上，张星五大发牢骚，说我办事不可靠，上了范筑先的当等等。我当时也闹不清没接上头的原因，就叫他先把部队撤回去再说。撤退时把韩部的俘虏也都带到了馆陶。

刚回馆陶，范司令派人赶来通知：栾、石、韩三部已经投降，愿意收编，后天范司令就到南馆陶来。范司令来后，我把王金甲、张星五、郝国藩、吴作修等人向他一一作了介绍。范热情赞扬了他们的爱国之心和抗日行动，并说已把栾、石、韩部编为四、五、六支队。委任，张星五为馆陶县

保安大队长，吴作秀为第七支队司令，王金甲为民军二路的司令①，郝国藩部编入第十支队，各部仍在原地听候调遣。他们都很满意，表示坚决拥护范司令，参加抗日。馆陶县长仍由韩子直担任。范司令临行时，令张星五把韩部的俘虏放回，张口头上也答应了，但到了夜里他命令把抓来的人都装进麻袋里，扔进了卫河。这个恶霸地主的狠毒，由此可见。

这时，冠县还很乱，不少地主和绅士都逃到南馆陶居住（因为南馆陶是个很坚强的堡垒，过去曾有一、二千土匪都没有攻下来），他们中有些人向范司令要求派我到冠县当县长，范也表示同意。我父亲却坚决反对，他认为张星五把韩部人杀了几十个，他们都知道是我领着七、八区民团去的，怕出问题。范司令决定由十支队司令张维翰兼县长，我任秘书。

第二天，范司令派了一个骑兵班把我接到冠县城，张维翰同志这时也在冠县。我到了之后，范司令把我叫到司令部里（司令部设在一个姓侯的地主家里）对我们说：“冠县、馆陶这个地方系冀鲁豫三省边界，又跨卫河，打游击有回旋余地，地方上枪多人多，发展前途很好。你们又是本地人，在这里发展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是非常有利的，你们要充分利用这些好条件，做好这个地方的工作。”最后决定，张维翰同志主要抓第十支队的工作，负责组建部队。冠县抗日县政府的工作由我去接收组建，把政府的工作担负起来。

韩春合（韩春合即韩春河、韩春和）的冠县县政府就设在侯家的房子里，县长叫康纬臣，是城南康寺堤的人，曾经留学过日本，是个老先生，他名义上是在这里当县长，实际①一种说法是，范筑先任他为二十五支队司令。

土匪只拿他当一块牌子，没有什么实权。我接收他这个县政府什么也没有，一只铁柜里边有些高粱面窝窝头，炕上一领席，一条破被子，地上有一堆火，康把旧政府的一块铜印交给我就走了。我组建的新抗日县政府设了三个科。第一科科长是许禹范，北平大学农学院毕业，曾当过聊城师范的教员；第二科科长是由第六区专员公署派来的一个姓张的同志担任，主管财务工作；第三科科长是杨陶天，负责抓教育工作，杨也是南馆陶人，在北平时参加了党组织。同时，我收集了一部分旧政府的工作人员，组成了有三、四十人的抗日县政府，这时县城里还很混乱，加上韩春合的部队又住在城里，为了稳定秩序，顺利开展工作，趁范司令未走之前，我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范司令带的两个营暂时给我们留下一个；第二是把韩春合的部队调到城外去，范考虑了一下，答应留下一个营在冠县，关于韩的第六支队，将来要统统调走整编，现在先暂时调到城外去。布置完毕之后，范就带着一个营回聊城去了。

抗日县政府成立时，正是早春二月，当时困难很多，首先遇到的是部队和县政府人员的吃饭问题。由于连年遭灾，加之兵荒马乱，老百姓家家户户缺粮吃。县政府也没有粮食，买粮食又没有钱。我面集几个老区长商量，他们都说没有办法，最后和维翰同志商量，由我回南馆陶去想办法。我们家在南馆陶开有一个粮行，存着许多麦子，我想暂时借用一部分，一到夏季就有办法了。我把这些情况和要求告诉了父亲，他当即表示支持，并说：“麦子不用拉去了，叫峭镇上磨坊、馒头铺给加工成面粉、馒头给你们送去好了。”从这以后，这个营、十支队和县政府的人员吃饭就靠南馆陶

每天用大车送的白面、馒头。吃饭问题解决了，吃菜怎么办？我从家拿点，不能长久，也不是长久之计，要解决一个花钱问题。这时也见不到国民党的票子，老百姓买东西，做买卖都是以物易物，很不方便，工作人员也没有零用钱。大家想了一个办法：发行流通券，即用石印印成一角、伍角和一元一张的流通券，自己发行，规定在本县范围内可以交税，买卖东西都可以使用流通券。结果这个办法很好。布告一发出去，就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发行的当天就开始流通了。

接着，我主持召开了各区的区长会议，布置夏季征收粮款的事。冠县下属共八个区，当时的区长还都是由地主和绅士担任的。这些人对收编土匪，安定地方，建立新秩序很拥护，并且一致拥护我主持县政府的工作和征收粮、款。这期间还组织了一个征收处，起用了旧征收处的几个人。任命一个姓黄的为征收处主任，一个姓董的为副主任，他们对工作很熟悉。夏季麦收以后，照往常标准办好征收，这样，军队、政府的供给问题解决了，部队也能发展了。

五、聊城失守前后

一九三八年春夏之间，鲁西北和鲁西南这一广大地区抗战形势发展很快，范司令与我党密切合作，武装部队发展到三十多个支队。二十多个县建立了抗日政权，其中一些县的县长，是由政治部（党的领导机关）推荐的党员担任的，我党的工作在部队和地方都得到了大的发展。范司令到冀南南宫、威县会见了徐向前、宋任穷等同志，与泰西段君毅同志

领导的六支队，濮阳我党的晁哲甫、晁士高（在丁村率部作统战工作的）也都有了联系。济南虽然已经沦陷，日寇进攻武汉，范司令率部对日作战，抗日的士气很高，局势稳定。冠县、馆陶一带，在鲁西特委和早已建立起来的县委领导下，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

第六区政治部主任派高元贵同志来冠县担任动委会主任和郭英同志一起发动群众，组织了农民互助会、青年团、妇救会等抗日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在不长时间就发展到全县各个乡村，他们发动群众，动员参军，争取团结抗日力量，与顽固派作坚决斗争。我们收编土匪，恢复冠县秩序之后，冠县一个国民党的顽固反共分子，回到城里建立了国民党县党部，搞了些破坏抗日的活动。高元贵、郭英同志领导群众和他们进行坚决斗争，这一小撮顽固反共分子只得灰溜溜地跑了。六、七月间，十支队司令部移住北馆陶城里南大街大升银号；我仍主持县政府工作。县政府已有我和杨陶天、郭思高三个党员了。这年夏季丰收，十支队的粮款得到充分供给，同时对动委会和其他群众团体的困难，也给予帮助，军政民互相配合，发展了冠县大好形势。

十支队的基本队伍是我党组织的堂邑一支游击队，基础很好，这时已经发展起来，范司令留下的一个营撤走以后，又把石洪典的第五支队，韩春河的第六支队相继调出冠县。鲁西特委派来了一批红军的军政干部加强了第十支队的领导，不长时间就发展到了五个团，但部队缺少重武器，后来通过维翰同志和西北军韩复矩后勤部的联系①，买了一部

①韩第二九师军械处。

分机枪。买枪的钱全部是靠工作人员捐献的。我也捐了不少钱，因为我爱人在粮行里有一股投资，我把这部分钱全部取出来捐上了，大约买了十几挺机枪^①，还有一部分子弹。枪买回以后，在如何分配上还发生了一点分歧。第二营长张维德（维翰本家的一个哥哥，是个旧军人出身）主张平均配给三个营，一营营长刘志远（刘志远即刘致远）同志认为应把这些武器集中交给一营，形成一个拳头，作战才有力量。我支持志远同志的意见，并得到维翰同志的同意，把机枪给了一营，称为机枪营。这几个营组成了第二团，作为十支队的主力，刘志远同志任过红军师长，有作战经验，担任了该团团长，下属的营、连干部，有些是红军，有些是学生和西北军的下级军官，第十支队的力量加强了，不断打胜仗，在当地威名大震，同时冠县县政府也发展了一个游击营和一个警卫连的兵力。

维翰同志领导的第十支队移住北馆陶城里后，维翰同志推荐他的同学冉光远任冠县县长。冉是北平民国大学毕业的学生，来冠县之前是聊城专员公署的一个职员。他也是我的老朋友。十支队的钱、粮供应，绝大部分靠冠县。在这个问题上，光远同志总是留下一手，不肯全力支持，供应处长王润槐对此很恼火，还有动员委员会、互助会、青年抗日救国会等团体，遇到困难找着他总是得不到支持。六月到九月之间，范司令曾两次到南馆陶和威县会见我军徐向前、宋任穷、杨秀峰、李菁玉、陈再道等同志。有一次路过冠县时，随行的政治部总务科长张廉芳找我和冉光远同志，谈话中间，

^①一说为二十二挺机枪。

动员他参加党组织时，他摇摇头，一笑置之。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聊城失守。范筑先将军壮烈殉国，我党的重要干部姚第鸿、张郁光等也壮烈牺牲了，政治部的人员大部分都撤退到了冠县。聊城失守后，鲁西北的局面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敌人除控制了聊城外，大部分县城也被日寇占领了，我们的县政府也转移到了城外打游击，抗日武装方面，范司令的部队向坚持抗日和投降日寇的两极分化，三十多个支队，真正有战斗力的实际上只有三个支队。一是我党领导的第十支队，有五个团，第二个是王金祥的支队（王是范司令的参谋长），这个支队的基礎是原来第六专区的保安大队；第三个有实力的是齐子修的支队。王金祥这时退到了朝城、濮县、范县一带，在我们十支队的南面。齐子修撤到了茌平、博平、聊城以东地区。其它的支队有的被他们吞并了。我党掌握的牛连文同志的第十一支队、冀振国的十三支队、管大同的三十二支队也都被王等反动派挤垮了，冀振国跑到冀南特委去了，牛连文同志只带了两名干部和一名警卫员来到冠县，我党在第五支队工作的干部，也带了一部分武装出来。范司令委派共产党员当县长的十来个县，也部分都撤退出来，莘县县长吕世隆同志被他们杀害，在敌顽进攻的混乱情况下，冉光远同志也跑到临清去了。

就在这时，十支队二团在莘县和王金祥打了一次仗也失利了，王声称要消灭十支队向北边打过来，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幸好这时八路军陈赓同志的部队从冀南到了这里，王金祥才吓缩了回去。从此第十支队改为“筑先纵队”。不久，李聚奎带领先遣纵队来到这个地区活动，局面又稳定下来

了，鲁西北根据地的各项工作继续向前发展。

六、在与敌顽斗争中，扩大和 巩固了根据地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特委决定让我到邱县担任县长，因为邱县这时也没有县长，我带了十几个人的武装和几名工作人员到了邱县，住在城东边的一个村子里。首先召开了一次区长会议，布置了两项工作：一是要安定地方，发展抗日武装，搞好征收工作；另一方面根据和敌人打游击战的精神，动员群众拆除城墙。因为在这以前，我已经学过了毛主席《论持久战》这篇光辉著作，认识到这一阶段的游击战争还是长期的、持久的。三九年一月间，我们正在领导群众拆城墙，听到北边有枪炮声，不久刘邓首长派了一个参谋来告诉我，一二九师在威县附近的香城固打了一个胜仗，消灭了一批日寇，我们的军队要转移，让我们也做好充分的准备。第二天，一二九师骑兵团来到了这里，给我布置了一项任务：在香城固战斗中负伤的同志已不能随部队行动，让县政府给安置到一个比较可靠的地方治疗休养一个时期。刚好从南馆陶拉来白面、馒头、猪肉和蔬菜等准备过春节吃的东西。接到任务，我就带着县政府人员到南馆陶接收伤员，并把过春节的食品都给了伤病员。县政府也转移到南馆陶西南十几里地一带活动。一二九师部队从南馆陶过河南去，又从金滩镇过到河西。跟敌人转了一个圈子，把跟踪的敌人甩掉，由大名

境内又转回冀南去了，掳复扫荡的敌人没有找到我们的队伍，就走了。

三九年二月，我带着邱县县政府的人员到了冠县，想请示一下特委下一步如何办，这时冠县的各群众团体说冉光远可能有贪污，要清算政府的账目。这样以来，冉光远同志辞职走了，冠县没有了县长。特委作出决定，让我仍回冠县，担任县长。

任职以后，我们县政府在县委领导下，主要抓了四项工作。第一项工作就是改造区政权，把权力从地主和绅士的手中夺过来。先设了三个政府的办事处：城东、城南和城北办事处。城东办事处主任是于少畲，城南办事处主任是史秉直，城北办事处主任是杨陶天，三个主任都是共产党员。办事处成立以后，首先集中了各区的武装，每个办事处编成一个中队（后来合编为游击营），紧接着就开展区政权的改造。冠县所属八个区，除了第八区当时没有解决外，其它七个区都由共产党员担任，基层政权也基本上由共产党控制了。

第二项工作，根据赵伊萍同志传达上级党的指示精神，大力宣传执行减租减息，以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同时在进一步深入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的基础上，发动各阶层和全体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持抗日活动和发展抗日武装。

第三项工作，动员群众，拆除城墙，挖深所有的大路沟，使沟沟串通，并号召把所有养的狗统统吃掉，以利于开展游击战争。

第四项是搞好统一战线工作。虽然区政权被改造了，但团结上层爱国人士共同抗日仍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为

了更好的开展统战工作，我说服动员了两个人到县政府工作，一个是许禹范，三八年在县政府担任过科长，后来跑到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那里，国民党政府被敌人打垮以后，他又回到了老家许刘村，这个人在上层人士中有一定影响。另一个叫崔竹宣，是宣传界的知名人士，城东桑阿镇人。这个人为人正派，在冠县威望很高，我就请他担任了县政府的教育科长。这样一搞，我们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也顺利开展起来了。

这年春天，敌人已经占领了鲁西北的大部分县城，冠县城也成了日寇的据点，馆陶的形势也起了变化，日本占领县城后，县长韩子直（是个国民党员）溜之大吉了。韩子直跑了以后，鲁西区党委书记张霖之同志给我说，区党委决定派牛连文同志到馆陶当县长，兼卫西指挥。如果不对实力派张星五做些工作，恐怕不好办。叫我到张星五那里走一趟。我见到张，对他说：“上级决定牛连文同志到这里当县长，他是我的好朋友，希望你们能很好合作。”张表示欢迎。之后我陪同连文同志到了馆陶，这时八区的郝国藩部早已编为独立团，郝任团长，这个团和馆陶县大队，统一由连文同志指挥。

冠县城被敌人占领以后，我们就紧紧围绕着县城活动，警卫连随县政府打游击。这个时期，我们继续进行发动群众，动员参军，征收公粮等工作。

有一天，妇救会报告，城西唐寺一个叫孙长有的地主，污辱破坏村里的妇救会，骂妇救会是“缝兵”，激起了群众的义愤。在讨论如何处理时，有的同志主张把他处决掉，杀一儆百；有的持反对意见，认为他只是骂了一句人，杀了不

合适。我提请县委讨论（我是县委委员，统战部长），也觉得杀了不好，那样影响太大，就决定罚他一大笔款，并交群众批判，杀一下他的威风，并警告他如果再犯，就加重处理。

城东北第六区南张庄有几家姓南的地主，他的寨子里有五、六十条枪，不让区政府的人员进他的寨子，也拒绝向政府交纳粮款。我们经过商量，决定打这个土围子。我带着一个营和一个警卫连，先到了南张庄，派人去和他谈判，说服他们服从抗日县政府的领导，但他们拒绝谈判，连寨门都不让进。我就下令把寨子给包围了。因为南张庄距堂邑很近，为了防止敌人来袭击，派了一部分队伍监视堂邑的敌人，这边发起进攻，打了整整一天，也没有攻开寨子，倒有两名战士挂了彩。后来我们决定用挖地道的办法靠近围寨，一面在挖地道，绑云梯；一面喊话，开展政治攻势。这样一搞，地主害怕了，要求和我们谈判，表示愿意接受县政府的条件，但要县长亲自到他寨里面谈，我们的营长、科长不同意我一个人进寨，怕有危险。我对大家解释说：“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的。因为我们已经把他的寨子围得水泄不通，尽管他有几十条枪，但和我们的武装比起来要差得多，如果我们打进去，他男女老少几十口都在里边，他们杀害我，后果是很严重的。他们现在愿意接受谈判，说明他已经软下来了，是不敢轻易对我下手的。”大家这才放了心。我带了一名警卫员进了寨子，地主把我让到客厅里坐下来之后，我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服从县政府的法令，拥护抗日。按规定纳粮纳税，另外把枪支统统交出来。地主们表示完全接受抗日政府的条件，要求部队不要进寨子，保证他们全村财产的安全。我

说可以，你们把所有的枪支都送到这个院子里架起来，我只令一个班进来把枪拿走，政府的部队撤到大张庄。南张庄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与此同时，开展了对投靠日寇的伪人员的政治攻势，在县城附近张贴布告，警告他们不得破坏抗日或残害老百姓，否则以汉奸论罪，予以惩处。对特别坏的一个投敌的坏家伙，被我们捉住，在城西一里庄把他枪毙了，并贴出布告，宣布他的罪状。但对一般的敌伪人员在城外乡村的家属，我们不抓不罚，这样没有造成红白对立，我们政府人员经常能在县城附近活动，抗日人员在城附近的家属，他们也不敢伤害。

一九三九年秋^①，“筑先纵队”改编为八路军新八旅，张维翰同志任旅长，袁仲贤任政治部主任。就在这时，张星五这个反动的家伙和我们的部队闹磨擦。有时我们部队从南馆陶过河，他经常把浮桥给拉走，连文同志是县长，但他不听连文同志的指挥。中秋节过后，张霖之同志（原山东省委书记，任鲁西区党委书记）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征求我的意见，看张星五还能不能再争取一下，我说：“根据我的观察，张是一个地道的顽固分子，已很难争取，不如及早采取措施。”张霖之从冀南调来了一部分部队，又把独立团也集中到房儿寨，牛连文以卫西指挥的名义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张星五带着他的中队长到了房儿寨。连文同志请张到指挥部，一进门就把他的两个警卫员的枪下了，他回头就跑了。那些中队长在一个房子里都被解除了武装。张跑到村子北边一个苇坑里藏起来，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有几个张星五的

^①据考证，系一九四〇年四月。

兵从这里路过，他就从里边爬出来想逃走，被我们巡逻的战士发现，喊话他不出来，就把他打死在苇坑里。对张星五的部队都编入独立团。我奉命带着冠县的游击营住在卫河东南馆陶附近，监视张星五部队的行动，张被处决后，他的部队纷纷溃败，我收容了一部分人枪，交给了连文同志。

这年的夏天，小麦快要成熟的时候，我们在冠县城西南的南盘村打了日本人一次伏击，当时的情报工作搞得很好，敌人每次出动的时间、地点和目的，我们都提前能得到。抗日县政府成立时，我们录用了一个叫王怀书的旧衙役，他是冠县城里的人，是个大烟鬼，孤身一个，无依无靠，参加工作后，戒了烟，对政府很感激。日本人占了县城，特意把他留在城里，他和旧政府投敌的人很熟悉，常常从那些人中打探出敌人的活动情况，把情报送到城附近我们安插的关系人手里。这次我们得到日本人要到南盘消息以后，我们带着一个营和一个警卫连，提前埋伏到了村北边的一条路沟里，计划从侧面打击敌人，打完之后往馆陶撤退。埋伏下不久，敌人就到了，前面是日本人的汽车开路，后面跟着日本人和伪军约有一、二百人，待敌人过去了一半，我们的枪响了，敌人顿时就乱了套，被打倒了几个，敌人调回头来向我们组织进攻，我们就按原计划撤退了。打了一个小胜仗，我们的部队没什么伤亡。在馆陶停了一天，我们就回冠县。

一九四〇年春①，成立了鲁西北行政委员会，鲁西北七、八个县的县长和新八旅的干部都到馆陶西部西河寨②参加了

①据考证，系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②另一说法，是在拐渠村。

大会，会上选举张维翰同志兼任主任，荆汉杰同志任副主任，荆是从冀南调来的干部。牛连文同志仍任卫西指挥，兼馆陶县长。我父亲以开明士绅的身份当选为委员。这时，鲁西北有了一个统一领导各县的上级机构。冠县的工作一直开展得很好，武装也发展到三个营。发展一个营就编走一个营，为发展壮大新八旅的武装做出了贡献。

一九四〇年夏初，李聚奎司令员命令县政府的部队在冠县城东截击国民党的顽固派石友三。我们的一个营在石部经过的村庄附近埋伏起来，打了他的尾部，打死打伤了一些人，还缴获了两匹马和一部分钱，原来我们打了他们的后勤部。

一九四〇年收麦后^①，成立了鲁西行政主任公署，在梁山县岱庙召开会议，各县县长，包括鲁西北、鲁西南和泰安、肥城、长清这一带的县都参加了。会上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曾思玉同志作了报告，大会进行了投票选举行署的主任和副主任，我和马继孔被选为监票。选举结果，鲁西军区政治委员兼司令员肖华同志（杨勇是副司令员）任行署主任，段君毅同志任副主任，实际上是他主持行署的工作。

鲁西行署成立以后，鲁西北行政委员会改为专员公署，紧接着又成立了鲁西北第三分区，牛连文同志担任分区的司令员，原卫河支队司令王笑一同志调任鲁西北专员公署专员。不久，地委书记许梦侠同志通知我由冠县调鲁西行署工作。我到地委拿了介绍信和组织关系，到郛城一带找到了行署，肖华同志接见了，分配我担任了民政处长，从此我结束了在冠、馆一带近三年的战斗生活。

^①据考证，系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五日。一九八二年六月

鲁西北抗日游击第一支队的 创建与斗争

周乐亭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全面抗战爆发了，我心情十分激动，准备随时投入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去。但战争开始不久，国民党军队便节节败退，社会秩序混乱。鲁西北地区，土匪乘机四起，到处抢掠，豪绅地主亦以抗日自卫名义，强取民间枪支，成立武装自卫队，横征暴敛，使这一地区的人民群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身为山东省第六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的范筑先将军为此寝食不安，极力剿匪，救民出水火。

第六区辖聊城、堂邑、冠县、阳谷等十二个县，行政公署设在聊城。范专员是山东馆陶县人，当年已五十八岁，曾在西北军任过师长。一九三七年夏初，党中央派彭雪枫同志来聊城作统战工作。同时，山东省又派范筑先将军的老上级张维玺的弟弟张维翰同志来做他的工作，他表示愿意和我党合作，坚持敌后抗战。十月中旬，张维翰以第三集团军政训处的名义带领一批平津流亡学生来聊城，成立了第六区保安司令部政训处，范筑先委任张为上校处长。此后，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张霖之，鲁西北特委书记徐运北，红军干部洪涛、王幼平等同志也先后来到聊城，政训处便成为鲁西北特委的合法机关，特委以保安司令部政训处（后改政治部）的名义领导

鲁西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开创鲁西北平原抗日根据地。

特委决定建立一支在我党绝对领导下的游击队，便以平津流亡学生为主要成员的李福尧、刘昌、郭鲁、晋士林、陈中民等和我约二十人为基础，由解彭年同志以政训处住堂邑办事处少校干事的身份带到堂邑去组建。我们的职称是政训处上尉服务员。

解彭年是一九二九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三〇年转党的老同志，“七七事变”前在日本帝国大学上学，事变后回国，他的家庭是堂邑凤凰集（现属聊城县）有名气的地主。到堂邑之后，他就利用家庭的社会地位，自己的合法身份，进行游击队的组建工作。先向堂邑县政府要了十几条破枪，以我们二十余人每月二十元的津贴费充当经费，又向范筑先将军要了一个山东第六区游击第一支队的番号，任命洪涛为支队队长，在棠棣树叶变红的深秋，在日军大举南犯，人心动荡的鲁西北平原上，中国共产党鲁西北特委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游击队诞生了。

洪涛同志原名洪遇良，一九一二年出生在江西横峰县一个贫农家中，从小就给地主放牛和做长工，尝受了旧社会的不少辛酸。一九二八年十六岁时毅然参加了红军第十军，从战士起一级一级升到团长，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身材不高，举止端庄，说话和蔼可亲。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暂不宜公开他的身份，所以他很少公开露面，只是对少数人讲述红军用游击战术打败国民党军队的战例和在长征中的故事，我们听了之后对他本人和红军都十分钦佩。

为了便于扩大队伍，便于向农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熟悉农村地形，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成立后不几天，我们就开到农村去了，第一步就到了解彭年的家乡凤凰集。在那里，动员了一些知识青年和流散在农村的旧军人参加到我们队伍中来。人多了，但武器没有来源，为了解决武器问题，我们提出了“为了抗日救国，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枪的出枪”的口号，向那一带的地主借枪。解彭年家里有匣枪一支，长枪四支，匣枪由他二叔保管，长枪由长工使用。经研究先借用他家的这几支枪。当时提出了两个方法：一是由解彭年一人说服他叔父，把枪支借出来，二是由解彭年带几个人到他家去，乘他不备，突然把枪拿出来。最后决定先采用前一种方法，如说不通，再用后一种方法。经解彭年反复说明道理，他叔父以当时土匪多，需保卫家乡为理由，坚持不借给我们带走。并叫长工把长枪背到身上，自己把匣枪也背在自己身上。这样，后一种方法，便用不上了。对此，有些同志产生了不满情绪，我们就离开凤凰集，到其他村庄活动，一面派出一部分人外出借枪，一面由洪涛同志对全队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

有一天的下午，我正在擦枪，村里的人传说日本鬼子从村东边来了。洪涛同志沉着果断指挥，他命令一个班沿村中大路由西向东迎击敌人，两个班出西门，一个班自村北面，一个班自村南面向东门迂回，其余的人在村外西北方向一块坟地里隐蔽待命，我们三个班在村的东门外会合了，并未发现敌人。后来知道是坏人造谣，扰乱我们的军心。从此，我们对他更加钦佩了。

冬天来到了，我们没有棉衣和棉被，晚上有时找一间大

房子，在中间烧起木柴，大家围绕着火堆坐着或躺着过夜。有时找些麦秸铺在地上大家挤在一起过夜。由于长时间不洗澡，身上生了很多虱子，而且长时间吃粗粮和咸菜，这样艰苦的生活，我们都是第一次尝受。为了实现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愿望，我们以苦为荣，情绪都很高。拿我自己来说，当我上小学的时候，每逢五月七日老师就讲“五七”国耻纪念日的来历。从那时起，就仇恨接受亡国条约（二十一条）的袁世凯和日本帝国主义。一九二八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大肆杀害我国人民。我的一个亲戚从济南逃到我家，讲述了亲眼看到的日军罪行，使我对日本鬼子的仇恨更加深了，一九三一年我上初中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我和几个同学到聊城附近农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一九三五年冬，北平发生“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之后，我报名参加了聊城师范地下党员盛北光等同志发起的赴京请愿团，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由于学校提前放寒假，未能实现，但要求抗日的心情更加迫切了。如今十几年的愿望实现了，所以能以苦为乐。

在向地主借枪时，开始耐心说服，反复讲道理，使他们把枪暂时借出来，等打败日本鬼子后归还，并立据为证。后来借枪很困难，便产生了急躁情绪，对几家地主采用了带强制性的方法，把枪拿出来，这样引起了矛盾的激化。这一地区的一些地主就联合起来，制造谣言诬蔑这个支队是土匪，一面派人到聊城向范筑先将军的参谋长顽固分子王金祥告状；一面秘密组织民团对我们围攻，同时派人来和我们谈判。最后一次谈判气氛十分紧张，他们来的几个人带着子弹上了膛

的短枪，气势汹汹地来到我们住的一个大房子里，用威胁的语调说：“这里的民团粗野，如果不退回枪支万一发生误会，我们无力阻止。”我和几个人，左手把木柄手榴弹拿在胸前，右手中指套上拉火环，分别站在屋门的两侧和谈判桌的周围。我们的代表反复向他们说明抗日救亡人人有责，有枪的出枪，有力的出力的道理，答复一旦从其它方面弄到枪，就退给他们。最后，他们愤愤而去。从此以后，有些村庄就不允许我们进驻了。

大约在十二月中旬的某一天，我们住在名叫大觉寺的一座孤庙里。这天晚上民团向我们发起了武装进攻。洪涛同志一面命令两个班占领阵地进行防御，并鸣枪警告；一面组织一些人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抗日军不打抗日军”的口号。民团进到距我们约百十米时，停止前进，互相喊话。双方约定，他们派出代表二人到大觉寺内，我们派出代表二人到他们那边进行谈判。谈到午夜以后，达成三条协定。（一）退还借来了的部分枪支；（二）第一支队退出堂邑回聊城；（三）今夜停止进攻，并保证我们明天出境的安全。当夜就把几支好枪还给了他们。

第二天早晨，我们离开大觉寺向聊城进发。在所路过村庄的道路两旁，站满了持步枪和红缨枪的民团团丁，只留一条可供二人并行的空隙，名曰保护我们的安全，实际上是示威。

后来得知，当时主张围攻我们的地主们分两派。一派是顽固的，他们的论点是，第一支队里有共产党，共产党就是“共匪”，打“共匪”无罪。一派是开明的，他们的论点是，第一支队是范筑先将军的部队，支队长是他亲自委任

的，七七事变之后国共再次合作，共同抗日，共产党已经成为合法的了，若真打死支队一些人，范将军追查起来不好交待。最后商定，采用武力威胁的办法，射击时提高射向，不杀伤人；步步逼近，强行要回枪支，还用不让住宿、不给饭吃的办法迫使我们回到聊城，由王金祥参谋长制裁。

我们回到聊城之后，住在聊城师范里，继续进行训练。特委告诉我们，王金祥以我们强索民枪与当地民团发生冲突为借口，打算取消第一支队的番号，解除我们的武装，把人员遣散。我们听了十分气愤，表示决不能把这些来之不易的枪交出去，更不能把我们这支队伍分散，于是分头研究对策。

过了几天，王金祥通知我们去听他训话。我们估计，可能以训话为名，解除我们的武装。便决定准备流血牺牲，誓死不交枪。支队领导规定，去听训话时，政训处的服务员，有枪的人装实弹，没有枪的人拿一个木柄手榴弹，藏在衣袖里，并把盖子揭开，他若下命令缴枪，就坚决反击。

听训话的这天上午，我们按时进入指定的一个院子，在院子中间，面朝北站好队等候他出来训话。我右手提着手榴弹，稍息站立，不时向周围看望，看见东西两厢房的走廊上各有一、二个背短枪的卫士慢步活动，大厅前廊有时也有背枪的人从大厅中出来进去。

过了一会，王金祥出来训话了，出乎意料之外，他未下令缴枪，最后还讲了一个无聊的笑话。大意是过去在官场斗争中，北方人总是斗不过南方人，因北方人自己互相争权，互相拆台。南方人则是几个人凑钱先买一个官做，赚了钱共同分，然后利用北方人互相拆台的特点，把北方人挤掉，换

上他们的人。

因为预料可能发生的悲剧没有发生，我们唱着救亡歌曲，轻松地走回来。到了住地，我们几个人分析，他为什么未下令缴枪，可能察觉到我们准备反抗，若真的打起来，造成流血事件，他也不好向范将军交待。他讲的这个笑话，是影射红军干部和共产党的，因为红军干部大多数是南方人。

特委认为，这次危机虽然过去了，但住在城内很不安全，他们可能会用其他方法收拾我们，同时也不能扩大，便决定以进行野外演习为名，出城到由我党党员担任县长的阳谷县去活动。在出城之前，山东省委调洪涛同志到鲁中地区任山东抗日救国军第四支队队长，由廖云山担任我们的支队长。廖云山身材也不高，是红军四方面军的一位营长。洪涛同志走了，我们都很难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怀念他。

到了阳谷县，我们象鸟出笼一样又获得了行动的自由。这时有一股土匪在县城附近盘踞抢掠，当地人民要求我们把土匪赶走。廖云山指挥我们配合县里的武装，在一天的下午向土匪盘踞的一个村庄展开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夜晚，我们利用夜幕掩护，匍匐前进，接近村边沿时，突然投出手榴弹，接着发起冲锋，把土匪赶走了。

一九三七年年底，解彭年的侄子解长厚把上次我们没有借出来的几支枪拿出来，和政训处服务员史钦琛动员了大约二十个青年来到阳谷，编入我们的支队。有些当地青年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到一九三八年初，第一支队扩大到一百八十多人了。不久，特委决定把这个支队调到特委书记徐运北

同志的家乡冠县去活动。

到冠县以后，很快就发展到四百多人。这时政训处买了一些轻机枪给这个支队，编为机枪营，任命宁都暴动过来的刘致远同志为营长，并以这个营为基础和其他抗日力量合编，在冠县师范讲习所成立了第十支队，由政训处长张维翰兼任司令员，老红军王幼平同志为政治部主任。

由于我党的统战工作的成就，范筑先将军推诚和我党合作，在鲁西北平原二十多个县的广大地区创建了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给予高度评价：“河北平原、山东的北部和西北部平原，已经发展了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平原能够发展游击战争的证据。”并两次亲笔写信给范老将军对他慰问和嘉勉。民族败类、国民党顽固派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等，对这个抗日根据地和范老将军恨之入骨，便采用挑拨离间、金钱收买等手段疯狂地进行破坏。沈鸿烈首先把第六区专员兼游击司令的职务许给范将军的参谋长王金祥，再由王收买分化范将军的部队，然后伙同鲁西行署主任李树椿施展阴谋，配合日军一一四师团的平田大队，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把爱国将领、民族老英雄范筑先将军杀害于聊城。

范老将军殉国之后，他所属的部队公开分裂了。王金祥承受山东第六区专员兼游击司令的职衔，收拢被他收买的范将军的旧部，继续破坏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第三支队司令齐子修收容一些原系土匪的部队盘踞在茌（平）博（平）聊（城）堂（邑）、冠县一带，后投降日寇，公开与人民为敌。一时日、伪、顽十分猖獗，鲁西北人民又处于水深火热之

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救鲁西北人民出水火的重任，由我党单独担当起来。

为了集中兵力对付敌、伪、顽的夹击，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鲁西特委决定以第十支队为核心，与第六、七、二十五等支队在冠县合编为筑先纵队，任命原十支队司令张维翰为司令员。一九三八年底，我八路军总部为了支援鲁西北党政军民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恢复和巩固鲁西南根据地，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同志率部进入鲁西北平原，转战于冠县、馆陶、聊城、博平、高唐、临清、大名一带，所到之处，伪军被歼，日寇挨打。还任命李聚奎为一二九师先遣纵队司令员，肖永智为政委，率青年纵队第三团等部队转战在鲁西北。一九三九年初由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恒同志率领师直和三四三旅六八六团抵达鲁西抗日根据地。一九四〇年夏，先遣纵队与筑先纵队合编为一二九师新八旅。张维翰为旅长，肖永智为政委，王近山为副旅长，王幼平为政治部主任。原机枪营编为二十二团，一直奋战在鲁西北，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开始后，新八旅又改称晋冀鲁豫野战军二纵四旅。

毛泽东同志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九三七年秋洪涛同志带领的这个二十余人的游击支队，可谓星星之火，到一九三八年秋，就在鲁西北平原燃烧起来了。

时到今天，四十五年过去了。这二十多个人中的幸存者，都年过花甲了。当年满怀豪情壮志的行动，已成为历史，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我常想，青年人朝气蓬勃、勇往直前的精神，永远是可贵的。但急躁情绪，“左”的思潮，有时会带来不利。我们游击队成立不久，尚未和日军作战，就遇到三

次可能造成流血事件的危机。其主要根源是来自不抗日的封建势力。假若当时我们不产生急躁情绪，认真地、全面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不强行借那几家地主的枪，或适时先退回两、三支缓和一下矛盾，这三次险情是可以避免的。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五日

在孔夫子故乡的战争

——译自1940年美国纽约出版的
《中国的双星》第九章

(美)伊·福·卡尔逊遗著

李士钊 译

(一)到晋察冀边区阜平、完县

晋察冀边区为便于管理起见，划分为三个行政区。第一行政区包括山西省同蒲铁路以东，正太铁路以北的一部分和平绥铁路以南察哈尔省平绥铁路以南的一部分。第二行政区包括河北省西部正太铁路以北的河北省西部。第三行政区是河北省中部，这被认为是平汉铁路以东，石家庄到沧州（位于津浦铁路沿线）的公路以北的地区。（石家庄是正太、平汉铁路的交叉点）。这一地区北面以平津铁路为界。每一个地区都有一个行政公署主任管理它，对设在五台的边区政府委员会负责。

山西边界以东的河水是向东流的。虽然河北省西部丘陵起伏，但河北省中部和南部是辽阔的冲积平原。我不知道中国人当初在那个没有山脉的平坦地区，是怎样进行游击战争

的，他们的部队在那里是很容易受到敌机空袭的。

离开长城山区之后，我们来到龙泉关村庄。这里的墙上仍然留着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庚子年之役）被破坏时焚烧的痕迹。群众告诉我说，这次洗劫是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从那里来到这里的德国军队造成的。从北京到那里的直线距离为一百五十英里。在这以前，我并不了解在那次战役中，八国联军竟到达这么远的地方。

我们到达时，儿童团、妇女会、农会、商会的会员们都出来欢迎我们。在冬季西行途中，我曾在这里住过一夜。现在看到人民在政治上的进步是令人很感兴趣的。民族主义精神高涨，每个人似乎都担任某种与抵抗侵略有关的具体任务。妇女们给军队做鞋。傍晚，到处可看到正在辛勤缝纫的小组。另外有些妇女参加了乡村自卫队，因为年轻的小伙子都参军了，上了年纪的男人则在种地。在进村的路上检查我们的通行证的岗哨是个妇女。

看来儿童负责的任务之一就是保持乡镇的卫生。我偶尔看到有个孩子用传统的扫帚打扫街角，但是生活并不完全是工作，早晨到学校上课，晚上人们集中在一座古庙前唱歌和听讲话，或者听有关战争进展情况的报告。

我们是进入一个生产比较富饶的地区。第二天早晨，当我们向南到沙河河后去时，经过了种着谷子的梯田、白菜、土豆、玉米以及大豆的垄亩。在山坡上劳动的农民，用一种短柄的锄头锄地。他们用一只手锄头时，而另一只手则靠在一个短木椿上支持自己。后来，在平原上又出现了长柄锄头。中国人是讲求实际的人民。

傍晚，我们到达阜平。但是它已不再是我一月间访问时的那个熙熙攘攘的城市了。日本人三月间占领过这座城，有一半房屋被烧毁，人口减少到原有人数的一半。不过留下来的人斗志很强，在县长董越千的领导下，他们正在迅速恢复，秩序井然的生活。董越千是刚刚从大学毕业一两年的年轻人，我上次到这里时遇到过他。这是一次年青人的战争，特别是在游击区里，正是年轻人肩负着掌管军政事务重担。

这里还有一件使我感到意外的事：在这里我遇到美联社记者霍尔多·韩森(Haldore·Hanson)，他是在西去的途中到达那里的。我和韩森原在北平认识，他是在大学毕业后不久，于一九三四年到达北平的。就是在那时，当他试图在一片茫茫的混乱的东方政局中，辨别方向的时候，他已经显示出非凡的事业心和进取精神。他在正常的教学工作外，还积极参加地方民众的活动，深入地研究中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当他作为一个记者亲自出来观察这场战争的情况时，这并不完全令人感到意外。他的这次旅行使他成为访问晋冀游击区的第一个西方记者。

韩森大约是在一月之前离开北平的。在这个期间没有刮胡子。这种不整齐的胡子，使中国人特别感到惊奇，因为他们的脸上是很少有胡须的。晚上，我们大部分时间在交谈，因为我已经两个半月和世界脱离直接联系了，他是能向我提供当前情况的。早晨，我们互相换了护送的卫兵后，就朝着相反的方向进发了。两月后他将到达西安，而我却在深入山东省之后，从郑州再次进入自由中国。

汪洋是这几个年轻人中唯一吸烟的人。他羡慕我的烟

斗。因为我有两支，就送给他一支。因为沿途我经常把我的烟叶分给我们好客的主人，我的烟叶这时已所剩无几了。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对汪洋讲起阜平地区出产驰名华北的好烟叶。这时我们又满载大量的烟叶，这是一种细长、黄色而又多筋的烟叶，为中国农民所喜爱。可是它毕竟是烟叶，我们从阜平骑马东进时，贪婪地吸着，互相品评它出色的香味。

这条路是三月间日本人向阜平进攻时所走的路，沿途几乎没有一座房子。各村庄里的人已经回去，正在努力重建家园，但是仍然有许多人露天睡觉。幸而他们赶上是夏季，大量蔬菜正在上市，这使他们的食物有了保证。

骑马走了二十英里之后，我们离开大路，向北穿过一座矮山，进入一带土地肥沃的山谷，在这个地区的游击司令部里停下来，司令员和他的参谋们已经出征了，为准备对日本人在平汉线上的所有驻军展开配合一致的进攻。进攻将在战争一周年纪念日，即三天后的夜里发动，司令部里笼罩着一种就要发生重大事件的气氛。

这个军区的第四团负责护送我们穿过铁路沿线的日军防线。第二天，我们继续东进，到离日军防线只有十英里远的该团总部去。

王泽锋指挥这个第四团。他削瘦，两颊深陷，简直象消化不良的样子。但事实证明他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员。他显然是一位凡事都一丝不苟的人，团里的事务管理得井井有条。战士们整洁富有军队的朝气，生气勃勃地执行着任务。

这里有我在八路军训练的其他部队中看到过的同样的严格要求自己的迹象。不过由于王泽锋团长对细节的重视，这

支部队具有其他部队有时缺少的讲求效率的优秀素质。

他悄悄地解释说，我们第二天将在这里呆一天，六号早晨动身到离铁路较近的一个会合地点，要在夜间去穿过铁路。

那天晚上，在我们躺在用门板架在木马上临时搭起来的床铺上后，王团长来了。他跟我讲了这个地区是怎样组织起来抗日的，他的介绍生动地说明日本军侵入过的类似地区，都是怎样组织起来的。

他一开始说：“去年平型关大捷后，朱德总司令派遣了一一五师的一个旅到阜平来取得补给，并组织人民，成立了以王平为主任的动员委员会。多年来河北省人家里是可以有枪支的，以便防备土匪。现在把这些枪支收集起来用来武装游击队员和自卫队。几天之后，这个旅离开这里到山西繁峙去和日军作战，留下一个营在阜平继续工作。”

“王平到各县各村去组织动员委员会和宣传小组。旧的民政机构已经垮台，因为在侵略军到来之前，大部分官员早已逃之夭夭了。因此必须恢复秩序并使人民相信通过合作，他们就能成功地进行抗战，我协助这项工作，把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建立一支游击队上面，这支游击队最初被命名为第十团。十二月间，聶荣臻将军在阜平建立了晋察冀边区政府，此后，组织工作进展得更快了。这个地区就成为冀西第四区，而我这个团就成为第四团。”

这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可以想到，在实施这样计划的过程中，有上千个问题需要解决，政治机构只是其中一个问题。对人民进行道德思想教育一定是困难的。部队的征募装

备、训练工作本身也提出了问题。有组织补给问题，建立情报机构的问题，而最重要的是组织人们积极抗击日本抢粮队的问题。但是八个月后的今天，地方民政机构正在顺利地发挥作用，人民对最后胜利充满信心。这个团是一个有战功的军事单位，都穿着军装，装备精良、训练有素。

“王同志，你这个团打的仗多吗？”我问。

他耐心地对我笑了一下：“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打仗。”他回答说：“我们削弱铁路沿线敌人的力量。二月二十六日我们已在桑泉打了一场很激烈的仗。敌人调来一千多人攻打完县，配备有八十四辆卡车，十二辆坦克，上百名骑兵和十六门反坦克炮。在桑泉附近，我们用两个营攻打他们的侧翼，一个营去袭击他们的后方。黎明时，日本人撤退了，运走了三卡车死尸。我们估计他们有一百人被打死。而我们自己有五十二人伤亡，其中包括了一个营长和两个连长。”

（二）策马越平汉路、滹沱河到定县

七月六日黎明，我们开始朝着铁路前进了，由一个有二十几名骑兵的小队护送。这个小队是我们曾经见过的外表最整齐的部队，装备是一致的，每个人的毯子和盥洗用具都装在中国式的兰白格的棉马褡子里，马褡子搭在马鞍子上，马鞍子都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样子是一致的。每个人骑在马上都象个老战士，左臂挎着步枪，这是中国骑兵所喜欢采取的姿式。

我们通过这个地区，活动非常频繁。战士们正在向先遣

指挥所架设电线，一支担架队正在向前方进发，到处集合着手持扒铁路用的原始工具的农民队伍。大家都情绪饱满，当我们走过时，许多人向我们友好地挥手致意，但是没有人欢呼。战争已经进行了一年，已成为每天都要削弱和偷袭敌人的严酷的任务。

在离开铁路五英里的地方，我们快步进入一个村子，穿过窄狭和弯曲的街道，忽然领队的人停蹄下马，这是一个信号，大家都要照样做。象变魔术一样，老百姓突然出现了，并牵上马顺着街跑去。一个人抓着我的胳膊，拉着我钻进附近房子的墙洞，急速穿过窄狭的通道，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棺材铺的院子。这里停放着三排用厚木板造的很重的棺材。三个小伙子跟在我后边，我们的随行人员通知说，要在这儿呆到日落以后。

一切事情发生得如此迅速，而且又带有这样的神秘气氛，以致我们因行动仓促，情绪激动，不由得汗水津津。欧阳山尊估计了这儿的形势：

他解释说：“这个城镇经常被日本人占领，因为它位于日本人占领的铁路沿线地区之内。人民是忠于我们的。但是村里随时都可能有敌人的间谍，因而当部队进来时，他们尽可能赶快离开街道。”

院子里很热，这一天我们过得很懒散，喝着热茶，不停地挥扇消暑，推测着夜间可能出现的冒险经历。快到傍晚时，我们听到口号声和歌声。随从人员告诉我们，正在准备举行群众集会，以欢送集镇上的人出发去破坏铁路。

在太阳西落时，我们又骑上马向东慢慢地向东进军。麦

田、谷子和高粱地充满一片碧绿。在北方的远处，一支黑色的长长的纵队，正穿过田野，向东北的方向移动。在南边的远处也同样有一支这样的队伍。那可能是老百姓出奔去切断铁路。在村子里常常只能看见老太婆、老头子和孩子们。他们沉默和忧郁地看着我们走过。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看到很多类似的部队东去。可是回来的时候，人数总要减少，对这些人来说，战争毫无新奇和壮丽之处。战争是严酷的现实，这关系到他们的身家性命。

我们在一个村子里停下来，等着天色变得更黑些。人们立即端来热气腾腾的水罐，一盘盘的馒头（这是一种象面团一样的用笼蒸的面包）。一群热心的人站在我周围，想知道我是那国人。我告诉了他们之后，他们都以一种特有的方式，翘起大拇指，满脸带笑地喊道：“美国顶好！”（美国是个很好的国家）这是他们所熟悉的表示最高敬意的方式。显然，他们把我看成是个志愿军，因为当我们离开时，一位老人对我大声喊道：“你给我打死个日本鬼子，拴在你的马尾巴上带回来。”

当我们走近铁路时，突然北面和南面炮声响起来，这是正在进攻重要城镇。这时，铁路线可以看得见了，左边四五百码之外，一座建筑物隐隐约约地出现在地平线上，我后面的战士骑马跟着我，他说：“那是车站！它旁边的一座钢筋混凝土的炮楼里有四十个日本兵，但是他们晚上是不会出来的。”

突然，我们催马小跑起来，接着又急驰一阵，迅速冲过铁路，拐进一个树木隐蔽的小道。枪声从车站的方向传来，

但是我们并不介意，北方隆隆的炮声增加了。我们放慢了速度，改为快走，在蓝色的天空下，我们慢慢走了一夜。

午夜过后，我们到达滹沱河附近的一个村庄。这条滹沱河我在山西渡过两次，在冀西渡过一次。现在因为涨水河面宽达半英里。再没有理由急走了，白天渡河是比较安全的。所以我们翻身下马，露宿在柳树林里。在拂晓时，我们重新上马涉水过河，向李清镇进发。因为定县城被日本人占领了，定县县长的办公地就设在李清镇。

(三)在安国会见黄敬和吕正操， 在博野会见杨秀峰

现在我们到了河北省中部，马上就可以明显看出一些不同了。这里土地比较肥沃，庄稼品种较多，叶子长得比较茂密，人们也比较富有，这可以从以下几点看出：大房子的数目比较多，房子建造得比较讲究，穿长衫的商人，知识分子和地主的人数很多。第二天，当我们准备去安国时，我们吃惊地发现交通运输也有所不同，没有牲口为我们驮运东西，我们不得不僱一辆没有弹簧，走得很慢的大车，装行车，这种车通常被叫做北京大车。

县长亲自送我们到安国——这座城市以盛产中国药材闻名，我们在那里受到黄敬的迎接，他是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派去的。

黄敬是一位老朋友。他身材矮小，但很结实，精力充沛，英语说得很流利。他的态度很友好，有一种无可抗拒的

力量。他笃信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一些年来，他一直积极地，用他自己的信仰教育北平和天津的大学里的学生们。一月间，我在阜平见过他，他在那里的一所军事学校里主持政治教育，现在正在冀中政府做同样的工作。

他精神焕发，大声地说：“欢迎你到冀中来（河北省中部的古老简称）你认为新中国怎么样？”

我告诉他说，我对新中国的印象非常深刻，特别是对富有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合作，有深刻的印象。

他比较严肃地回答说：“我们这里取得了进步。但是还要做很多工作。整个来说，这儿人民的教育程度比山西高。日本人的残暴行为，使上层阶级认识到，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生活将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们也很聪明看出：只有所有阶级合作，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

接着，他指出了我已经注意到的一些情况。这里的军事指挥员多数是从前东北军方福麟部队来的，而政治领导人员则是从八路军方面来的。

黄敬叫来一部汽车，把我们送到在东北五十五英里任邱的司令部去。但是我们在博野停下来过夜，和我的一位老朋友前北平大学的杨秀峰教授谈话。在我开始穿过日本占领区进行第一次旅行之前，我曾在山西辽县（现在已改名为“左权”县——译注）见过他。

在这里，他和他的妻子正在计划开办一所军事政治训练学校，训练就象我在山西、陕西见到过的那些领导人。他们说他们将在八月一日开学，他已经收到一千份报名申请，报名的大多数是过去的大学生。

那天晚上，我陪同他出席了本地区军政领导人员的一个会议。会上对最近几周的工作进行讨论和批评。

批评时是不留情面的，这是一种健康的征兆。他们认为东边的津浦线，游击队的工作配合得不好，必须做些工作加以改进，据说保存多余粮食的方法是有缺点的。这里粮食充足，但因为是平原，很难阻止侵略者抢走粮食。会上指定了一个委员会，专门去研究保管粮食的方式方法。

会议指示的另一点是人民过分自信。近来，他们在和日本军队的遭遇中取得了胜利，但是决不能使我们因此而产生一种虚伪的安全感。决不能放松警惕，必须加强合作。

最后一点是农民中非农会会员和会员之间的分歧问题。会议主席指出：这一问题的解决，在于有组织的农民之间的加强合作，这样非会员就可能比较明显地看出参加农会的好处；但是他补充说，有组织的农民同无组织的农民之间决不能发生磨擦，决不能产生恶感。大家都是在为共同事业努力的兄弟。

我们第二天驱车到达任邱，沿途经过几座一度被日本占领过的工业城市，中国人民抵抗力量不断增长，给交通运输线造成了威胁，迫使日本人不得不撤退了。人们普遍热情高涨，认真参加各种活动。但是可以看出在这里社会平等的观念和严格要求自己的精神，却远远不如山西。在这里思想教育工作是新开展的，而且领导人缺乏训练。然而这一切活动都是在北平和天津的日军基地周围七十英里的范围之内，并且在铁路以东，只有二十英里的地方进行的，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

司令部实际上设在任邱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在这里司令员吕正操和冀中行政公署主任李乾道，以一个营的仪仗队来欢迎我们。

吕正操司令员是一位大约四十岁，沉着而谦虚的人。战争开始时，他是东北军万福麟部下的一位团长。他是一位具有训练有素的军官，那种挺直的体态和自信心，然而他又是好深思的人，尊重人的尊严，这鼓舞了人们的信心。

李乾道主任年轻得多，待人和蔼，心地良善，但缺乏感人的个性，外表也不吸引人。显然他的任命是暂时的。因为几个星期之后，他就被鹿钟麟将军解职了。鹿钟麟是冯玉祥将军手下的一位有名的将领，是从汉口来的。

这里的气氛有八路军的色彩。有小鬼和警卫员，人与人之间不拘礼节，象同志一样友爱。总部和在五台的晋察冀边区政府有无线电联系，同时与冀中地区内的各防地有电讯联系。

那天晚上，吕正操司令员和黄敬过来谈了话。我了解到有关这个组织是怎样建立的一些情况，但是我首先要知道的是我们穿过铁路的那天晚上在铁路沿线发动进攻的结果。

吕说：“我们的部队和铁路以西的部队互相合作，攻击了各地的日本驻守部队。占领了几座城市，一直坚持到敌人到达之时才离开。在定县和保定府只占领了车站，拆毁了各地的铁轨，破坏了保定府以北的一座桥梁，使铁路交通中断了三天，有三列火车出轨。”

这里抵抗力量发展的历史，是从七月和八月间日本侵略开始的。他开始说：“我那时指挥五十三军第六百九十一

团，日本人沿平汉线南下时，我们撤退了。我的团进行了牵制作战，十月一日我们到达在北平以南大约二百英里的赵县。我们向西移以掩护左翼，可是我们突然发现被包围了。我们于是向东打开一条出路，但这时我这个团减少到只剩一个营。我们和这个军的其他部队的联系被切断了，我用无线电通知万福麟将军，我们愿留在河北进行游击战争。”

“在博野，有些学生正在组织人民自卫军，同时在那以北，有一部分八路军已经越过了铁路。他们的领导人驻在高阳、蠡县和任邱，组织游击队并教导人民如何抵抗侵略。各部队的代表都要求我担任最高指挥，以便更好地协同行动，我接受了。”

“十二月间，尽管我们进行了抵抗，日本军还是占领了高阳及冀中其他一些县城。我认识到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打游击的方法，我率领我的一部分部队到了铁路以西，在那里我们接受八路军的教导。一月间，我们回去了，从这种经验中得到很大好处，并带回一个组织人民，建立游击队的具体计划。”

“八路军给我派来一些训练有素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员，我从我原来的团里挑选了一些军官去组织新的游击团。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时，我们同意参加这个政府，以便增进在北方的协作。这个地区表面上是属于第一战区，第一战区归郑州（河南）的程潜将军指挥。但是由于相距三百五十英里，又有日军部队阻隔，程潜已无法行使管辖权。”

我问吕正操，他如何克服在一个没有丘陵或山脉的地区进行游击活动的困难。

他回答说：“这是更困难的，特别是如果敌人使用机械化装备和飞机的话。不过幸而河北省有许多河流，有大片的青沙帐。我们用这些有利的特点，我们几乎总是夜间出动。我们的情报处能迅速提供日本军队的一切调动情况，所以我们能够按照自己的计划去打击敌人。”

他强调了聂荣臻将军曾在五台着重指出过的一点：“这儿的政府是省一级的，这个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由中国国民政府管辖。他说一切重要的政策问题，都要取得在汉口的中央政府的同意。

(四)过河间府安平县到东鹿城

“你想到北平去一趟吗？”吕正操司令员第二天早晨问我。

我吃了一惊。“你是说你的人可以亲自把我送到北平城里，而不让日本人知道吗？”我问。

“一点不错。假如你能抽出三天的时间，我们可以在一天内把你送到那里，让你在城里呆一天，第三天再把你接回来。日本人绝不会了解到任何情况。”

作为一次冒险行动这倒是令人兴备的。可是我暗自仔细思忖了一番之后，认为这不过是一件毫无用处的故弄玄虚之举。这些人能够完成他们所承担的任何任务，关于这一点，我是绝对坚信不移的。但是访问一次北平，却不是我的使命的一部分。如果万一万一被捕了，那么经中国人好意允许，我所作的记录和给我的地图，对于日本人是极其有用的。

我对吕正操解释了这一观点，他赞赏地笑了。我没有接受他的意见，而是前往离北平仅有五十英里的北部前哨处地霸县去了。我在这里看到了从日本缴获的更多的装备，其中包括一个对游击活动极为有用的枪榴弹发射器，这种武器有一个掷弹筒，八英半寸长，筒里有一个由指旋螺丝操纵的撞针，可以上下移动，以调整射程。它大约重十二磅，可以发射一个直径两英寸，高四英寸的炮弹，这样它就好比掷弹筒大，而比迫击炮小，他们用这一装备演习，最大射程达四百码，极为准确，样式是德国式的。

我和三个小伙子开会决定我们未来的路线。十二月我在辽县时，徐向前将军曾指挥一二九师，现在正在冀南的南宫创建那个地区。我们决定先到一百四十五英里以外的那个地方去，然后再向东去进入山东。第二天我们就出发了。

在内陆的这次旅行的过程中，我一直极其小心，预防痢疾，只吃熟食和自己削过的水果。我还避免使用中国正式宴会上总是要提供的热毛巾，因为沙眼（一种厉害的眼病）当时正在流行。冬季里，我是非常健康的，可是尽管多方预防，我还是传染上了痢疾和沙眼。我能够对付痢疾，可是我的药包里却没有任何药品能治沙眼，而这里又没有任何象样的大夫。

这种痛苦与其说是肉体上的还不如说是心理上的。我们骑马南行穿过冀中时，我的眼长了眼疵，我的眼睛要看不见了。所以当我到达河间时，发现城里有一位新西兰护士，真是一大安慰。事实证明普莱斯小姐（Miss Preece）是一位精力充沛的热心的妇女，她在这个当地教会医院里工作已经

十五年了。当她看到我时她笑了。

“沙眼！”她大声地说：“这没有什么，我们迟早都要患沙眼的。”她开始给我治疗，制止了沙眼的发展。

但这只是旅途中的一件意外的事情，要不是这件事，这次旅行本来是令人兴奋的。在每个城市，都在进行长期抗战的准备工作。剩余的粮食正在藏起来，通常是埋在地下，同时人民正在接受政治教育，这对加强人们忍受艰苦的意志是极为必要的。

当时正是西瓜成熟的季节，在这些炎热的日子里，我们常常停下来恢复精神。在一个总是喝滚水的国家中，能够吃点熟透的西瓜，使胃口为之一爽，简直是最美妙的享受。西瓜有几种，但其中味道最美的是“三白瓜”（三种白色）。这个名字的来源是，这种瓜成熟时瓜皮、瓜籽和瓜瓤都是白色的。

我们在安平再一次渡过滹沱河。在从安平去东鹿途中，我的裤子前面大部分被烧破了，这使我很尴尬。当时我慢慢地前进。心满意足地抽着烟斗，心不在焉，忽然闻到大腿上发出了衣服烧焦的味儿。原来烟斗里的烟灰掉到了腿上，烧着我的卡其布短裤。当我发现这一灾祸时，正在慢慢地冒烟的裤子已经烧成一个象我的两个巴掌大的洞。

在进入东鹿城门时要举行欢迎仪式，显然我的这个样子是不宜于受欢迎的。我们的行李装在大车上，而大车偏偏这一次又走在我们前头，这就更加糟糕了。于是我们哈哈大笑，策马急驰，沿着大路跑了五英里路，终于赶上了大车。三个小伙子和护送者围聚在四周，挡着好奇的农民的视线，

我赶快换上了比较象样的衣服，但是这个故事太有趣了，因而无法保密，在前往黄河一带之前的其余旅途中，总是在我人还没到，这件事就先传去了。

（五）在南宫会见徐向前和邓小平

经过五天的艰苦路程之后我们到达南宫。非常幸运，我又见到徐向前将军。他还象我在辽县看见他时的那样和蔼和满面笑容，但是也瘦了一些，而且看起来他很疲倦。

南宫是一个水果之乡。当在这里逗留的两天之中，我们谈话时，小鬼们便拿来桃、梨和苹果。朱德的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当时正在这里视察，他也跟我们谈了话。

这里有一种冀中所缺乏的沉着和自信。我试图分析一下这种不同的原因，感到这种不同在于领导人是沉着而自信的。这些八路军的人是满怀信心的。他们在为生存而战争的漫长年月里，深入而全面地考虑了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问题，他们的主张是肯定的和明确的。而且，他们对自己的军事战略和自己运用这个战略的能力，也具有无限的信心。

河北省南部地区（用中国话说叫“冀南”）位于构成冀中南部边缘的那条公路以南，介于西边的平汉铁路和东边的山东大运河。它的南部边缘是在大名以北不远的一条线之间，河北省在那里变窄，象一支平底锅的锅柄，一直伸延到黄河边。这个地区大约有八千平方英里，面积约和美国的马萨诸塞州相等。

日本人一度占据了从东到西横贯这个地区的一条公路，它把两条铁路联结在一起了，结果是人民遭受很大损害。在日本人向前推进时，中国的正规部队已经南逃了，人民只好自己想办法。有些人成了土匪，而另外一些人则试图组织起来，保护一些具体的地区。但是他们没有基本的计划，而且他们的活动也很分散。

徐向前告诉我：“那是在十二月间，这一地区的某些城市的代表来到辽县我师的师部，要求我们去帮助组织游击队。当时我们正在忙的腾不出手来，所以我派了三个训练有素的非武装人员和他们一起回来。几个星期之后又接着派了二十四个人，一月间又派来四个连。这些部队组织了巨鹿和南宫的人民，并为我们在这儿创建了一个根据地。三月间，宋任穷带着一个骑兵团开到这里，扩大了发展规模。在响堂铺打败了日本人之后，我率领主力部队到达这里。”

“你们在响堂铺是怎样打败日本军的？”我问道。

他回答说：“那是三月三十一日，一支约有三千人的日本纵队，带着一百八十辆卡车通过一个关口向山西开来。我们突然从侧翼对他们发动攻击，打死近一千人。但是战果中最出色的是烧毁了他们的全部车辆。”

我非常想知道他们是怎样对待中国土匪的。“你们消灭了他们吗？”我问。

他回答说：“在我们向他们说明了他们正在给中国人的事业造成的危害之后，他们还是欺压人民，否则我们是不会消灭他们的。”然后他对我讲了土匪必须满足哪些条件才能被编入八路军，他们必须同意：

坚持抗日直到日本撤出中国；
服从八路军的命令；
接受八路军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人员；
不危害人民；
定期提出收支详细帐目的报告；

实行八路军的薪晌标准（等级是战士每月一元，指挥员每月五元）；

吃同样的伙食。

他说，汉奸部队（指编入日军的中国部队）必须通过消灭日本人来证明他们的诚意。

“仅仅这个地区，大约就有五千名汉奸部队官兵向我们投诚了。”他说着慢慢地笑了。

我说：“徐同志，在我们谈条件的时候，我想具体知道每一个八路军战士都宣誓遵守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当我们谈话时，邓小平一直在大吃水果。这时他靠在椅子背上，积极地参加了谈话。

他说：“这些原则是：收复失地；开展我们所有军队的集体行动；动员人民；铲除汉奸和机关中的贪官污吏；建立一个民主政府；和日本、朝鲜和台湾农民一齐开展反法西斯运动；没收汉奸的财产用之于抗战；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的教育秩序；检举并逮捕汉奸；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他指出这几点时，我心里暗暗用我在山西、河北观察到的活动来和这些原则对照。我看到了实行每一项原则的具体事例。自离开晋西黄河地区以来，在我们访问的每一个地

方，人们都非常强调发展统一战线。

雨季正在开始，滂沱大雨下了两天，这使我们延迟进发。但是，这也为和徐向前、邓小平谈话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邓小平在参加八路军之前，当过工人。他在法国呆过一段时间，并在那儿研究劳工运动。邓小平个子矮些，身体结实健壮，他的思想极为敏锐。

一天下午，我们讨论了整个的国际政局，他对情况了解的范围之广使我大为吃惊。他讲的一则消息使我感到震惊。

他说：“去年，日本从国外购置的战争物资有一半以上是美国提供的。”

“你肯定这一点吗？”我问。我知道美国主要同情的是受侵略的中国一方，在我在中国内地旅行的八个月里，当我考虑到这件事时，我一直认为美国人会拒绝把战争物资卖给一个侵略的国家。这是不成问题的。我太天真了！

他对我说：“是的，这消息是战争第一年结束时，从美国发的一则电讯中说的。”

这使我感到难过。我说这则电讯的报导准有错误，我不能相信美国人会有意助长我在过去一年来在这里所亲眼见到的大屠杀和苦难。

徐向前进来了，话题重新回到当地的局势问题。我向他问到这个地区的现状。

“现在日本人只守着铁路沿线的城市和我们南面的大名城，这个地区的土匪已经肃清了。但是南边的一些地区并没有这么幸运。不过有一位很不错的人负责掌管大名与黄河之

间的五个县，他名叫丁树本。我们曾给他一些帮助。”

他想了解我打算怎样回汉口去。

我回答说：“我想看看山东的情况，然后我希望能在黄河那边到郑州以西找到一条路线。”

他对我说：“如果你难以找到一支护送队的话，回到这里来，我会设法送你过去的。”后来他的这个诺言对我很有用处。

(六)在临清会见沈鸿烈和韩多峰

我们七月底从南宫出发到山东境内第一个大城市临清。很多地方道路被大水淹没，但是农村一片葱绿，长出新种的庄稼，有豆子、谷子、高粱、黍子和芝麻地。偶然，我也看到小块块的棉田。当时离临清只有五十英里，我们第二天就接近这个城市。

我们在离开这个城市足有一英里的时候，看到有一队骑兵朝着我们跑来，这些骑兵接近我们的时候，有一个人驱马走在众人前面，手里摇着帽子向前冲过来，使劲地大声喊道：“欢迎！站住！”忽然我认出他来了，他就是孔庆德营长，走路的姿式象豹子窜一样。

他下了马，我们互相热烈拥抱。他的易于感动地忠厚的脸上，洋溢着高兴的神情，他亲热地握着我的手，我经常看到八路军的朋友之间表现出这种感情。

“孔同志，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他回答说：“是在几天前，我带着我们一团人开到这里

的。”然后又很谦虚地说：“我所指挥的这个团，是你在高陆见过的。陈锡联团长在张炉战斗中负伤，子弹从他面部穿过去了，他现在是副旅长了。”

我看到他很高兴，因为在我们一起行军的那些日子里，我曾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好感，而且还因为，我曾担心我到山东后是否会受到接待。

在进入这个城的入口处，我看到的人群，显然被一条横在公路两边的绳子拦住了，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咧着嘴笑了。“我从徐向前同志那里听说你已经来了，凑巧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在这里，我跟他说了你的情况，他欢迎你来。”

〔注〕沈鸿烈是张作霖奉系军阀余孽，是蒋介石的忠实爪牙，被蒋委为山东省主席，在抗日战争中，他积极反共，极力破坏伟大的抗日战争。

我们朝市区走去，在其他城市，曾有过一些欢迎代表团，但是都无法和这里相比。当我们离市区还有一百码的时候，有一个士兵跑过来，手里拿了厚厚的一叠名片。一定有五十来张，集中有省主席的，各部队指挥官的，市县和省级显要官员们的，这是一个暗示，说明我要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了。

但在关卡上没有举行什么接待仪式，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的秘书长雷法章博士，这个地区的行政专员兼游击司令韩多峰将军，是最先出来迎接我们的。然后是较低的官员，在他们的后面，夹杂在军队的行列之间，狂热地向我们涌来成千上万的男人、妇女、儿童，他们都拿着小旗，表示他们代表

学生，商人，工人，农民和其他各种民众团体，军队的行列分列马路两旁，一直伸延到城内。有些人唱歌，有些人呼口号。在这种吵吵嚷嚷的气氛中，我们无法知道这些官员的姓名。

警卫人员在欢迎的人海中挤出一条道，把我带到一簇人力车前，自从我在三个半月以前离开西安以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力车。但是我们倒不如步行进城了，因为市内的街上还是挤满了人。因此，我们用了一个小时才到达美国教会办的华美医院。

之所以这样热情地欢迎我们，有两个原因。这是向美国人致敬的一个机会，美国在人民中的威信是很高的，对地方官员来说，也可以趁此机会把人民的热情集中到具体的事情上去，作为鼓励他们加紧努力抵抗侵略的总计划的一部分。

我了解到医院的外管职员都不在了。自从日本侵略以来就不在了，不过，省主席指示把我们安排在一个大夫家里，在我们停留期间，他还派来他的私人厨师来给我们做饭。

我恢复了旅途的疲劳之后，马上跟雷法章博士去对省主席进行一次礼节性的拜访。我发现他是一个五十七岁谦虚而愉快的人，他的上层社会的仪表和谨慎的态度，表明他是有教养礼貌和文化的。他用缓慢但是可以听得懂的英语，热情地向我们问好。请我坐下来，一个传令兵送来米酒和雪茄烟。

沈鸿烈海军上将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的。他是湖北省人（汉口就在湖北），最初受过旧式教育，后入武昌讲武堂学习，以后又到日本学了七年海军。当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是中国观察组的一个组员，到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和美国。后来他担任东北军海军舰队总司令，历时十年。但是在山东重要港口青岛担任市长时知名国外的，这次冲突开始时，就是他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在日本人来占领青岛之前，烧毁了日本人在那里开设的工厂。

当年一月，前任山东省主席韩复矩，因为不服从命令，未能保卫住山东而被处决时，沈鸿烈接任了他的职务。

我对他的接待和殷切款待，表示感谢。然后问他现在临清是不是他的永久性司令部所在地。

“不是”，沈鸿烈一边回答，一边掸了雪茄烟上的烟灰。

“这些天来，我把我的司令部装到我的裤子口袋里。山东有一〇七个县，分成十二个专区，我到处走，从这个专区到那个专区，组织军队，恢复交通，设法使人民增强信心，努力提高他们抗战的效力。”

接着他问起颜露尔上将和美国海军另一些军官。青岛多年来是我们的亚洲海军夏季司令部所在地，他作市长时认识了这些高级军官。他很风趣的说到一个海军上将，在这内地指挥战役是多么不协调的。当我站起来告辞时，他又陪我到医院大院去，并在那儿吃了晚饭。

这一行人要穿过日本防线进入自由中国，需要得到黄河以南的军队合作，为了加速这次旅行的最后一段行程的计划，在吃晚饭的时候，我问这位主席，穿过日军防线的可能性如何？他认为可能性很小的。安排一切得费些时日，也许要数周之久，在此期间，如果不是我觉得我现在应当尽快

回到汉口去，这样做本来是很令人响往的。因此我提到，如果我从山东回去的道路不通的话，八路军曾表示愿意护送我南去。这位主席答应当天晚上给在郑州的程潜将军发一份无线电报。

第二天我的日记写道：“从今天开始早餐有了水果，麦片粥，鸡蛋，烤面包和咖啡，多美啊！”这几个月来，我吃中国饭也满不错，但是毕竟我们是受习惯支配的，在山东出乎意料地吃到传统的美国早餐，这引起了思乡的心情。

予定在早晨要开一个群众大会，雷法章博士把我和小伙子们护送到这个城市边沿的广场上。那儿悬挂着旌旗的讲台前面聚集着看来有一万人。和省主席一起在台上的有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及各民众团体的代表。

大会是按照国民党的方式开始的。首先读读孙中山的遗嘱，接着全体与会者向孙中山遗像行三鞠躬礼。孙中山的遗像挂在讲台的主要地位。这是一个欢迎会，每个代表都致了简单的欢迎词，最后省主席安详地讲了一番实事，人群这么浩大，与会的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听到讲话，不过在前排的人把每个讲话的人讲的要点转告给后面的人。

现在又轮到我讲话了，我象往常一样设法阐述美国的政策。韩多峰将军的讲话，结束了大会的程序，他讲的话，人民听的懂，而且喜欢听。韩多峰将军是另一位冯玉祥派的人——他是一个来自人民的人，是一个口若悬河表情生动的演说家。他走到讲台的边沿上，蹲下来，好象是要向人们倾吐肺腑一样。然后他大声怒吼起来，描述日本人的暴行，要人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他用各种手势和姿式来表达意思，他

模仿投靠日本人的卖国贼的样子，他的声音变得高亢起来，用细碎的脚步在台子上踱来踱去，人们轰笑起来，最后他象史诗般生动地描绘了中国军队的英勇精神，并号召人民支持他们。在他发出这个戏剧性的号召之后，接着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大会唱国歌中结束了。

（七）留在临清治病和所见国共两党的分歧点

程潜将军给山东省主席回了电报，提出供我选择两条南行路线。一条路线是向南渡过黄河，然后往西到河南，再到郑州。据说这条路线是非常安全的，但是路程较长，而且经过一些黄河洪水泛滥的地区。另一条路线是从这里南行一百十五英里到濮县，然后沿黄河北岸西行一百五十英里到郑州以北的一个地点，再从那里渡过黄河。这条线线经过的地区，中国人民的抗日行动还没有很好的组织起来。因此，必须从日本驻军据点之间穿过去，而日本的驻军据点之间，相隔只有约廿英里，不过这条路短一些，而且走这条路可以有机会了解一下双重地带人民的精神状态，我选择了后一条路。

但是造物主又暂时起了作用，沙眼病厉害，在河北时得的发烧的毛病，现在变得更严重了。虽然这所医院的外国人员都离开，但是一位中国男护士继续维持工作，每天照常看病，并把病房管理得井井有条，我去请他治疗。

他告诉我说：“我们这还有一位化验师，如果您愿意，他可以给你验血，以判断你发烧的原因”。

我同意了，化验的结果证明：我得的回归热，这是一种类似斑疹伤寒的疾病，传染的方式也一样，是虱子传染。这种病当时在华北流行，特别是陕西和山西，但是对我来说，这还是第一次尝到这个病的滋味。

“有什么特效药吗？”我问化验师。

“打一针六〇六”，他简捷地回答说。

“您能打吗？”我问，

“当然罗”。他回答说。

他很熟练地完了这项工作，六小时后，烧退了，而且以后再没重犯。

后来我了解到这个人是郑州浸礼会医院阿耶尔斯（AyerS）大夫培训出来的。

我同山东省主席和八路军的孔团长双方都经常交谈。我可以看出，这位主席的代表的国民党和八路军有一些磨擦，这是由于对本省内发动抗战采取什么方法问题，双方的看法有根本性的分歧。省主席坚决反对组织人民的方法，尤其是按照政治方针组织人民的方法。

他跟我说：“我不反对人民中间组织文化团体，但是国民党是执政党，因此人民必须依从它的决定”。

他继续谈到军政权力都是授予县长和专员的。他计划在每一个县和专区都建立一支部队，以便使这些官员能够应付地区局势。

另一方面，八路军认为：只有通过争取人民的合作，才能使人民的抗战能力得到充分发展。而且取得人民合作的办法，就是增加人民的福利，教导他们议会政府的基本理论，

并培养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

八路军除了在临清的这个团以外，还有两个支队（一个支队是一个有伸缩性的军事单位，它的人数从一千人到一万人不等）在山东北部活动。另一个部队在泰山地区，那里是孔夫子出生的地方，他的尸体现在还埋在那里的泰山之前。

这两种观点看来是无法调和的，但是这里，正象在中国其他地区一样，为了打败共同敌人，必须进行合作，这个必然有助于国民党和共产的态度缓和下来。大概迟早总会商定一个妥协方案的。

（八）聊城会见范筑先、濮阳会见 丁 树本

经过四天，我们全体都得迫切需要的休息，然后我们沿大运河向南前往聊城，会晤了在我们的全部旅行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一个人。他是这个行政区的专员范筑先将军。

他五十八岁，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头顶是秃的。他是一个精力充沛，有强烈爱国心的人。他蓄着长胡子，这在中国人中是很少见的。当他讲话的时候，他有个习惯就是常常紧张地摸弄胡子梢。如果碰巧谈的是他具有强烈感情的问题时（他似乎对一切事情都具有坚强的信心），他的心情会变得非常兴奋，而且会从他的椅子上时而突然站起来，时而又坐下。

范告诉我他亲眼看到战争的到来。他当时任临沂县长（不久前才到这里担任现职），就开始使人民做好准备。他

很早就认识到动员群众的重要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他的指挥下，有十万人的游击队。他还说，他的游击部队有的在北平郊外的西山曹庄一带（按：指民军第二路赵国贤部队，一九三八年五月，由聊城领了范筑先的委任，曾把这个文件缝在一双新鞋底里带回北平去的——译注）活动。虽然他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但是，他是一个思想开明的人，相信代议制政府，他在他自己的区域内，实行了他所能实行的一切改革，看来人民是同他充分合作的。

在我们到达聊城后不久，我们收到一封信，信封上用英文写着：送给刚刚到聊城的美国人。这是两个天主教神甫写来的，他们是圣方济会的修士安得烈·瓦尔特·崔斯（Andrew Wartern Tracy）和胡巴特·诺米尔（Hubart NOumier），他们两个都是加利福尼亚州人。他们听中国人说有个美国人来了，但是无法了解我是谁？我仅仅停留了一夜，而且范筑先将军已经在那天晚上为我们安排了晚宴，因而这两位和善的神甫，邀我去吃早餐，他想弄一盘基本上是美国式的菜，于是想到苹果排，这种美味引起我的乡思，就在这样的心情下，我开始了南下的征途。

范筑先将军陪送我们到濮县，他和他的随员都是骑自行车，这一个看来使人民喜欢的作法，沿途走了三天，因为范筑先将军要我沿途的每一个村镇都讲讲话，我急于要赶快赶路，我的讲话压缩得很短，这显然使他失望。当我们到达濮县时，我照例告诉一直给我当翻译的欧阳山尊说：“这将是我们的最后的讲话了，我们要使范筑先将军高兴一下，我们

要给他吃点苦头。”我谈了我所想到的一切事情，由于一心要使这位将军高兴，想看看人民能忍受多么长的讲话，而不退场。在长达三小时的讲演结束时，我再也想不出什么话来说了，而且也精疲力尽了，于是停了下来——但是人们还在继续守候着，范将军非常客气地说：“很不错”。濮县是日本兵撤退前放火烧毁的另一个县城。这个县城靠近黄河，在徐州会战时这里几乎经常驻军队。人们讲述的暴行情况，简直难以置信。

一支骑自行车的卫队陪送我们西行，到河北省南端狭长地带的开州，这是徐向前将军所说过的丁树本的司令部所在地。当我们接近这个城市时，照例有人群在城外迎候，我顺着一长列穿长褂的商人和穿短褂的农民看下去，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偏僻的地方住着一个外国妇女呢？我当走近一些的时候，我发现这位穿白衣的人，毫无疑问的是一位西方妇女，如果我的直觉不是完全错误的话，还是一个美国人。

事实证明她是伊利沙白·乔治小姐（）
美国内部拉斯州人，她是本地清洁会医院的一位护士，是这个县城中唯一的外国人。乔治小姐把我们一行人安排在属于教会的一所空房子里住下。

丁树本将军是我这次旅行中所遇到的在日本人入侵之后，还留在自己的岗位上的少数官员之一。他在战前是这里五个县的专员，在敌人占领开州的时候，他只是把他的总部移迁到乡下去，并开始发动群众。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既开明又保守。他在旧式学校里读过书，他也认识到使老百姓满足和得到老百姓合作的重要性。

他接待我们的方式，足以代表这个人的特点，他的参谋长在我们到达后会见了我们，并说：司令在他的办公室等着接见我们。在安置了我们的行李之后，小伙子们和我到衙门里去。在那里我们受到隆重的接待。最后我们进入内厅，这位司令在那儿等待我们，他高个子，傲慢，象个凡人不理的样子。我们拘束地进行了交谈，呆板地坐在椅子上，欧阳山尊和我一起工作很久了，他了解我的华语程度，所以他没有将这位司令的话全译出来。丁的参谋长严厉地申斥他说：“要把司令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译出来”。

然而，丁司令这天晚上前来参加了宴会，而且呆到很晚，呆板的样子，傲慢而拘泥的态度一扫而光。他的性格是热情的和有风趣的，他说话充满了奇谈怪论。他谈到他跟徐向前将军的谈话使他得到教益。他非常洋洋得意地叙述了在他游击活动方面的某些成功。

次日上午，他派了一连警卫队护送我们到八里营。那里离开州廿五英里，在那里，我们发现有一连人民军在等候我们，以便陪着我们穿过日军防线，到在那以西九十英里的原武。

滂沱大雨使黄河泛滥了，很多道路被淹没，因此我们运行李的车辆很难通过。我们被阻一次就耽搁数小时。

但在我们这次旅行的最后阶段中，最令人不安的是卫队，这支卫队人员是最近才应征入伍的，他们缺乏训练，毫无纪律。在第一天行军之后，他们就是不走了，第二天晚上，这一连人有整整一半人坐上了马车，而马车都是他们沿路从农民那里强征来的。

我们走的越远，人民的态度就越加不妙。他们没有受过激励着北方人民的那种民族主义精神，或自我牺牲精神的灌输。一群群到处游荡的中国兵，不是要这个，就是要那个，日本军的小分队也经常去光顾，这些加在一起，使他们变得情绪低落。一边是群众的态度叫人无法依赖，一边是卫队的士兵竟干些不适当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小伙子们觉得我们似乎不会胜利的完成这次旅行。

第三天，我们来到这次旅途中最危险的部分，北边道清铁路有日本军，南边的延津也有日本军，两地驻守军相距不到廿英里。这个地区是平坦的，适合于坦克车、摩托化部队活动。

后来计划在凌晨时分，从延津以北约八英里的地方穿过去。但是向导——一个当地老百姓（也许他是有计划的）弄错了——我们从一行树林的隐蔽所走出来，突然发现我们已可以看到延津了，相距不到两英里，除了继续前进别无办法。于是利用地形的起伏，向前爬行，心里暗暗祈求能碰到好运。走了一英里多的路，我们走到一条低洼的道路上，别人就看不见我们了。又走了五英里，卫队决定要休息，因此我们就在一个小村里停下来。

这是八月初的一个酷热的日子，人们在树荫下乘凉，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我们离延津只有五英里了，卫队的纪律太糟，因此我们决定在这座城镇周围转一遭，看看采取了些什么措施。连一个前哨据点也没有设立，也没有一个卫兵站岗，卫队是干脆惊动不起的。

我和小伙子们把我们的东西转移到一座小丘陵上，这里

地势要比这个城镇要高，一旦遭到袭击，那里至少是个集合点，具有一些有利的自然条件。然而，没有发生什么事，在休息了一小时后，卫队开始行进了。但是在我们第二天到达原武之前，我们一直没有安全的感觉。

（九）穿过豫北封锁线过黄河到郑州

第一战区的第五游击支队在原武，这个部队的司令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这支部队是在程潜将军领导下的，它在二十五英里方圆内的这个农业富饶的地区里，在组织人民方面干得很出色。

我们被通知说，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将军已作了安排，派了一个护送队和一支帆船，于次日早晨在黄河北岸迎接我们，这将是我们在旷野上渡过的最后的一个夜晚了。

根据预定的计划，在黄河上会合了。我们紧接着乘船渡过涨了洪水的黄河。当时河面几乎有两英里宽，感到兴高彩烈。这次旅行使我们在华北走了近一千五百英里的路程，有三次穿过日军的封锁线，现在结束这次旅行已在眼前了。在南岸守着防御阵地的士兵们，帮助我们上了岸，我们被护送顺利通过了各下属司令部，到达了旅部前线指挥所。那里，一辆卡车在等候把我们护送到郑州去。

自从四月间我经过这里以来，发生了很多变化。日本人占领了陇海铁路，直到这座城市以东约三十多英里的一个地方。那里决堤泛滥的黄河使他们停下来。程潜将军已把他的战区司令部迁移到八十英里以西的洛阳去。刘和鼎将军和他

的三十九军驻在这里，浸礼会医院的阿耶尔斯大夫因休假不在那里，现在由汉弗莱大夫（Humphrey）负责医院工作。

我去拜会刘和鼎军长，感谢他的盛意，同时发现他是一个优秀的职业军人。他曾在上海打过漂亮仗，是有才能的青年将领之一。从外表看，他的体格很弱。他的态度温和谦逊。他很诚恳地告知我说，他已经为我们的工作组安排了交通工具，我明天可以去汉口，小伙子们可以去西安，到那里之后，他们可乘卡车回延安，但是他首先要请我们吃一次晚餐。

第二天下午，我们聚集到陇海花园的树荫下共进晚餐，那里离开当年早些时候，我遇到轰炸的地方只有一箭之遥。这是一次令人愉快的聚会，刘军长和他的幕僚们都竭力使我们感到轻松随便。

对于刘白羽，欧阳山尊，汪洋和我而言，这是最后的一次晚餐了。只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一起进行长途旅行的人们，才能理解到这样一种关系所形成的亲切的友谊。国籍与种族没有意义了。重要的是人类的品德，同时这些可靠的伙伴，在数不清的场合下证明了他们的忠实，他们的勇气，他们的品德，我们大家都比刚开始旅行的时候老练些了。在这几个月里，汪洋已经从一个性情鲁莽的青年小伙子，变成沉重冷静能克制自己的人。我也有了变化，因为一个人生活在一种自我牺牲的气氛中，是不会不感到它的力量和感染一些这种精神的。

这次晚餐安排的正是时候，它结束的时间，正是我所乘

的火车要开的时候。我们一起到了火车站。刘军长热情地到了我的车箱看了一下，然后回到月台上，让我们这伙人作了最后的告别。我把我的行装中的一部分赠给青年小伙子们，因为这些东西我已经不需要了，而对他们来说，在回到延安后，还会有用处。汽笛响起来了，我们使劲的握手，我们声音哽咽起来、眼眶里含着热泪，就这样分别了。

他们到了月台上，又恢复了沉着，唱了起来，当火车慢慢地驶出站台的时候，歌词传入我的耳朵——这些歌词是我们在几个月中经常从千百万人的口中听到的：

“我们生长在这里，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强占去，
我们就和他拚到底。”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初稿，
一九七五年七月校订稿，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校稿，
小标题是译者加的。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重订。）

关于介绍伊·福·卡尔逊 与中国的材料

（1）伊万斯·福代斯·卡尔逊小传

Carlson·Evans·Fordyce （1896—19

47) 伊万斯·福代斯·卡尔逊，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一八九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生于纽约州息尼市。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殁于俄勒冈州胡德山（波特兰城）。

他是一个牧师的儿子，十六岁应征入伍，曾在菲律宾、夏威夷和墨西哥边境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西线的野炮部队作过战，后来以上尉军衔退役。一九二二年他又入海军陆战队服役，一年后被任命为少尉。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在上海担任作战和情报官员。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五年再度奉派驻在中国。在美国住了两年之后，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时，他又回到中国。被派到中国的游击队担任观察员和情报员，他跟随共产党八路军的一个分队行军达两千英里。这个部队的精通游击战术以及它的编制情况与经济方面的目标，使他深为感动。因此在他回到汉口之后，公开要求美国物资停止运往日本。由于受到官方的责难，他在一九三九年辞去他的军职。此后自由发表他对日本侵略的看法。此外还在一九四〇年出版了《中国的双星》（*Twin Stars of China*）和《大兵》（*The Chinese Army*）两本书。（上面的译稿是《中国的双星》一书中的第九章《在孔夫子故乡的战争》。）

一九四一年四月美日战争即将爆发，他申请重新到海军陆战队服役。被任命为少校，组织了一个专门化的突击营，根据中国游击队“工合”（共同劳动）的精神，把它训练成具有高度战斗力，各级之间除了在指挥责任之外，纪律性很强的部队。一九四二年八月，第一次参加战斗，在麦金岛（大洋洲的吉尔伯特群岛）发动了四十小时的辉煌袭击。这

支精锐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很快便以“卡尔逊突击队”闻名了。十一月，这支突击队在瓜达卡纳尔岛（太平洋）登陆战中担任前锋。一九四四年他在塞班岛（大洋洲）受伤后回到美国，一九四五年荣获军功勋章，一九四六年因伤退役，当时的军衔为准将。

（李士钊译自一九七〇年版
《美国大百科全书》中
“卡尔逊”一条）

（2）中国人民的挚友——美国卡尔逊 将军不幸逝世

朱德、周恩来两将军电唁其家属

〔新华社陕北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三日电〕 朱德、周恩来两将军于获悉美国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主席卡尔逊将军病故后，特电唁其家属。电文如下：

“美国波特兰城：

卡尔逊将军家属礼鉴：中国挚友卡尔逊将军的逝世，是中美两国人民的损失。卡尔逊将军对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增进中美人民友谊与争取美国实行进步外交政策的贡献，将永为中国人民所纪念。由于战争的阻隔，我们至今才得知这一噩耗，痛念不已，特电致唁。

朱德 周恩来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一日

按：卡氏在我国抗日战争时，任美驻华大使馆海军武官，因羡慕八路军，曾于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两度至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等解放区考察人民抗日战争实况。美国对日宣战后，即根据八路军的经验，征集坚决抗日不畏艰险和富有民主精神的美国青年，组织著名的“卡尔逊突击队”，在海上进行游击战争，并于梅(麦)金岛战争中负伤。日本投降后，卡氏在美发起组织美国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领导援助中国民主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支持蒋介石独裁内战的倒行逆施，不遗余力。不幸于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七日因心脏病在美国西部波特兰城逝世。

(见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邯郸
“人民日报”第一版)

译者后记：1938年7月25日伊·福·卡尔逊将军到聊城时，我正在鲁西北《抗战日报》任编辑和记者，曾参加了卡氏与范筑先将军的会见，并担任了会谈的记录工作，但当时未作公开报导。解放后听现任《中国日报》主编刘尊棋同志说卡氏著有《大兵》与《中国的双星》二书介绍中国抗战情况，可惜多年来未见到原书，1974年秋天，才托范筑先将军的外孙张学民同志，由北京图书馆借到原书，复制了其中有关聊城的部分，1974年冬天把它译成中文后，作为一件文献和史料曾先后刻印和打印出来分赠有关同志参考。

1977年春天“四人帮”覆灭后，我在北京见到卡尔逊将军的老朋友——新西兰老诗人路易·艾黎同志，他有一本1940年纽约出版的《中国的双星》，热情的借给我把有关山

东的第九章《在孔夫子故乡的战争》一章全译出来。在这之前曾把过去所译的第九章第五节的一小段和六、七、八、九几节的译文刻印本，卡尔逊的小传以及朱德、周恩来同志给卡尔逊家属唁电等材料，托艾黎老转致卡尔逊——中国之友社与卡尔逊的家属各一份，后来收到艾黎老转来卡氏的家属赠我一本1975年再版的《中国的双星》，其中包括很多珍贵的历史照片，我几年来就决定把全书译出来，因为事忙未果。

现在先把《在孔夫子故乡的战争》一章的全文，作为鲁西北史料的组成部分，在《聊城地区党史资料》上刊出，将来再把其他章节译出来，争取早日出版全书的译文。卡尔逊和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在朱、周两将军的唁电中，已作了简单的介绍，这里就不重复。

李士钊

一九八三年九月五日于聊城

鲁西北抗日根据地^①

〔日〕马场毅著

梅 枫译

一、导言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开辟的十九个抗日根据地，支持了八路军、新四军同日寇的作战。山东抗日根据地是日本军占领地区的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其包括的地域范围，一九四一年六月以前，是山东全省和江苏、河北省的各一部分。（一九四一年七月以后，津浦路以西地区从山东抗日根据地划归晋冀鲁豫边区。）日军从津浦路、胶济路侵入和占领山东，并自武汉作战以后，进一步把山东兵站基地化，以掠夺矿产品，掠夺包括粮食、棉花在内的农产品，以及劳工。因而山东就成为中国游击队坚决抗日的根据地。

然而山东省的农民斗争，在抗日战争以前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主要是各地相继出现反对军阀张宗昌苛捐杂税的传统性的农民组织红枪会。红枪会运动被镇压之后，三十年代的前半期，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没有再发生，中共山东省组织也遭到削弱。在这样状况下，山东抗日根据地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在1937——1939年抗日战争初期的情况是怎样的？本文把这两个问题作为重点加以论述，特别着重研讨（一）在当时的情况下，面对日本军的进攻和统治，农民各个阶层作

出了什么反映；（二）中国共产党根据农民各个阶层的反应，如何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去动员广大的农民，开辟抗日根据的根据地？

二、日本军对山东省的入侵

日中战争爆发后，西尾寿造率领华北方面军第二军从天津沿津浦路南下，于九月二十四日占领了河北省境内的沧县，随即于十月五日占领了山东省北部要冲德州，侵入了山东省境。

自一九三〇年以来，统治山东省的是军阀冯玉祥的旧部韩复矩。韩为了维持其在山东的支配地位，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尽量避免同日本军的正面冲突，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妥协活动，拒绝服从（南京）中央政府发布的准备抵抗的命令。直到九月末德县面临被占领的危机时，韩才允许成立救国会。韩之允许山东人民成立救国会是为了平息民众的义愤和中央政府的压力。可是，韩在这一时期继续采取同日军妥协压制民众抗日运动的政策。韩复矩政权逮捕了救国会会员，禁止张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②，同时，在山东西北的专员没收民间的枪枝弹药，解散民众的自发武装③，即使有些国民党人在其他地区颁发成立游击队的委任状，却被韩复矩以“反韩”的罪名，将游击队中的一些人逮捕和枪杀。十月间，日军占领德县后立即南下，韩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委任了二十六个县长为游击司令，组织游击队。但是这些兼游击司令的县长当日军逼近时大都逃之夭夭。新泰县县长朱奎声则投降日军，在宣抚班内充当汉奸④。

如上所述，在韩复矩的统治下，韩政权不仅不发动广泛的群众进行抗日战争动员，反而镇压抗日运动，没收群众武器和禁止民众武装起来，这就是当时山东抗日运动的实际状况。

不仅这样，韩又于十月十七日命令黄河以北的专员、县长向黄河南岸撤退。除第六区专员范筑先等少数专员未遵令南撤外，大部分专员、县长南撤⑤。

迄日军于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占领汉口时，日军并没有完全占领山东省，山东西北部、北部十分之九的县仍掌握在中国方面。日军仅在二十几个县，派任了傀儡县长。由于日军集中兵力于临沂、台儿庄，进行徐州会战，日军在其背后没有足够的兵力，这样就在敌后出现了一个空隙，抗日游击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就发展起来了。

三、鲁西北地区

鲁西北地区系指黄河北岸，津浦路西侧与河北省联结的地区及黄河南岸津浦路与运河之间的地区。

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开创过程如下述。日军沿津浦路南下占领德州，临清地区第四行政专员赵仁泉及该区的县长、行政官吏未同日军交战，即全部逃向黄河南岸。但第六区行政专员兼游击司令范筑先，无视山东省主席韩复矩“向黄河南岸撤退”的命令，决心誓死保卫黄河，拒绝撤退⑥。开始，范只率领保安队一个营（大队），并招收二百多青年知识分子，开始作民众的动员工作。这些青年有平津南下学生、日本留学生以及山东省的学生。这些南下平津青年学生

大多是参加一二九运动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成员，他们后来成了鲁西北政权的中流砥柱⑦。

农民们一方面目睹韩复矩的军队和行政官吏们纷纷撤向黄河南岸，日军侵入鲁西北地区，又鉴于既成秩序的崩溃和土匪横行，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和乡土，遂自发的组织起来⑧。最初组织起来的是以中农为中心，有部分贫农参加的农村自卫组织红枪会。而且，当农民自发的组织起来之际，范筑先游击队中的那些为了民族最高利益而不怕牺牲的青年，向这些农民武装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工作，把他们组织成为抗日游击队。

范筑先就是这样一面组织游击队，一面肃清妨碍抗日的冠县、范县、阳谷、朝城各县的土匪。接着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聊城的数百名游击队在清平附近歼灭了日军四、五十人；十二月初向占领堂邑县城的日军进行夜袭，缴获了很多辎重武器⑨。范筑先就是这样一面防止日军的侵入，一面建设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原则，予范筑先的抗日以援助。如一九三八年一月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孙继先挺进队从冀南向津浦路沿线挺进，后发展成为津浦支队，曾与范筑先的部队协同作战⑩。另外在范部第十支队，有中共党员张维翰、赵健民等在该支队中工作⑪。

下面我想探索鲁西北抗日政权的问题。鲁西北抗日政权是在韩复矩旧政权地方行政组织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而组建起来的。最高的指导机关是第六专员公署和游击司令部。第六行政区的官员都是游击司令部委任的，第二、四、五行政区的县长也是由第六行政区的游击司令部委任。因此，第六行

政区政令所及地区不仅是聊城、博平、堂邑、冠县、莘县、濮县、阳谷、寿张、朝城、范县等十二个县，还有黄河南岸的东阿、肥城、东平、宁阳等县，清平、馆陶、临清（第四行政区共辖临清、德州、高唐、夏津、恩县、馆陶、邱县、平原、武城、清平等十县）等鲁北十余县，以及鲁北津浦路沿线其他各县。这样，山东省境的游击队大都同第六区保持密切的联系^⑫。由于鲁西北、鲁北地区地方行政官吏大多逃走，所以范筑先就委任六七名留日学生、平津大学生（其中多为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及一批具有坚定抗日决心的青年为各县县长^⑬。范还提倡反贪污运动，县长及官吏由廉洁人士充任，任期内若行为稍有不端即受撤职处分^⑭。过去农村中的乡长、保长一向由县长指派，往往由土豪、劣绅充任，土劣构成为三位一体县区乡政权的支柱。鲁西北抗日政府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废除了此项做法，首先确定乡长、保长由民众选举产生，并由政府对被选之乡、保长进行政治、军事训练，然后任乡、保长职；训练民众运用三民主义之民权主义，也即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权，使这些新乡、保长代替不称职的乡、保长及公务人员^⑮。由于民众，特别是农民支持抗日乡、保政权，行使监督行政官吏权利，因而农民们就成为乡村政权的支柱。

而且，抗日政权实行民主政治，给予民众各项民主权利，如允许民众组织抗日团体，帮助民众创建代表自身利益的团体。六区当局还发布训令开放民众运动，允许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

这样，地方行政组织中的官员成为抗日分子，实施民主

政治，实行让过去不能享有政治权利的民众（特别是农民）拥有政治权利等改革，从而树立起了一个与民众关系密切的抗日政权。

下面再看看鲁西北的经济政策。

鲁西北地区是山东省人口稠密的地区。全省人口有三千二百万，这一地区有一千万^{①⑥}。

第六区北部及以北的十几个县几乎全部为棉田，是被称为御河棉的主要产地。而且一亩棉田棉花产值比三亩谷物产值高。棉农出卖棉花购进杂粮等食粮。六区南部则盛产谷类、玉米、红薯、果物及豆类等农产品。不论南北地区，大地主和佃户不多，自耕农占农民的多数。众多的贫农，特别是北部地区农民食粮不能自给，因而一般贫农，都兼有小商贩的身份，从事粮食和棉花的买卖。九一八事变前，很多青年人到东三省出卖劳力以增加收入，来维持自己家庭的生活和小农经济的简单再生产。九一八事变后，去闯关东的青年人锐减，加上连年黄河发生泛滥，日本军队的侵略，众多农民食不果腹^{①⑦}，失去了土地，成为无产者的农民铤而走险，土匪不断增加。

抗日政府如不改变这种经济状况，农民的广泛动员是不可能的。

新任县长执行的经济政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废除苛捐杂税。鲁西北在以前捐税繁重，计有猪羊屠宰税、秤税、土布税等。范司令下令废除了其中的一些苛杂税、牲畜税、农业所得税改为累进税，其他捐税也相应减轻。另外，由于鲁西北土地贫瘠，贫困的农民无力进行再生产，每到春耕辄

向财主借贷，到秋后加倍偿还。这种高利贷剥削盛行于鲁西北地区，从事抗战的第六区政府当局严令禁止⑮。

如上所述，抗日政府废除和减轻了苛捐杂税，减轻了农民负担，根据收入多寡采用累进税，废止了高利盘剥，打击了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剥削体制⑯。

第二，各县实行了救济灾荒措施。前此贫农粮食不能自给，小棉农粮食勉强度日，一旦黄河泛滥成灾，这种生活也难以保障，食粮的取得也就根本不可能。因此各抗日县政府就购买大批粮食，低价卖给农民，不法商人的资敌食粮也予以没收，无条件的分配给农民。之外，还以县政府的名义向地主借贷粮食，贷予贫农春耕，秋收后归还给地主⑰。

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主要是为了改善民众生活，动员民众投入抗日战争，其次则是为了防止发生象鲁南地区的“谷物分配运动”，在鲁南谷物分配运动使地主富农同贫农、半无产者、雇农间的阶级对立激化，推迟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第三，为了救济农村，恢复和发展农村副业和家庭手工业。如禁止日棉的流入，提倡农村妇女织布，不征捐税，又限制军民穿洋布，扩大土布用途，所有被服厂都使用土布，开办小型的袜子工厂，以当地棉纱织袜，供军民使用，等等。

第四，为了防止法币流出，日货流入，特规定除军事上必需的原料、药品外的物资严禁输入，农产品禁止输出。因敌人操纵棉花买卖，第六区辖境限制棉田栽培面积，对已收获的棉花也严禁输出，以防敌人利用。

民众动员机构是怎样情况呢？

1、政治部 政治部属第六区游击司令部，拥有五百余工作人员。他们是鲁西北民众运动的开拓者，是抗日政权的支柱。部下设总务、组织、民运、宣传四科，各游击支队司令部也设有政治部，团、营设政治干事，连、排设政治指导员。各县也设有政治部（处）。

2、党部 各县设党务指导员一人（国民党组织）。

3、民众动员委员会 民众动员委员会系奉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长官为李宗仁）公署命令组织的。该委员会由县政府、党部、政治部、各民众团体参加。县长任动委会主任，党务指导员、政治部干事任副主任。

4、青年干部训练团山东实习队。此队系由河南潢川第五战区青年干部训练团派遣来山东，队员多为山东人。

在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初期，动员委员会机构系受第五战区命令组成的民众动员委员会，党部和青年干部训练团山东实习队则是以国民党为主，中国共产党协助的形式为特点，与被日寇占领的胶东区不同，鲁西北未曾陷落，范筑先留任，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对旧行政机构、行政人员，只是进行了整顿和改革。

抗日政权为了动员民众，颁布了抗日军人家属优待条例，并规定若出征军人自带枪支，田赋豁免。

下面看组织民众进行抗日的民众团体的情况。

1、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此组织是在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在北平成立。一九三七年冬，平津学生数十人来到六区后，在

鲁西北成立了民先组织，随后组织不断扩大，由不足千人发展到二千人。成员（份）不仅有学生，而且有工人、农民、士兵参加。民先是鲁西北政府的有力支柱。

2、青年救国团

该团系以范司令之子范正恒、范树民等为核心，统一了鲁西北各县青年救亡团体的组织，于一九三八年春组织的。团员参加各种救亡团体，予这些救亡团体以援助，部分团员参加民团、红枪会、常备队、保安队等民众组织，在各组织内部工作，推动指导其走向抗日道路。作战时，青救团不仅参战，而且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战斗。平时，青救团响应政府命令，作为抗日政府的助手进行活动。

3、农民互助会

农民互助会是由各县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组织，有会员数万人。早期的农民互助会，是莘县、冠县、馆陶各县的农民所组织的，有会员万人。据说会员多为“贫农、雇农、半自耕农、自耕农”，“地主富农不得加入”。这是一个中农、贫农、农村无产阶级的组织。

农民互助会的工作，是借给食粮、种子，推动春耕，使农民获得最低限度的粮食，在能够维持其再生产的情况下，改善农民的生活。其中有许多地主、富农，为了抗日也自发向游击队供给粮食。游击队将这些粮食的半数交农民互助会分给贫穷的农民，此为互助会的工作之一。互助会在军事方面，组织互助会员参加的自卫队，进行揭露农村中的汉奸、敌特的抗日锄奸工作，另响应抗日政府的号召，拥护和执行抗日政府命令，推进地方行政，监督行为不端，玩忽职守的

官吏。

4、各种妇女救国组织

鲁西北各妇女救国组织，是一九三八年春在政治部民运科对妇女救亡工作的指导下开始组织起来的。

①鲁西北妇女抗敌后援会，是第一个成立的妇女救亡团体。总部设于聊城，发行《妇女前哨》周刊。

②妇女救国会 各县设有分会。妇救会的工作是负责募捐、慰劳和组织农村妇女。各县妇救会组织妇女识字班，训练乡村妇女，组织姊妹团，广泛团结农村妇女。百分之九十为文盲的农妇成为抗日政权在农村复兴家庭手工业政策的主要力量。她们纺纱织布，为游击队缝制衣服、袜子，得到游击队支付的工费，因而妇女们的生活问题得以解决。

③战地妇女服务团 由政治部及民运科妇运部门组织，妇女战地服务团的主要职责是动员战地的农村妇女。团员四十多人，大部分是中学生、女教师。他们考试合格后，经过一个月救护常识、救亡知识的训练，由团长率领，在前线服务。

5、工会组织

鲁西北没有大工厂，工人数量也很少。只是不同行业的手工业者，杂业劳动者自发组织了印刷业工会、土木工会、船业工会、理发业工会、裁缝业工会、店员工会。这些组织，大多从事抗日工作，改善工人生活，努力生产以增加物资。

之外还有儿童教育团（原文如此，应为儿童救国会——译者）、少年先锋队等组织。

（另有政治部组织之少年抗战剧团，一九三八年四、五月间与阳谷一剧团合并，组成抗战移动剧团；还有政治部指导之七七歌剧团。——译者）

下面再谈谈支持鲁西北抗日根据地政权，同日军进行战斗的武装力量的情况。

1、正规游击队

文中所述的正规游击队，是指接受第六区游击司令部指挥，脱离生产，根据作战需要，转战根据地各地的游击队。范筑先开始抗日时，只有一营保安队（保安大队），经过清平、堂邑战斗的胜利后，集合了鲁西北各地抗日武装。这些部队有知识分子指导的武装部队，有旧民团、保安队及部分愿意抗日的土匪。抗日政府方面重视部队的政治教育，平津来的学生是进行政治工作的主要力量，各游击队都保持了“不扰民、不害民、军民一家”的严格军事纪律^②。范筑先对这些武装进行改造，编成三十二个支队，二十余个团、三十余独立营、三路民军，又进一步将几个支队组成一个纵队作为一战斗单位。第六区脱产游击队共计七万人，其特点是，区游击司令部、支队司令部设政治部主任一人，团、营设团、营长及政治干事各一人，连排设政治指导员各一人，部队中没有政治人员签署的命令不能执行。

2、县游击支队

县游击支队是一县游击队的战斗单位，游击队员均脱产，作战能力次于正规的游击队。各县武装有县游击支队，国民抗战自卫团、人民自卫军、保安队等不同名称，但其性质则一。游击队由县长率领，武器来自民间，经费由地方负

担。各县武装均为千人。

3、人民自卫团

人民自卫团原是地主掌握之（县区）民团，开始对抗日不关心。后因一部分地主参加抗日，这些民团开始积极起来。民团脱产，但不接受军事训练。各县平均为二千人。民团团员被认为是脱离生产的无产者和最贫困的贫农。

4、农民自卫队

农民自卫队是由农民互助会组成的地方武装。队员不脱产，不受军事训练，只在农村中从事各种抗日活动。自卫队抗日意识很高。队员为中农，贫农和农村无产者。

5、红枪队

红枪队是红枪会的变称，原为不脱离生产，农村中农民传统的自卫组织，在范筑先的努力争取工作下倾向于抗日。红枪队系以中队（农）为主体的组织。

以上五种武装，体现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阶级构成体现了以中农、贫农、农村无产者为主体，包括愿意抗日的部分地主、富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联合。

为了策应一九三八年八月下旬——十月的武汉保卫战，鲁西北的大部分部队都开抵津浦路沿线作战。日军第十师团乘机于十一月进攻聊城，由于山东鲁西行辕主任山东省政府民政厅长李树椿的受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的旨意蓄意陷害，又因援军未能到达，范筑先战死。同时牺牲的还有在鲁西北工作的共产党员张郁光、姚第鸿等。聊城陷落。抗日根据地因而受到了打击，游击队四散，张维翰率第十支队向大峰山撤退，牛连文支队向鉅野、嘉祥撤退。侯子亮、齐子修等（投

敌之)汉奸开始掌握一些地方。

但是,由于山东游击队的要求,中共六届扩大六中全会(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作出决定,向鲁西北派遣援军,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旅长陈光部命令为东进支队,于一九三八年冬,自山西西部出发救援。一九三九年三月,东进支队到达聊城附近之郛城县,重建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解除伪军侯子亮部的武装,齐子修率部逃逸。范筑先部第十支队张维翰与赵健民等人将范的残部改组成筑先纵队,同由冀南来鲁西的一二九师先遣纵队李聚奎、钟汉华部,共同活动在东平湖一带。之外,由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改编为“八路军(应为山东纵队,译者)第六支队”,在长清、肥城间的大峰山区一带活动。

一九三九年中,先后成立了鲁西北行政委员会和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组建的泰西行政委员会(以泰肥山区为其中心地区)。之后,鲁西北、泰西两行政委员会合并为鲁西行政主任公署。

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根据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命令,冀鲁豫军区与鲁西军区并为冀鲁豫军区,鲁西北与鲁西此后归署晋冀鲁豫边区。

注 释

①原文题目为《以山东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和农民。》载野泽丰、田中正俊编:《中国近现代史讲座》第六册,抗日战争。

②Wang Yu——Chuan(王毓铨):《鲁南游击区

的组织》11——12页。

③金民：《鲁西北的游击队是怎样成长的》，见战时出版社《游击战术与游击活动》。

④黎玉：《山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1938年6月）》，《解放》49期。

⑤前引，金民文

⑥前引，黎玉文

⑦姜克夫：《抗日根据地鲁西北区》，见《抗日中的中国政治》，355——356页。

⑧北鸥：《战斗着的山东民众》，见《抗战》47期。

⑨《山东省的游击队》，见《时事类编特刊》（1938年1月31日）

⑩《晋冀鲁豫边区概况》，载《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49页。

⑪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118页。（据赵健民《抗战初期改造绿林武装“南杆”的片断回忆》一文，赵健民系在范部第六支队工作，后到第十支队。——译者）

⑫《抗战中的中国政治》，507——508页。

⑬姜克夫：《范筑先先生与鲁西北》载《反攻》四一·一，见《抗战中的中国政治》，508页。

⑭姜克夫：《抗日根据地鲁西北区》。

⑮《抗战中的中国政治》509页。

⑯据《大公报》1935年载，山东省人口为三千七百

一十九万六千七百六十九人（译者）

⑮《山东游击队》，载《抗战丛刊》第五辑。

⑯《抗战中的中国经济》654页。

⑰之外，还执行了减租政策，减息情况不明。

⑱姜克夫：《抗日根据地鲁西北区》。

⑲《山东游击队》，载《抗战丛刊》第五辑。

《陈赓日记》节选

(1938 · 12—1939 · 3)

按：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聊城失陷，在我党领导与支持下范筑先将军开创的鲁西北抗日局面，正经受严重考验。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陈赓同志奉命率部开赴鲁西北，迎击日寇敌顽，为鲁西北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创造了辉煌的业绩。正像陈赓同志在《我的自传》中所叙述的那样：“奉命调赴鲁西北及冀南平原作战，转战冠县、馆陶、聊城、博平、高唐、临清、大名、清丰、南乐、广平、肥乡、邱县、曲周、鸡泽、广宗、威县，所到之处，伪军被歼，敌寇挨打”而后“以战胜者的姿态”，携带各种胜利品，“高歌凯旋太行”。我们节选的陈赓同志的部分日记，就是战斗在鲁北的真实记录，也是学习陈赓同志革命精神的宝贵材料。个别地方我们增补了一些注释。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一九八三年

十二月七日

月余的休息整理，反而不写日记。懒病复发，真可恶！

奉命赴鲁西，过彭城，夜宿县政府。田县长招待甚周，并在彭城市设宴款余，席甚丰富。

磁县工作大有开展，确实今非昔比。群众无论大小男女，均已组织放哨，戒甚严。据说汉奸很少漏网，即毒品犯亦时常被儿童团拘捕送县。交通路不分大小，均被破坏，这未免破得太过了一些。小路被破，连村与村的交通均发生问题。据县长说，因为道路破坏，牛马甚至驼骡均难于通行，以至促使煤价高涨，县长亦觉得太过了一些。

彭城街正值庙会，满街生意，夹道设卖，红男绿女，人山人海，大有太平景象。十二时许，敌机五架过空，轧轧之声，不绝于耳。但街道人民，仍拥挤不堪，视若无睹，因已习惯敌机下的生活矣！

张锡珩支队①派其副司令率两个连护余过路。七时三十分到达半坡。准备晚十一时左右通过铁道。

注释：

①张锡珩支队，即第十四支队。

十二月八日

昨晚由马头镇以北之木鼻村通过铁路。马头镇敌人声息全无，要不是发现墙上贴了几张所谓“大日本皇军告民众书”的传单，真不相信铁道是被敌人占领的线或点。通过后即到达距铁道约十里之吴村宿营。

下午进到临漳城。城内生意颇热闹。县政府不在此地。据说因此地离磁县敌人太近，恐遭其不意袭击，故此政府成为游击性质，驻地不一定。黄昏前到城东南冈岭城宿营。晚六八八团副团长来访，他系专门率领一个营来此掩护我东进的。

十二月九日

今日仅行二十里，到北皋集东三里之刘村，靠拢其营部。

黄宇宙①来，表示甚诚恳。

吴专员②派一县长来接收临漳县。临漳政权为八路军与群众在日寇汉奸土匪手中用血换来，赵县长颇得群众信仰，政治正在进步中，若一旦落入顽固分子之手，则又将重入黑暗，妨碍抗日根据地的创造，我坚决主张不让。

注释：

①黄宇宙，伪军李福和部下的师长，后被我争取过来。

②吴专员，国民党地方官吏。

十二月十日

率六八八团之一营开始向鲁西前进，宿营边马，距大名约三十余里。

十二月十一日

今日渡卫河，宿营韩张。经南乐县，遇魏县长，前呼后拥，不可一世，这是抗战中的怪现象。到韩张，街上满布欢迎八路军标语，群众对我甚表好感，我偶然与群众谈几句话，即被群众层层包围，几至街上断绝交通，我借机向群众讲演，大家都是倾耳而听。

晚有本地共产党员数人来访，我对他们解释了一般的政治情形及当时任务。

“双十二”

进到距朝城五里处之五里河。经过各方面的打听，不能得到八路军的行踪。此地为山东地界。因为领导关系，群众非常强悍无礼，但一般青年对八路军甚称赞。我的一言一语，均被他们注意，因此我向他们解释了一番抗战必胜的理由。

部队宿营大青。派骑兵连到观城找六八八团。

一九三九年

一月一日

今年当为胜利年，但估计其艰苦，当百倍于去岁，因为胜利只有从艰苦中求得。想到日寇将要举行对华北的扫荡，将来汉奸的猖狂，顽固分子的捣乱，我军对外需要粉碎日寇汉奸的“围剿”，对内又需防止与争取顽固分子，工作的艰苦，当可预为想象。这些都要求我们以大无畏的精神，至高无尚民族真诚，善于使用与紧握统一战线的武器，以布尔什维克的风度，埋头苦干，来应付此种艰苦的事变，坚持华北抗战。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目前困难，引导抗战奔向胜利之途。

晨未起床，贺年片已纷纷掷向案头。下午应邀赴十支队①联欢，大家鼓掌要求我讲话，我无准备，只好勉强发言，说明我们胜利的条件，及怎样争取胜利的到来。晚与参谋等聚餐。归，答复各方电报，夜已过午矣。

注释：

①十支队，是我党鲁西北特委在堂邑、冠县、馆陶等地建立的一支地方抗日武装。

一月二日

津支①袭聊城无结果。

补团在东目寨甚得群众爱护，两天内组织游击队二百余名，并获步枪四十余支。

阅新闻，汪精卫②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准备赴欧。此举为国民党抗日派与亲日派的分化，实为国民党的进步。我们只有求得国民党的进步，逐渐淘汰其顽固分子，肃清其党内投降妥协的因素，这样统一战线与坚持抗战才能得到保障。读之，不禁为中华民族前途贺。

晚给补团、六八八团③、津支、青纵④等兵团电，指示工作。

注释：

①津支，津浦支队的简称，系由一二九师工兵连发展而成，孙继先任支队长。该支队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奉命开赴冀鲁边区活动。

②汪精卫，大汉奸，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外交部长、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等职，是国民党内亲日派的首领。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离开重庆，公开投降日寇。国民党为遮羞计，不得不将其开除出党。

③六八八团，属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建制。此时配属三八六旅在鲁西北地区行动，由陈赓同志统一指挥。

④青纵，青年抗日游击纵队的简称。我八路军各部在敌后抗战期间，深得群众的拥护与支援，部队不断发展壮大，相继建立了许多新的兵团（支队、纵队等）。青年纵队即为一二九师新发展的部队之一。此时该纵队亦归陈赓同志指挥，活动于鲁西北地区。

一月三日

我博平党组织之部队约一千四百余人，有被顽固分子解决的危险。决以津支、六八八团之一部，青纵之一部，向博平推进，掩护其集结，并以此意电告师部。

沈鸿烈①变发密令，谓“八路军以六区部队②尽为皇协汉奸，将加以解决”，企图挑拨我军与六区部队的感情，以孤立我，并阻止群众给我送给养，到处阻止我们的行动，使我“无所寄托”，其计真险矣！对于这样的顽固分子，应给以必要打击，求得在激烈斗争中，使之进步，与我合作，坚持华北抗战。

注释：

①沈鸿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分子，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对我实行限制与破坏。

②六区部队，指驻扎于山东省第六行政区（鲁西北地区）的国民党保安部队。

一月四日

师电：对三十二支队①事大体同意。但须以不与齐子修

②部冲突为原则，并须以实际袭击高唐敌军的行动来掩护集结。

注释：

①三十二支队，即一月三日日记所载我党博平县委新组织的一千四百余人的地方抗日武装。

②齐子修，国民党山东省保安第十一旅旅长。活动于鲁西博平一带，多次向我军寻衅摩擦。

一月五日

顽固分子王金祥①，由于我们的争取，对我的态度似有转变，表现在：一、接通冠、朝间电话；二、对墨林，②表示必须团结一致，并承认过去错误。

决定明日行动，电各兵团。

晚应县长宴，并与此间国民党员交换意见。

注释：

①王金祥，国民党山东省第六行政区保安司令参谋长（后任专员兼保安司令），顽固派分子。

②墨林，即张维翰同志，时任筑先纵队（见本年一月二十八日日记注）司令员。

一月六日

随骑兵连出发到吕庄与六八八团会合，即宿营于此。

一月七日

今日六八八团、补团、津支、青三团①均会合于魏家湾，

附近东南西北十余里村庄均为占驻。晚与博平党同志商谈三十二支队问题，决定明日在此休息一天，以便进行侦察。

注释：

①青三团，即青年纵队第三团。

一月八日

今日在原地。聊城方向发现枪声，侦察结果知为王金祥部攻聊城，在距城二十里处，向城“远攻”，不敢前进，结果敌以汽车十余辆向之出击，随即溃退，此军不讲求战术，其战斗力之微弱，实属可怜，但敢于对敌作战，不能不说是进步。我们应该培养其此种进步，加以鼓励，当即派人与之联络，表示随时愿意参加共同战斗，并令津支派出得力侦察，各兵团即作战斗准备，但据报告王部已远离战地矣。

一月九日

向高唐派出侦察人员，昨日无报告，今日行动无法确定，只好在原地再停止一日。

下午得到侦察报告，随即决定明日行动。

一月十日

以六八八团为左纵队，津支及青三团为右纵队，取平行道向清平以东地区前进，到达张庙附近（袭击出发地），临近黄昏。黄昏后，再取平行道向高唐前进。袭击部署：1、六八八团以一部坚决肃清东北关伪军，以一部（不少于四个连）爬城，相机占领高唐，分一连佯攻北城。2、青三团袭

击南城外之零星伪民国及伪乡政府，坚决消灭之，并以一部潜伏于西门外，以一连堵截南门隧道，防其偷跑，并佯攻南城。3、以津支位置东关外通往禹城之大道，准备打击由禹城来援之敌，并协助六八八团解决东关伪军。4、我率骑兵连，位置西门外之房庙指挥。

夜十一时枪声炮声交作，约一小时后，各兵团均照预定计划发出了信号，知城已被我占领。激战约三小时结束。我拂晓已全撤回，到达夏津东南地区。

是役结果：城外伪军伪组织全被扫荡净尽，伪军虽未能全部解决，但已四散瓦解。我六八八团奋勇爬城，反复冲锋，攻入城内，城周城墙全被我占领，敌退守十字街之钟鼓楼，凭借强大火力（有钢炮四门，轻重机枪十余挺），居高抵抗，我因一时无法攻下，天将拂晓，即令退出战斗。共击毙日寇十余名，缴枪十余支，俘伪军十余名，我亦伤亡二十余人。

一月十一日

今日因疲劳过甚，到达宿营地区，即熟睡，几终日。晚，写电报并解决各团问题，安排第二次行动。

一月十二日

日寇大举围剿冀南之势已成，现在分途向冀南挺进中，我们决照师计划，袭击恩县与破坏津线，配合整个动作。令津支、青三团向六八八团靠拢。

六八八团失联络的一个班均负枪而归。另有一个战斗员

冲入城内，与敌人进行巷战，部队撤退时，失却联络，该在城内经过一昼夜，匿藏群众家中，昨晚仍负枪越城而出安然归队，亦云幸矣。

黄昏随六八八团直属队移子星屯。

一月十三日

今日划分各团侦察区域，令积极侦察，决定十六晚动作。

一月十四日

今日上午敌机来侦察。为造成敌之错觉，令各兵团均向夏津以西稍事移动，伪装开回冀南，并向群众调查清河路线。

决定十六日部队突然回头，分向恩县及津浦线前进，袭击敌人与破坏道路。当即召集各团首长决定部署，分别给以任务。冀鲁支队亦开到，决令随津支行动。

晚宿营范家楼。群众对我们印象特别好，热烈欢迎，但饮水甚苦。

晚侦察报告恩县敌情甚详。

一月十五日

昨晚忽接师电，令我停止十六晚行动，并令我即率六八八团十六日赶到香城固进行新的机动，津支及成安团①位于夏临之间，相机适应各方行动。

决定六八八团今日西进，以两日行程赶到香城固。我为了交待工作，决率骑兵连绕道至馆陶一次。今日行程为百二

十里，骑连则为百五十里。在临清与鲁西北特委谈约二小时，至晚七时才赶到馆陶，马匹已感疲劳不堪。到馆陶突遇根英②，出我意外。夜深十二时与哲民③、聚奎、墨林谈甚久。

注释：

①成安团，即青年纵队第三团。

②根英，王根英同志，时任一二九师供给部指导员，随部在冀南区活动。

③哲民，唐哲民同志，时任冀南行政公署第三专署专员。

一月十六日

早应沈良斋同志之请，赴宴三鲜园。十时率骑兵连经东目寨到香城固，时已十二时矣。

六八八团下午进到距此八里处之倪庄宿营。

一月十七日

六八八团电台已坏，无法与师通报，敌情任务无法明了，令我焦急万分，当派人到馆陶转发电报。

一月十八日

师十六日电，令我指挥六八八团、补团①、七七一团②、东纵三团③、程支队④、先支⑤三大队、吴部⑥，机动于曲周、广平、肥乡等一带。补团现已进至威县以西之高家庄，准备迎击平乡东进之敌。我决率六八八团明日向补团靠

挽。

根英去师部。

注释，

①补团，即三八六旅所辖之补充团，团长为韩东升，前曾称韩团。

②七七一团，该团建制属三八六旅（还有七七二团）团长徐深吉、政委吴富善。

③东纵三团，即八路军东进纵队第三团。东纵由三八六旅副旅长陈再道率领，为进入冀南一带活动的最早的主力部队。

④程支队，系我军在济南地区新发展组建的一支地方武装，首任负责人为程启光同志，故称程支队。该部建制属当时的冀南军区。

⑤先支，一二九师先遣支队的简称。该支队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组成，李聚奎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⑥吴部，吴作起同志所率之一支游击队，活动地区在冀南。

一月十九日

今日进到马房营。令六八八团与补团干部侦察威、平间地形，随时准备战斗，打击平乡可能前进之敌，并拟定作战方案，召集各团长面授任务。

一月二十日

平乡之敌百余人来河岸侦察，与我补团的一个连隔岸火

战，敌死伤数人，退回城内。

一月二十一日

接师电，为了新的机动，令我今日赶赴七级、张庄师部，接受任务。行九十里，十二时赶到。刘、徐、邓①甚忙，无暇与我谈话。晚十时谈约一小时，但他们已疲劳，明日续谈。

注释：

①刘、徐、邓，指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委邓小平同志。

一月二十一日①

早起与刘、徐、邓商讨战斗方略，决定以后行动。关于政治工作问题，师亦有所指示。赶回旅部，恰近黄昏。

注释：

①与前重复，原文如此。

一月二十二日

许世友同志调任本旅副旅长，东山调东纵任副司令。召集团级干部传达师的指示。旅直准备开香城固。

一月二十三日

据报，曲周今日拂晓被敌占领，敌之一部下午进到我驻地西南十八里处之龙堂，此间已闻机枪声。为了侧击龙堂前进之敌，决定部队移马头镇。到达马头镇时，即令骑兵团及

补团的一个连侦察与袭击龙堂之敌。

一月二十四日

昨晚侦察部队归报，龙堂之敌仍退回曲周，电召新亭①、思林②商讨行动，决定以曲周为主的夜袭，以六八八团及七七一团为主袭曲周，补③、冀西④、东三团、谢部⑤分别箝制与骚扰袭击平乡、鸡泽、永年、肥乡、广平等县。

注释：

①新亭，即王新亭同志，时任三八六旅政委。

②思林，即丁思林同志，时任三八六旅新组建之新一团团长。一九三九年七月在战斗中牺牲。

③补，补充团的简称。

④冀西，指冀西游击队。

⑤谢部，即先遣支队三大队，领导人为谢家庆同志。谢于一九四〇年反扫荡战斗中牺牲。

一月二十五日

敌快速部队——装甲汽车九辆、骑兵数十，企图乘我昨晚袭击部队归来疲劳之际，猛袭我安儿寨。我一团与三大队甚机动，趁敌前进之机，迂回其后面，忽然向其猛冲，敌即狼狈溃退，突围而出，计毙敌五十余人，骑兵全部被我消灭，并击毁汽车四辆，敌当时即退回曲周。

下午三时各兵团均照所示任务，分别到达指定地点动作。

一月二十六日

昨晚袭击结果：

一、我补团箝制平乡、鸡泽之敌，并袭击鸡泽，冲入城内，与敌巷战。敌退出城外。我将伪县政府全部捣毁，汉奸大部被我击毙。我因时间关系，自动退出。计毙日伪至少在五十人以上，获三八式枪一支，子弹若干，黄泥军服大衣、军毯约二十余件，并获文件一部。

二、我七七一团、六八八团袭击曲周，因敌经过二十四日晚的袭击，大有戒心，警戒甚严，二十五日又有永年新增日寇五百余人，连原有兵力共千余人，加以六八八团未按时间，动作过早，协同不密切。六八八团冲入城内，占领日军司令部及仓库，但敌于白日另移东门街及文庙，该地敌均以汽车阻塞街道，开汽车灯作照明，组织浓密火网。我与东关之敌激战两小时，敌又退入东街。敌溃走时伤亡甚重。我伤指导员一人，获日旗多面。

三、我七七一团袭曲周西、南门，冲入南门内，迫使敌人炮兵转移据点。我继续前进，又攻入一个街心据点。敌集中二百余人向我反攻，巷战约三小时，我因一时不能解决战斗，安全退回，毙敌甚众，我亦伤四亡三。

四、其他箝制方面无战斗。

今日各部均以战备态势休息。

一月二十七日

再道率骑兵团、骑兵大队及青纵一团南下，准备配合我们侧击可能进攻威县或广宗之敌。师令我统一指挥之。

今日六八八团、补充团、旅直移威县西南地区。七七一团、东三团移马头镇西南地区，准备随时配合再道兵团，打

击平乡，曲周可能前进之敌。令再道坚决袭击郭桥之敌。

一月二十八日

区分各团任务，分别侦察当前之敌。各级干部详细侦察地形，部队在战斗准备下进行休息。

给聚奎电，示以对敌快速部队方法，并谈筑纵①领导问题。

注释：

①筑纵，即筑先纵队，以国民党爱国人士范筑先的名字命名的抗日武装。范筑先原任山东省第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抗日战争爆发后，与我党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在鲁西北地区坚持抗战，收编了当地大批游杂武装，编为三十多个支队。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日军进攻聊城，范在战斗中牺牲。同年年底，陈赓同志到鲁西北，在当地党组织协助下，将我党工作基础较好的一些支队，于一九三九年一月统一编成八路军筑先纵队，正式列入我军序列。

一月二十九日

早起闻枪声，恐敌前进，令各团准备，并即刻查明敌情。

决由新亭、世友指挥七七一团及三大队。七七一团在曲、广间辗转突击，以其一个营配合三分区游击队，深入肥乡、永年、邯郸之间游击，袭击敌人交通，瓦解皇协伪组织，破坏铁路；三大队主力位于大名与广平间，随时突击敌人，以一个营配合游击队在临津、漳德间积极活动，并破坏铁路。

一月三十日

新亭、世友组织一小司令部出发。

师电令东三团开束鹿。

下午为司令部直属队干部讲课——六中决议①，约三小时。

注释：

①六中决议，即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这次会议于一九三八年九月底至十一月初在延安举行。会议批判和纠正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

一月三十一日

这几天敌人除每日以炮向我轰击外，无他动作。敌人不出，我无法进行战斗，只好以游击队深入敌后方。

下午仍讲课。

二月一日

今日曲周之敌汽车十余辆，炮数门，上午十时突向我古城营、后旧店袭击。我补团（缺一营），即由油房、马坊营突击敌之右侧背，我六八八团由石井町、贺固、南营突击敌之左侧背。敌顿时溃乱，向西逃窜。我补团即截击于燕张葛。激战数小时，敌又由西增援汽车数辆，炮一门，汇合残敌向我猛攻。六八八团突击失时，敌乘黄昏突围西窜。是役计击毁敌汽车二辆，目睹敌伤亡至少在一百以上。我已伤亡一百二十余名，内营长一、连级干部四、营组织干事一、团

教育股长一。

二月二日

得师电，谓进攻旧店之敌，昨晚宿背龙堂。我决心集中力量消灭此敌。拂晓，即令六八八团、补团集结东西李莲头。十时得侦察报告，龙堂无敌。决心率六八八团、补团进到威平大道间，配合再道部袭击向威县前进之敌。部队抵常阜村，见敌汽车九辆，由西（向）威县进发，但距我尚约七八里，射程不够，当即以六八八团向威县接近，准备敌占威县未稳之际跟踪袭击。敌发现我企图，刚进威县，随即返回，向西窜去。我决心以六八八团、补团伏击于辛庄至南孝路之线，配合再道夹伏此敌，各团均按我企图进入埋伏处。

二月三日

据报，昨夜赵家寨之敌，步炮骑约一千五百余人，乘深夜由大道北通过我两个部队间偷入威县。决定今部队在渭上营、琵琶张之线停止，并夜袭威县之敌。侦察报告，威县城墙拆不彻底，东西南城尚无法爬上。决定以六八八团之一部袭击此敌。

二月四日

师令我们开香城固。昨晚袭击未奏效，仅给敌以消耗。上午进到香城固，与七七一团汇合。

二月五日

昨日敌以步骑炮数百人占临清，吉部①退下堡寺，我派

员与之联络。旅部移大临河，为作战便利指挥故也。

下午授课约三小时。

注释：

①吉部，可能指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师吉星文一部。该师曾在鲁西一带活动。（吉部，实际是指吉占鳌部——本刊注）

二月六日

连日战斗，部队相当疲劳，决定休息几日。

悦长①所率之挺进营，今日安然归来，在敌后方破赵泗水②铁路一段，袭击伪军两次，缴获步枪十余支，截获军服百余套及其他军用品甚多。群众对我特别欢迎，得到群众帮助甚大。敌虽急于组织伪政权，但在群众中无丝毫信仰。

注释：

①悦长，程悦长同志，时任新一团政治委员。

②赵泗水，在平汉线邢台至永年间。

二月七日

敌有会攻南宫企图。

二月八日

七七一团、补充团分别袭击曲周与威县。七七一团之一营冲入曲周南街，敌坚守房屋，我突击队爬上屋顶，投入手榴弹，毙敌十余人。补团亦袭入威县，敌固守当铺，激战两小时，东城楼守敌十余人被我击毙。

二月九日

七七一团、补团到达南北马厂东西葛村，准备今晚再袭威县，配合再道部战斗。

二月十日

今早仍归还香城固及其附近。以骑兵连位置南马草厂，担任对威县警戒，并掩护便衣队向威县活动。

十二时许敌汽车八辆，载二百数十人，向我前进。接便衣队报告后，即令骑兵连埋伏于南草厂之树林内。敌车正鱼贯通过时，我骑兵连向之突然射击，敌仓慌下车，向我还击。此时我香城固部已预有准备，骑兵连即开始撤退，佯作紊乱，诱敌追击。敌通过我张家庄埋伏部队前，我未发枪，诱其深入。敌直扑香城固，我即突然向之射击，特别是张家庄之侧射，使敌感受甚大威胁。此时，我决心歼灭此敌，令补团之一部迂回香城固东北，占领杜庄，七七一团之一部集结张家庄，准备黄昏时聚歼此敌。敌陷入我四面包围中，死伤甚大，曾几次向我突击，企图突围，但均被我击退，最后向我发射毒瓦斯弹，我虽中毒多人，阵地亦毫无动摇。黄昏时我即发出出击信号，六八八团之一部由香城固突击，补团之一部由杜庄突击，七七一团由张家庄突击，结果敌全被我歼灭。我获四一式山炮一门，九二式步炮二门，迫击炮一门，枪弹甚多，汽车全被焚烧，敌二百数十人除生俘十余名外，全被击毙。我伤亡仅五十人。这次战斗是我进入平原地区的第一次得意之作。

为了防止敌人明日空袭及报复起见，决定拂晓前移动位置。

二月十一日

今日全部移东目寨以南之布寨、马二寨、自新寨之线。下午敌机数架轰炸香固城及东目寨一带；但我已远离，无损我丝毫。估计敌明日必进攻香城固，并有可能轰炸我现驻地，决乘夜移至邱县以南之侯村镇。

二月十二日

今日到达侯村镇，即闻得我昨日驻地有飞机轰炸声。据报，敌坦克数辆，汽车四十余辆，经香城固进占邱县。又据师通报，南宫方面敌撤回汽车五十余辆，集结威县。我们这次的胜利，确已起了调动敌人的作用，给南面的紧张局势以缓和。侯村镇距邱县太近，决定今晚再转移尖冢以北之老官寨一带。

二月十三日

昨晚行九十五里，早九时到达目的地。部队连日行军作战，疲劳过甚，非有休息不能维持体力。

据侦察报告，敌汽车二十七辆，集结香固城，准备犯我。估计我以疲劳之师，又在敌企图报复凶焰之下，无绝对胜利把握，决定今晚渡卫河东岸，稍事休息。

二月十四日

好容易渡过卫河，今日在枣科、葛庄、潘文寨一带休息。

接师电，令我全部集结冠县东北，执行新任务。

二月十五日

昨晚得到了整晚的休息，大睡一觉，其味道确是无穷。

得师电，令我今日白天赶到师部，接受任务。我十二时动身，刚到馆陶，即遇敌机三架轰炸，馆陶河西岸敌汽车四十七辆，装甲车四辆，企图渡河。此时驻馆之十支队①已呈现紊乱状态，河防守兵亦有部分溃退。我当即严令十支队的负责者，无论如何不能放弃河防。随后在干部带领下，河防守兵尽返回河岸，向对岸敌军射击，将敌击退，一时紊乱的馆陶又复镇定。我已复向冠县前进，但已过黄昏矣。

注释：

①第十支队，奉八路军总部命令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正式整编为一二九师筑先纵队。此处，还是指的原部队番号。

二月十六日

部队昨日黄昏后开始移动，今早进到冠县东南之胡障。准备在此休息两日。我真想作两天不醒翁。

二月十七日

临清之敌汽车数十辆，超越馆陶，进占冠县，此间闻机步枪声，令各部作战斗准备。

决定五天行军计划，今晚开始南进。预定之睡眠，又将付诸夜行军矣。

二月十八日

原来预定在朝城西二十里东西肖家、张汉平一带宿营，我七七一团不加审察，进到张鲁集东南之肖家庄误为东肖家，即进入宿营，后与地图对照，始之为误，但也只好将错就错。

十三时，聊城之敌汽车四十余辆进占莘县，并向张鲁前进，与我骑兵团接触。敌不得手，转而袭击石军团①教导总队。该队一触即溃。我当令七七一团占领阵地，掩护其撤退，并代为收容。

黄昏，经东肖家稍事休息，仍继续前进。

注释：

①石军团，指国民党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十军团军团长石友三所部。石友三是反复无常的军阀，反共摩擦专家。他曾多次勾结日军，进攻八路军，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摧残抗日民主政权。罪恶昭著，后被枪决。

二月十九日

今早进到南乐东南地区，旅住吴村集。居民过旧历年，家家户户红联满门，爆竹响遍乡村，小孩均穿红着绿。

二月二十日

今日在原地休息一日。到师部商议行动问题并整军计划。

二月二十一日

陈、罗①电，二十二日晚过路东。我们计算时间赶不

及，当复电仍请其按原计划执行。

部队今晚移南乐、清丰间。

注释：

①陈、罗，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当时他们正奉命率领一一五师师部及六八六团等部由山西西部出发，越过平汉路，向山东开进。

二月二十二日

九时到达转村集、苦转村一带。刘师长随我们行动。

决定明日部署：1、七七一团之一个营明日黄昏进到五陵集架桥，以一个营进到北高村架预备桥，并控制之。又以一个营，由思林率领，进到汤阴以南，担任掩护。2、补团全部进五陵集以南卫河东岸之王二庄，向道口游击侦察。

3、六八八团决于今晚乘机渡五陵河，从汤阴以南通过铁路。4、以此部署电告陈、罗，嘱勿与六八八团误会，并规定口令信号，指定路线。

二月二十三日

早，得陈、罗电，昨晚已通过铁路，到达水磨湾休息。当即令希汉率七七一团第三营赶到五陵架桥，我与伯承亦赶五陵迎彭及中央大员①。待我们赶到时，六八六团已渡过五陵河。该团部队整齐活泼，战斗情绪甚高，与我们部队比较，确有其进步之处，因此使我益觉整军的必要。

今晚宿彭处，叙谈甚久。

注释：

①一九三九年初，彭德怀同志到重庆，向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报告了河北省主席兼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不断向我八路军挑起摩擦的问题。军事委员会随即派高级参议刘古风随彭德怀同志一起返回华北进行处理。此处所记“迎彭接中央大员”，就是指彭德怀同志及刘古风等人。

二月二十四日

六八六团移大堤口。补团集结五陵附近，掩护六八八团西进。七七一团仍归还原处。六八八团下午二时出发西进。

二月二十五日

六八六团移韩村以北休息，补团仍留五陵游击，旅直、七七一团移固城及其附近。

下午得补团电，东进部队①后尾一部（大行李）误入汤阴，受敌突然火力袭击，以至四百余人未通过。当令补团立刻收容。

注释：

①东进部队，即罗荣桓、陈光同志所率领的部队。

二月二十六日

今日休息一日。赴彭处，听政治报告及整军计划。K连①捕鱼200斤，送彭带回路西。

注释：

①K连，骑兵连。

二月二十七日

新亭、世友组织工作团，随谢部深入三分区工作，发展游击战争，并作本旅补充及筹资等工作。

三月八日

今天是我不可忘记的一天，也是我最惨痛的一天①。

注释：

①一九三九年三月八日，王根英同志在河北省南宫县东南之前后王家反“扫荡”作战中英勇牺牲。陈赓同志闻讯，极为悲痛。

（转自《陈赓日记》）

马景汉同志工作日记摘抄

△民国三十二年六月十号敌人对我冠南部的铁壁合围的一段。

六月二十一日于东周堡。因内容系个人经历略。

△七月十日的麦征工作会议缩影。（摘抄）

在九号即下了通知，十号在东大李村开麦征总结大会，这次会议主要是要各区回报麦征情形，……其次因我冠县地区之扩大，区界之重新划界，干部重新配备，也在这个会上作了深刻的动员：……（略）（1943、7、11）

注：在此之前全县划分为十三个区。

△七月十四日记于白集。（摘抄）

在这次区划，首先经过周（持衡）专员与我作了详细商讨（在北安头），他告给我们这次划区的重要政治意义，及确定划区的几个原则：……当即与王×进行商讨，具体划出区界，区干也都一一初步确定，复经专署级审核了，大致无变化——定冠县划六个区。区级主要负责人均都确定。并指示在本月十五号前各方整理就绪。

△七月三十日住东大李村，召开县区政民干部大会，传达政治形势。

杨谈属郭案件。

天久不雨，冠北青苗大多枯死，一区灾情已成。

△七月三十一日在东大李村。

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略）。

△八月六日莘园。天降大雨，灾情减轻。

△九月六日住杨胡町。〔反省〕略。

△九月七日住杨胡町。关于秋征问题（略）。

△九月二十四日在田平集（阴）记述城北一带农村悲惨景况，群众不觉悟，村政权背我，敌伪之反动宣传。

△十月二十二日拂晓移许家村〔反省〕（摘抄）

最近扫荡濮、范、观之敌大部已北移阳、寿、聊、堂、莘、朝，并由南来汽车骑兵很多，于二十一日下午由分区转知情报，上述各县增敌很多，并传南边此次扫荡很残酷，馑子杀人很多，因地主子弟与流氓分子平日游手好闲，看来不像农人，都叫鬼子当假八路杀了，这样敌人教育了懒汉。（下略）

两个会议记录

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井楼（摘抄）

《大会总结报告》

在××（吴家河）于十月二十六号召开的活动分子大会一直开了五天。这次大会的主要精神是检讨过去半年来的领导问题，特别是领导的一元化问题，要各县深刻的反省自己的在过去一段的对一元的精神的领悟，与反省那些问题阻碍着不能使一元化领导顺畅进行。

再一个问题是，因为根据国际与国内形势的发展，今后我鲁西北地区环境日益走入艰苦是毫无问题，在这个会上××对鲁西北环境作了一个估计，要我们对今后我区艰苦环境的应付作以较深刻思想准备，对下级干部要作较深刻动员（因为今天绝大多数干部未有认识到今天环境潜伏的将要到残酷环境）。同时××也检讨了在这三个月中对小部队建设与开展敌占区与接敌区工作的忽视，对此工作未引起各县负责人的重视，致敌占区、接敌区工作没有得到开展，小部队建设也（没）有什么成绩。

在二十八号我们开始上述几个问题的讨论（反省检讨），首先是对我们县的主要负责人对一元化领导认识，与实际工作中违犯一元化领导的具体表现。我们检讨出了我们违犯一元化领导的基本原因是：干部尚未从思想上来认识一元化领导问题，所谓对此问题还未能从思想上打通，所以一些问题处置都不能从整体出发，不了解一些工作都是党的工作，把工作看成是某一个部门的都是错误了解，不了解一些工作都统一在我党领导之下的，对与（于）任何一个工作的不注意与轻视即是不注意党的工作与轻视党的工作。这样的行为都是对党不利的。其次对工作中对各种政策的掌握也作检讨：认识到过去在我们县级负责人在工作中对原则性问题慎重考虑研究（不够），往往在工作上错误已有了，自己还不能发觉，真真表现了政治上的麻痹（如对阶级政策与我党的经济不研究，在赎地问题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对上级指示机械执行）。

《负责人的发言》

杨部长〔注〕发言：

一、反对内战的思想准备问题。

今天根据各文件国民党正处在三叉路口：①投降日寇；②携手抗战；③拖下去。今天他是拖下（去）了，是中间一条路；将来怎样？是看他舆论动员如何？（今天大后方都拿中国之命运当做各学校课，到处都是）待他舆论动员好了，即要打起来。同志不要抱着幻想，国民党永久和我们合作下去？要好好作舆论动员与思想准备。……再加上群众正统观念，更由蒋介石数年的培养，在群众中有威信，大地主与大资产阶级是他的社会基础，中国之命运是他的理论根据。我们不要盲目乐观，工作思想准备与广泛的宣传共产党与毛泽东之影响，将广大舆论动员起来。我们要做下面几个工作：

①作思想准备与舆论动员。

②反对敌特与国特合流的问题。（略）

③群众观念、劳动观（念）。我区连年灾荒及借粮、赎地、代耕等工作，打击了生产情绪（借粮斗争基本上是错误）。今天说对敌斗争是右的，对民主民生斗争是右。（区党委指示童养媳不禁止，押地不禁，高利贷不禁）过去是小资产阶级左派幼稚病，厚乐主义，分红观点。我们反对新贵先从上层反起，到村里新贵更多，贪污浪费更不用说。我们说群众观念，多与群众做好事，从经济斗争走到政治斗争。……

注：杨部长系指杨易臣同志。

劳动观念：自己动手去干，再与群众（动）手去干。今天我们有的倒拿老百姓的劳力来为自己劳动。

二、巩固党的工作。

①反新贵问题，新贵不反会杜绝我们巩固党的工作。

②培养与提拔干部，精兵简政充实下级。

三、领导问题。

①县委领导要主动，地委把他们束手束足，今后领导权下降一级，使他们有计划，使他（们）有预见性，克服办法是，上级如规定计划不变，如有新指示，注（意）准备意见。……

②一元化领导，党员服从党。

扈同志发言：关于民主民生政策问题

一、在执行政策左的几个表现：

①借粮问题，没有清楚的认识阶级政策，而只是根据富力如何，不进行阶级教育（如借粮、赎地、麦征都是对阶级政策不了解的，事实上打击了中富农（的）经济发展）。在减（息）工作是个别，不能造成运动，对利息总起来说是不加限制。今天我们是免群众贷款，而不是减息的问题。合作社工作的宗派（党员贪污），新贵产生。

②方式方法上：突击、闪击战、急行军……突击工作很好，但是我们虽有注意教育政治内容，完成任务不一定用突击，他们（是）老百姓，不是大兵，是左的行动。

③在观念意识上：我们认识越穷越好，狭隘群众观念，单纯站群众立场来处理问题（如对军队的不爱护）。

④党委的宗派主义（如区委的），赤色恐怖，对接近群众上是有很大障碍。

政府：粮食供应表现了宗派。

⑤策略执行，在执行政策，不是耍手段。

二、执行政策上检讨的意见：

应以经济划分地主。①死租地主（不管是怎样，一年要多少）；②活租地主（三七、二八分粮）；③雇用×××地主（为经营地主）。我们应消灭（①、②），要第三种地主变富农，这是由封建经济变成资本主义经济（太行区奖励地主储蓄）。今天要克服地主富农不分，如把富农当成地主打是（不）策略。

富农：①上升的富农是进步，②老富农保守；③地主降为富农是反动。不能将富农当成斗争目标，

吴满有路线：①勤劳；②不但自己勤劳，而能推动其他人；③拥护政府。今天为什么提倡吴满有路线？因今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只是想越穷越好是不对。吴满有路线是发财观点（他喂六头驴三个雇工人）。我们提倡吴满有路线（业余生产），大大培养吴满有办法是号召贫农向中富农看齐，反对寄生意识，大加批评他们不如中富农生产好，反对懒汉。

基本群众认识：不能再把中农、贫农、雇农再分开，应当认识到中农是我们的永久同盟者，处理中农与中农（？贫农）之间的问题应当（有）团结精神。我们不能怕出无产阶

级。你努力生产就可有土地。土地集中在中农与富农手里，这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必要现象。

雇工问题：注意复工，对增资不要强调，不然会……逼的他们（指地主）土地租出，多增寄生。

三、生产问题（略）

四、对群众工作的巩固（略）

周专员〔注〕：关于生产救灾问题

〈一〉粮食上的问题：这一个问题贯彻我谈的整个问题

第一阶段：秋征后到年后是虚荒阶段，灾民开（始）外逃，根据各集市交易额是非常零碎（证明贫农、中农卖粮）。

第二（阶）段：真正缺粮时期，粮价高涨，群众用（代）食品来维（持）生活。

第三（阶）段：缺乏购（买）力的时期（明春），粮价继续高涨（但树叶野菜开始有了）。

我们应根据以上三阶段的粮食问题来布置我们的救灾工作。

对第一（阶）段，我们应大力宣传教育节约，长期着眼，展开与群众算账的运动，掺糠吃菜，叫他们在冬天少吃，待明年春耕生产时再吃，同时帮他们计划生产。对必须逃荒之地区应组织他们逃荒，印发灾民证，介绍他们逃荒；

注：周专员，系指周持衡同志。

主要是老弱逃留壮丁在家，叫他们参加运输，把他家所存之一点粮食节省支持（到）他春耕时候，在此时少赈济。

对第二（阶）段粮食恐慌，工商局大力抛出商品粮，平抑粮价，但不要一时将粮抛出是很危险，主要调剂粮食，大力开展纺织制盐等手工业。

对第三（阶段）大力打井，代耕，来支持生产。因此时疑群众已无购买力，政府应将救灾粮抛出。

注意事项：第一、二期应（注）意工业生产（家庭工业占主要地位），注意解决生产关系（车与驴结合），合作：打油、纺织，大大结合以增加生产力，与解决生产工具的困难，单依（靠）政府力量是不够，应大力组织互助，解决运输工具与盘费，……今年冬天工业生产是为明年春天的农业工作（打）基础。

同时进行政治攻势，选择劳动英雄，组织劳动竞赛，开展反懒汉运动，奖励模范劳动英雄，这是第一二段工作，至第三段主要是农业生产。

.....

〈四〉粮食问题：冀鲁豫刺激敌人最大的是粮食，山东组织粮食采购委员会，敌人大力高价收买。

（一）护粮工作：首先从群众着手，特别是中心区，主要是群众的粮食，号召很深的埋藏，很好伪装。政府粮食应转移地区，教育群众保守粮食秘密，盗窃空舍清野的人应严肃处理，在广大群众中进行教育，在扫荡后及时检查粮食，

迅速处理盗窃空舍清野的粮食，应通过群众教育。

（二）防止敌人高价收买我们粮食。

注意缉私工作，划定缉私面与缉私线，防止青年民兵缉私工作之偏，百分之三十提成，只有查获权，没有处理权，公务人员一概不提成，并相对提高中心区粮价。

（三）对中心区粮食工作：在小麦播种时提高谷子价格，待明年春天，平抑粮价。

〈五〉反特务工作。〔略〕

赵司令〔注〕：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及
备战问题

〈一〉对武装的重要性：

①在过去党委党员不领导武装与爱护武装是原则上的错误，以武装人民来反对反革命的武装，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与英美国家不同，又例如蒋介石无论他干什么职务，他是一时也不离武装的，今天从各方面证明掌握武装是重要问题。另外是军队干部不接受党委的领导也是原则错误。

②从事实来谈：我区环境日渐艰苦是有可能。这样发展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也很重要。冀中、冀南、太西等地区虽然敌人碉堡林立，但由于我们地方武装人民武装发展的好，仍能坚持工作，主要条件是有人民武装与地方武装。（冀中冀南能抽出主力兵团，我们是不能抽出，如回支走后即叫喊）

注：赵司令系指赵健民同志。

我们县区武装（即地方武装）是有限制。我们想着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争取战后优势，主要是发展人民武装（如太行×地要保证在反攻时能抽出七万民兵上前线）。

〈二〉建设县区级武装必须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①现状（略）今天我们的武装与各方面的关系都不好。

②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纠正党委不关心武装，不使用武装的偏向；同时军队党不接受党委领导的错误更要纠正；

（二）组织领导：各级党委要经常讨论武装问题，对县区武装的问题随时予以解决；

（三）纠正挂名兼职错误，错误思想。

③人民武装组织形式改变后应接受党委的领导（与政府保持原有关系）。

干部问题：各县眼睛向下，各县党委要找对象，分区负责训练，加强党政工作，加强他的政治领导，往往破坏纪律的事都是先由士绅反映，并不是党所反映出的。

〈三〉备战工作：

（一）经常政治攻势；（二）保护粮食；（三）打击与消耗敌人，改造村形，叫群众保密，……对抢粮敌人坚决打击，大力破路，如不破路将来会吃大亏，挖河口；

〈四〉地洞建设是很重要又是长期的。

大会总结报告 梦侠〔注〕

〈一〉第一，略。

第二关于我区环境之特点：①今后环境转坏尚未引起同志（们）高度注意；②再就是连年灾荒……普遍的带有连续性……我们对政策掌握不稳，打击了群众生产情绪，更大大障碍工作；③工作的不平衡与不深入……掌握工作都不能脱离了这三个特点。

对以上三个特点认识不清楚，在工作表现以下的四种错（误）：

①在领导上一元的领导思想未能打通；

②对敌斗争是表现右倾，不敢斗是保守的，单纯防御的架子，对环境认识不够，如对粮食的保存，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的建设，这是表现了对今后环境认识不够，在领导上是麻痹松懈；

③除奸反特问题：今天不管中心区与边沿区敌探奸细到处横行，干部都不关心。同志们发言除奸是左，是不对的，即是左也是个别的；

④伪军工作，不能从政治上多打击他，单纯满意军事打击；没有认真的作打入工作与有了关系后认（真）的作组织工作。

〈二〉领导问题。

在领导上是主观主义的，是多从左的观点出发，对下级包办是相当严重。自区党委加重地委责任后，即机械执行。

注：梦侠，系指许梦侠同志。

再就按群众的包办代替在我区很厉害，一些工作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而自己代替，是小资产阶级疯狂性的左，不管群众能否接受，是一味领着群众去干（如赎地、借粮、强迫穷富与今年麦征等等都从□□左的×观点出发决定问题，这也是主观主义的具体表现。）再就是单从富有者身上打算盘，与依靠政府来改善群众生活，而不能从生产节约精兵简政，从群众少负担与少资敌种种方面去打算（太行分局指示在严重灾荒下对各种政策执行中（要）灵活，如赎地、童养媳、减息）。又政府部门干部只是单纯向群众要东西，是积极的，相反给群众东西是不认真的（如专署未能将麦种运来冠县，未能将救灾粮运走），严重的自满，老一套，不求改进创造（工作方式方法），如对新贵认识表现满意，致我们脱离群众。

对本身的贪污浪费现象看去不严重，看不出问题，满足现状，对此问题表示无能。今后分区级组织审查委员会，注意发扬民主。

由于我们不认识不平衡之弱点，对敌占区接敌区工作是放松了，只满意于抓中心（区）了，因为我们一些工作要为战后作准备。

（三）工作方针与各县工作问题：

①总的工作方针——一切工作生产为配合并与敌斗争结合，并向群众中作教育，这是特别强调的两点。

②各县工作：

（一）冠堂（即武训县）与永智县工作（略）

（二）冠县：从生产救灾中与对敌斗争减轻群众对敌我

之负担来改善群众生活，再继续再打开未打开之封建村庄，这也是不能忘掉的。

（三）聊堂：应从反资敌反特务工作中加强生产的领导来发（动）群众与发展党，团结各阶层来对敌斗争，巩固村的工作来大力开辟伪军工作，可个别的进行反贪污。

〈四〉大会基本精神在那里？

自整风以来对工作检讨与反省自己领导等是空前的，但反映出仍是很少今后贯彻下去，我们今天为了

（一）为了实现一元的领导，使领导依靠组织，依靠群众，少主观包办少犯错误，今后即必须认真的研究“九一”决定，加强调查研究工作（赎地问题决定是因为没有很好作调查研究而致）

再建立党委核心问题，首先是党委（委）员对党委负责的问题是加强整体观念不够。培养中心干部问题，这也须要组织来培养中心干部，我们要以承认各种条件较优的同志来作中心干部，这样才能克服群龙无首。

（二）我们今后一切工作以生产与准备生产与对敌斗争、加强劳动观念，领导群众致富以减轻群众负担，严格肃清贪污浪费分子（为中心）。

（三）在中心区工作深入提高一步，关键在于发扬民主，克服包办提高生产加强教育加（强）战争准备，反对新贵，对一些问题引起讨论反驳。我们加强群众教育各县建立联宣部。在接敌区应从对敌斗争中发动群众，注意经常的全面的政治攻势。

(四) 为了克服思想混乱，加强思想教育与前途教育，特别是在群众中加强思想准备，反对变天思想与反正统观念，我们认真培养吃苦耐劳精神，培养吴满有精神。

(五) 反对官僚空谈主义，发扬切合实际贯彻始终与大众民主的作风，来大力开(展)反不良倾向斗争，思想斗争，揭发假群众观念、假劳动观念。

防止可能发生的偏向

(一) 反对向群众泼冷水，不敢向顽固分子作斗争，向干部也是如此。今天求得适当转变，要转大弯，使干部在思想上逐渐打通，求得逐渐转变。但对一些贪污分子是不宽容过去的错，是由地委负，但下级干部也要负，研究上级指示，机械执行强迫命令。

(五) 对几个问题的解答

一、备战工作：大破路一定要作，改造村形(拆车挖街口埋粮)注意破路破马颊河路口，打狗准备在冬天打，但好好动员群众……在备战工作是建立指挥，同时建立群众性侦察网，区委兼指挥部主任，县委讨论呈地委批准，不一定要都兼任；在村级要副支书兼指挥长，主要精神在掌握武装。

二、拥政爱民与拥军工作。……今天军队在拥政爱民应注意教育，多打仗，爱护民力，尊重政民，在拥军工作，动员归队，帮助扩军及尊重帮助抗属，给住军以便利，向群众教育，政民负责给部队担架带路送情报与劳军(精神与物质的)。……

抗联最近制定拥军公约，分区制定拥政爱民工作，在阴历年检查。

三、贪污浪费与支差：应当很好召开粮食制度与设粮站以减轻民力的消耗，严格肃清贪污分子。但是先加强教育看重财经部门与事务干部，尊重他，在政治（上）加强教育。我们自上而下的搞。有集体贪污，有看贪污而不问，有看见贪污现（象）而自己灰心丧气，这都不是对党负（责）的态度。

粮食不够吃的问题，在部队教育体谅民困。在粮食部门多检查，保证各部队的粮食的干净。

四、略。

五、部队中提高政治工作威信，一方面由政治工作部门本身去检（查），依靠艰苦的深入的工作，……同时在军事干部方面重视政治工作，主动培养政治干部威信。

六、会门问题（略）

七、干部问题找寻干部应眼睛向下向外。

八、精兵简政问题：我区对此问题了解不够（是常着眼，人多养不起），要加强干部责任一人顶四人用。

九、扩军问题重新提起检查下层，对二十二团的扩补三百至四百看各县完成怎样？时间阳历年底。

审查干部问题：明年一月开始干部审查。（完）

窑头〔县长联席会记录〕11、2 专员讲话

总的方针：以生产救灾发动群众与大力开展接敌区工作为中心。在中心区工作主要是反资敌工作，通过反资敌工作贯彻反恶霸反贪污反特务工作，达到发动群众的目的，（改造接敌区村政权与发动群众）但是由于我们已估计到今后环境是一定逐渐严重转坏，我们要贯彻生产救灾工作必须经常

在备战中来进行。首先我们谈的是：

①生产救灾工作：在今冬明春怎样解决劳动剩余力使用，再就是怎样与明春农业生产的准备工作——解决妇女劳动力的问题（即组织纺织），凡有群众工作县份都要大力来作——运输工作冠县应大力作，可以给群众好多利益，另外还可作制盐打油（如冠县六区可制盐、翻土牧放等工作），（桑阿镇附近可买大批耕牛大力翻土至冬冻为明春开冻后还可再犁），五月荒可能减（轻）。（下略）

运输问题：略

纺织问题：略

其他副业：略

开展节约运动与群众算账运动：……

反懒汉，并提明春停止借粮的布告，这是一个政治工作，用以刺激群众生产。各县均应考虑，看你们的条件如何。

②合作（社）的工作：以冠县及莘朝县为基础，关于业务方面，先试验，先以莘朝作试验，以此作为群众生产的碉堡。冠县成立合作社工作队，由工商局领导，政民抽干部（即工商之合作科），每县可先考虑干部，但不要多，冠县可多至三至四个。今后专署详细布置。今天提起注意考虑。

回民妇女生产问题，她们不会纺织，只会做鞋，我们可供给原料，按市价，因部队已停止鞋袜工厂，以照顾回民妇女工作。

〔对敌斗争反资敌问题〕 范处长

我们想开展对敌斗争工作，必须灵活反对老一套，应

当积蓄力量，隐蔽力量，埋头苦干做了工作，不叫敌人知道，且忌大吹大擂的作风。我们同志须要先做准备开展接敌区工作，首先要从思想准备。在冀南开始转变开展接敌区工作时，干部提许多困难——不是本地人，不熟悉，没有武装掩护等。这是第一段。次后待进去，以后不会有危险。有的把根据地老一套搬去了开大会，减租减息。等住一村时很长左的倾向发生，干部大批损失。再就是对接敌区估计过高，不把中心区一些工作(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简易化，单纯的进行伪军伪组织工作(××县长打入土匪内老百姓悲观失望)。干部逐渐腐化了是第二段。

我们想着开展接敌区工作必须有灵活的策略思想。

首先我们了解要开展工作，反资敌工作是中心一环，但不等于不资敌，而是有具体内容的。欲要开展生产建设，也须要先从反资敌工作以减轻人民负担(□□地有井很多群众因对敌负担过重，群众逃走了)。但此工作必先了解情况，不然会得到相反结果。现在可分述如下：

根据地变的接敌区，开始打了钉子，富有者愿资敌，穷人不愿资敌，最重要是村中统(一)战线的斗争，应在村中召开会，说服一部分落后的人，大会斗争。这时有暗地资敌，应打击之，但不要过火，当成死心汉奸打击，适可而止。这样村中统一战线可能弄好，进入武装反资敌，组织人民武装打击。一旦被抢被烧，政府想办法救济慰问，干部经常鼓动，使群众情绪不低落。但是我要了解一个村子反资敌胜利是很危险，造成突出，先从一村作起，普遍做起，组织抗日联防，制定联防公约，在此工作中也发动了群众，改造了

村政权，这为第一阶段。

次之在按钉子以后，是否能保证群众永远不资敌呢？我们说到了一定时期是要资敌的。不然会遭受敌人严重打击。我们干部会脱离群众的。怎样掌握不资敌转变为统治资敌，是以群众利益为标尺，群众资敌利益大即“资”；如资敌对群众利益不大即不“资”。总之，要辩证的灵活的来掌握，不然会发生左右的倾向。我们从不资到资敌之掌握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打击中可能打击伪军伪组织与死心汉奸。）

如何领导反资敌？到一定时期非资敌不可时即准备支应敌人的人，我们叫他是支应夫，受村公所领导，要村长掌握资敌账目，并向区公所报告资敌账目。采取间断资敌办法。敌人兵力大小与我力之大小斟酌情资敌。

最初谁也不愿去当支应夫。好干部都不愿去。第一段必须用流氓分子，掌握这个问题须要村中群众开大会，推选人去。为防止假条子，我们可大力开展伪军工作，打通关系，假条即可去掉，逐渐公正好人也敢去了。但去据点的应当是间断，不要固定一人，不然会被敌利用（如冀南二分区伪军用提成法利用村长）。经常换，每换时可停止一个时期的资敌，为第二段。

资敌连续下去，是成了新民主主义政权与殖民地政权的斗争。我们尽力作不资、少资，敌人即用取消公平负担，取消减租减息、使抗属负担等，在此时我们应当特别注意对政策的掌握（如敌人叫抗属负担，我们即叫他们负担点，又如支差代抗属代耕了，我们即承认是等出差。这样谁都愿意与抗属工作，如抗属不资敌不能行，即可少资敌，采取折中的办

法。我们不资不行，完全执行进步法令是不成，敌人完全不叫我们执行又不可能。他有时也会采取分化瓦解我们。（如他出夫给钱穷人愿出富人不愿出，往往会失去我干部政府威信）我们采取革命的灵活策略。

第三段干部右倾，村干愿资敌，因资敌村平安，不资村庄危险。资敌拿的不是干部的东西，甚至干部愿意有炮楼存在，感觉有炮楼可保险，以达到与伪军和平共居，对富有者压迫更甚与新贵的产生。此时期应当发动群众对村政权改造，发动秘密人民武装，大力发扬民主讨论村政权的三三制问题（在此时资敌问题是人人关心的）。

第一段反资，第二段不资转入掌握资敌，第三段又由资敌转入反资。

在村政权方面：（略）

在群众武装：对武装斗争方针应当适可而止。有公开武装可抽采取流浪式慢慢脱离，以后再秘密派回，不然会为敌人破坏。回去后即成半秘密性，采取夜间活动，主要是反特锄奸。

群众团体采取灰色化，但须不要过早，要经过适当斗争，而后奸细净尽再组织灰色团体，用打锣吹哨作欢迎敌人实作警号，叫工作人员躲起窜洞。

对敌经济斗争，缉私工作在一定时间内是有作用，但时间长缉私线只是缉到好老百姓，真奸商反脱网而致脱离群众。到这时须要改成内线缉私，而先了解情况，那个据点走暗私，即开始向他们开展政治攻势（你们须经我们工商局。不然我即缉，如不服缉。找主要打击后即争取其他。他们自

已可自动找我们报税。同时可能让他们作些其他工作，叫据点内大商人帮助我们缉私，小商人用暗号，即有×号者即报税者，没号者私，叫他统计，并告我谁走私。）

货币斗争：敌人一定打击，在我一定要支持抗钞，在冀中支持抗钞主要依靠村政权来支持，叫村长请求伪军，购买伪军，购买敌人（说我们没有伪钞，没法办，老百姓受不了），再向群众多要抗钞，可多顶款，并与抗日政府联系。

征收工作，此工作应当在敌人头里征，先向敌人作调查，看敌先征啥。我们征收数可造假数（实征二斤，假数是二十斤），叫群众称穷；反征收武装包围据点，打征粮伪人员、伪村长。

过去没有工作之接敌区

①三面接敌之接敌区，因退缩而失守，此区如何进行反资敌工作，应当先秘密活动，与士绅村长教育交友，叫这些人逐渐变成革命两面派。此工作要与反特务斗争联系起来，伪军二三下乡，我们要区别对待，公开的对催征人员将好的定条件放回，最坏者取镇压政策。连带开伪属座谈会，叫他们与儿子送信，叫他变成两面派，要他们不公开，次后小部队及政府应即开始进去活动，进行反资敌工作，注意不要操之过急，致叫群众受损失（从小处反起）；再次后即可开始建立抗日秩序，委任村长，私自出头资敌者以汉奸论罪。这可能渐变成中心区。但此工作最主要的一环是改造村政权，变成不资，由革命两面政权变成完全革命的村政权。

②我们始终没有工作的区域，但敌人也没有工作，这种地区往往是旧政权，地主统治，少有武装，有土匪白面客商

利贷等。

这些地区困难多，离中心区远，应当从长期着眼，工作中应注意争取知识分子，建立知识分子灰色组织，结合地主武装变成灰色武装，工作是肃清土匪白面进一步清除死心特务，然后开禁少数敌人出来，但此时地主武装政权开始动摇，他们怕打仗……

③敌人间接统治地区，此地土匪会门（冀南一分区有之），对敌人势力分析：一种地主武装与敌妥协，二种是游民武装与敌人妥协者。但他们之间互有矛盾。这样也可能与我们发生关系（在他们也愿有我们，而不怕我们），此地工作较难，对他们如何进行斗争，看我们政策掌握如何；争取与打击联合运用，一个地方一个方针。总之我们不能右到麻痹漆黑一团，左即不能冲动，长期着眼。

开辟接敌区冀钞市场经验之介绍。

开展冀钞市场与群众是有联系，使接敌区群众与中心区密切起来。在商业上他们发生关系，开辟了新地区没有冀钞市场开展，这个地区是不巩固。

征收工作与货币斗争结合，单纯的征收会使冀钞凝固起来。

巩固冀钞必须进行贷款工作与群众利益结合宣传才有效，使冀钞变成老百姓冀钞。开始可与上层拉拢，他能支持我们。

压低伪钞价是（主）要的

最后特别注意调查研究，由县区村进行详细研究具体研究。

反对老一套，一切为群众利益出发，……

反对在资敌中和平共居贪污浪费现象。

零碎问题

商业问题中心区商店主要是支持合作社面向群众，看群众需要什么。商店可逐渐转化合作社之骨干，工作可多叫合作社去作，要贷款与群众，叫他们自由买卖，不要完全公营。今后应贷款与公营灵活运用。

税收政策，对合理负担重视不够。我们统一累进税是几千年来最大改革，……调查研究土地人口比例每县可调查三村三家，按户调查（收入之调查）土地收入、动产收入、副业收入，或以谷子为标准折合。（再就是开支）种子耕牛肥料（即生产消耗）家庭消耗婚丧嫁娶菜盐（非生产消耗）。

收入 - 消耗 = 剩余（即叫税源）

调查可从可靠同志家作起，差不多可用半月时间，次后即易，先找规律。

我们正确的税收政策是发展富农经济，使中农愿发展为富农，使富农不愿变成地主。

建立制度反贪污浪费

财政工作即是打算盘工作，计算工作，工作要最精确最细密，这样我们要建立严格会计审计制度，建立精确的核算制度。

反贪污问题大力开展反贪污

①从反官僚来开展反贪污，首先从自身检查深入检查开始。

②从思想上来进行教育反贪污加强干部群众观念劳动观

念。

③必要制裁应按政策。（完）

周专员反资敌工作补充：掌握公安部门，调查并作详细研究，帮助调查！注意开展接敌区工作，灵活的转移干部力量。特别是冠县最近资敌现象日渐严重，先不资敌之村庄，今天又开始资敌，要引起负责同志注意。

（窑头村）备战工作（十一月三日）

备战工作主要破路改造村形与藏粮。在开展备战工作要注意强迫制裁与动员教育，顾到得失问题，特别是冠堂与莘朝边与聊堂，不要求过高。再关于此种工作方式、时间等问题，各县注意到不影响种麦，灾区不破或少破，不采取突击方式。应采取具体分工，加强督促检查与组织工作。总之不影响群众生产。专署不统一布置时间，可自己决定，但要抓紧时间，不然即可遭受损失。参加运输队者不参加破路。

改造村形要与护粮工作联系起来。过去对护粮工作检查是不够，应当认真检查与再埋是万分必要。各县对五日护粮尚未彻底进行。但不要偏重公粮，农民粮也要特别注意。

在改造村形应多设便门，以利群众与妇女外出，主要大路口。

挖洞工作。每个干部要有洞，每个后方机关在经常住的地方挖起，以防敌奇袭。……后方设一专科长管理负责……每个区公所一定要挖三四个洞，有人说扫荡时区干部可转移边区那是不合适，应多设洞来坚持工作。

几个零碎工作

优抗工作。连年灾荒，粮食在极度困难下我们也进行优抗，这对巩固队伍上起了很大作用。现在我们准备年关优抗。今年收成较好，我们尽量多照顾。但今天特别注意的是，组织一个力量具体帮助区干部进行调查工作，时间从十二月一日开始，至十二月底止为调查工作，十二月十号专署发粮。

旧历年关我们放急赈，专为老弱孤寡，事先可募捐，政府补助一部，冠县可酌情处理。

慰军工作。关于开支政府可支付一笔款，不募捐，但多发动群众，多写慰问信，各县政民军开联欢大会，互相检讨，掀起拥政爱民及拥军活动，各村应提起检讨，拣最坏村集中力量去开会，对抗属缸不断米。

对年关工作，各县应当排列好，优抗在先。

贯串这一个月工作，旧历年前一个月掀起算打运动，改造村政权，反贪污，但应当找重点去做。

村干部训练工作，两年来由于灾荒未能加以训练。但今年我们要好好训练。如何训练？即将村长放在区里，县级可掌握。过去区政权与村政权关系不密切，光使用不教育。应采取小规模训练方式，因区干部都是过去县级干部所掌握。

区可乘此机会调查一些村的情况，与研究对村政权之领导。教育内容明年春天耕地，反懒汉，研究村政权之领导，分工摊派，减轻群众负担，中心县可办两期，可分散，不集中时间，各县可自行考虑。

领导问题。要对县可加强责任，如司法权限，县对区的权限也要加大，使县对区主要检查政策教育与掌握情况，改进县对区的领导，减少事务包办。调查研究任务要分科负责。

新一（注）关于武委会的问题 11.3

对备战工作之补充：

①挖洞工作不要公开宣传大吵大嚷，我们漏未作成即可引起敌人注意，遭受破坏，对此工作不应要求过高，应当推动个别进步家庭作起。

②为什么改成武委会？不是因过去武装科属后不对有错而改的，他有更多优点与成绩如：

（一）工作步调与其他工作的一致，如看青工作二月末发展民（兵）六百人。

（二）对干部政治上管理教育，干部有了较大进步与坚持了各种制度。

今天改为武委会是根据工作阶段发展之所致。又因武装直归政部群众性与机动性小，……

再就是在近半年来群团只知发动群众，不知武装群众，……今天我们为加强一元化领导，真正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

今天对改变组织形式的认识主要是改变组织，千万不要因改变而影响下层工作。只是在上层打圈，可宣布取消联防委员会，……对群众解释，须开政军民联席会，讨论组织形式与干部，再开士绅县参议及政军民代表大会，提出委员会之名单，大会通过。

注：新一，系指杨新一同志。

周（专员）总结讨论 11.4

①关于生产救灾问题：

代耕队（略）

纺织工作（略）

打油工作（略）

淋盐工作（略）

对敌斗争此种工作我们缺乏精细确实调查研究工作，致无法着手（不了解他们的历史，对我们之态度，……）不能根据不同对象采取不同办法，打与拉灵活运用。对各原则下层战士可以争取从宽，对其上层长官应采取打击方式，对各占区大批知识分子的争取是很重要问题。我们应主动找他们，再即应通过其上层争取其下层。

集市工作（略）

伪乡工作。在各县乡伪政权多不注意，县各乡情形均同。但对伪乡我们根绝与伪部干部公开接头。

对革命的两面派伪部，我们可逐渐（使其）离开敌人接近我们。

对真正两面派伪部干部叫他再进步，深入工作保证工作任务，掩护干部，不要满足少数礼物。

对我们不够忠实的伪乡政权，我们可（取）渐进态度，使其由应付我们也应付敌人，渐次倾向我们。对根本不接近我们的伪政权取打击态度，基本上不培养他们的威信，应当在任何场合下破坏（他们的威信）。要站稳抗日民主政府的

（立场），对伪军汉奸是专政。这要同志明确认识。

（完）

会后感记

这次大会一直开了十天才结束。开始在吴家河，继又移至井楼，后移玉庄。在这次大会要算是空前的。他们对过去工作的深刻检讨同时教育了我们。特别是对年来民主民生工作之检讨，对敌斗争之检讨，指出今后仍以生产救灾为主要，干部要加强劳动观念与群众观念，大力开展接敌区工作，并且还估计到我区今后环境可能转坏，所以便把一元化领导很严重的提出来，对过去一元化领导作了深刻的反省，与各县干部作出自我检讨揭发，同时发现了我们过去障碍着一元化领导实现的根源——各部门负责人对党委认识不清，遇事不能从整体出发，把党委看成党政军民的联席会，强调局部利益，本位主义严重表现。

这个会对区工作之转变是有他的重大政治意义的。这个会的结束即我区工作转变的开始。又加我区划归冀南又是有利条件，因他是较先进的根据地，负领导责之首长均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与战胜敌人最高度的信心。

今后我们有了斗争丰富经验的领导者与有了干部，开始认识敌后我区工作发展阶段与特点，我们转变有很大可能工作再前进一步，把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进一步的巩固。

但是有利条件是具备的，可是这不等于工作有了成绩。乐观，特别空洞乐观是会减少我们胜利份量的，反对工作没有

胜利信心的同时，也反对无任何根据的盲目乐观者。

（43、11、5冠县辛庄）

作者介绍：景汉同志曾长期在我区工作，曾任冠县县长，我区专员，现任河南省司法厅长。

编后：这是冠县党史办公室从马景汉同志处征集到的一本珍贵的工作笔记。这本笔记是马景汉同志把1943年6月10日至1944年12月8日的工作情况，作了一百多万字的真实记录，上面只是编选了其中的一部分。由于个别字迹难以辨认，只好以方框代替。为了阅读的方便，个别字作了更改。因为是记录，请同志们读时注意文中要表达的意思。

编 者

我们的好政委肖永智同志

——纪念肖永智同志牺牲四十周年

许 法

在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肖永智同志一直被称赞是一位年青有为的优秀干部，是一个文武双全、智勇兼备，颇孚众望的领导者。无论是思想政治领导还是军事指挥，都具有杰出的才能和高深的修养。现在，每当老战友们聚会时，无不缅怀“我们的好政委肖永智同志”。痛惜他离开我们太早。如果他活到现在，一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肖永智同志思想政治觉悟水平高，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四方面军时，他曾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受害者之一。一九三四年秋，张国焘错误地搞“肃反”运动。肖永智同志被诬陷为加入了“改组派”。他被“五花大绑”地押解起来，被打得遍体鳞伤，衣服也撕烂了，染透了斑斑血迹。同志们看到这些情景，都感到心里非常难过而暗自流泪。这些严刑拷打、惨无人道的“逼供信”，没有丝毫动摇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坚定信念，没有丧失一点儿对党和人民事业的信仰和崇敬。肖永智同志是在党的培养下，经过严峻考验成长起来的。他一贯坚持党的领导，坚决执行“党指挥枪”。八路军先遣纵队建立之初，他率先执行党

章，召开了党代表大会，选举了纵队党委，抓了健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工作，加强了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肖永智同志尊重地方党的工作，地方党和部队配合得很好。部队中同级干部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干部与战士之间的关系也很融洽。他严格教育干部绝不能有“枪杆子第一”的思想。如果发现这种苗头，即行制止、纠正。行军中让地方党政机关人员走在行进部队的中间，保证党政机关的安全。发生战斗时，让地方党政机关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地方党政机关遇有困难，如征粮、挖路、天旱抢种等，都主动派部队前去支援。抗日战争爆发后，肖永智同志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政治委员，那时，肖永智同志才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小伙子，就担任了这么重要的职务。后来调任东进纵队政治委员。一九三九年八、九月间，调任八路军先遣纵队政治委员。在先遣纵队时，李聚奎司令员和肖永智同志相处很好，互相尊重，没有隔阂。肖永智同志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富有经验。担任过团政治处主任，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政治部主任。中国工农红军改编八路军后，叶成焕、肖永智分别担任卓有战功的七七二团的团长、政委。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一元化领导后，新八旅和军分区合并，肖永智同志任地委书记兼分区政治委员。他对地方工作不太熟悉。但是，他非常虚心，善于集思广益，尊重地方党政和军分区的领导干部，倾听他们的意见，各方面团结一致，工作开展得很顺利。有时讨论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肖永智同志非常沉静，耐心引导大家各抒己见，互相了解、交换意见，切蹉琢磨，反复酝酿，终于取得一致的意见。三分区专员孟

夫唐说，这样年轻，竟有这样的水平和才能，有如此高超的见解，实在令人敬佩。肖永智同志是一个少有的人才，一个有威信、有才干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干部，优秀的共产党员。

肖永智同志智勇双全、英勇善战、沉着果断、战绩卓著。工农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在山城堡的战斗（内战的最后一仗）中，军事指挥员不是负伤就是牺牲了。作为政治委员的肖永智同志在非常险恶的情势下，奋起指挥战斗，坚决击退敌人，他也负了伤。他有胆有识、机动灵活、足智多谋。一九三八年一月，上级派他到晋南带回新参军的战士。驻泌源的国民党部队是川军王铭章部。王在川北，尤其是在旺苍坝时，曾遭受过红军的痛击。肖永智同志到达该地时，主动去王铭章的师部联系。师部的门卫看不起他，不予理睬。肖永智同志当即晓以抗战的大义，使国民党士兵很是敬佩。王请他进去后，他又做了许多工作，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当王了解到肖参加过痛击王铭章战斗时，他两个叙起往事来。王铭章讲了些红军像神兵天将一样的传说。后来，双方的士兵相遇，也要攀谈一番。又如彭城的遇袭战斗，由于肖永智同志及时地亲临指挥而转危为安。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一日，七七二团驻扎在平汉铁路西侧的彭城。早晨，细雨蒙蒙。团政治处主任卢仁灿同志听到愈来愈密的枪声自西南方向传来，到街上又看到老百姓惊慌地奔跑。卢仁灿顺着枪声传来的方向大步赶去，发现是敌人来袭。袭击的地点正是团直属部队和工兵连、炮兵连的驻地，难怪一度发生惊慌。可是肖政委早已到达，泰然地指挥部队抵抗，掩护直属部队转移。同时亲自带领一排工兵跑步占领村后山坡，用猛

烈的火力封锁住西街口，等部队上来后，打退了敌人，转危为安。一九四〇年六月^①，先遣，筑先两个纵队合并为一二九师新八旅，肖永智同志任政治委员，他随七团和五大队在荏平、博平一带活动。当时，这支部队创建不久，缺乏战斗经验和严格的训练。有一次过卫河，天冷，水面结了薄冰，不好徒涉，部队在河边停着，人喊马叫，嚷嚷成一团。肖永智同志赶到，问大家为什么不过河？有的说，水凉，有的说不知道水有多深。肖永智同志说，天冷当然水凉。我来试试。他把衣服一整，就下了水，水到大腿。他说，这条路线能过，河床也平坦。部队就跟上顺利地通过了。一九四一年，肖永智同志在北方局学习完毕，从太行山回冀南，夜过平汉铁路。这次过封锁线是由新八旅掩护一批干部和物资强行通过。新八旅布置了两个团的兵力在铁路两端顶住敌人，炸毁了铁轨路基，打穿了封锁沟，拆开了封锁墙。疯狂的敌人从两面夹击，几次冲锋，把通道挤得很窄狭，过路人员拥挤在一起，有的负了伤。正在这紧急时刻，肖永智同志站在路轨中间，指挥大家有秩序地通过。过铁路后，又遭到敌人截击，激战几个回合，安全转移。一九四一年秋，攻打莘县二区小杜家，一晚上连打四个据点。据点外壕沟里的水三尺多深。肖永智同志带头下水，搭云梯上寨墙，亲手捉住俘虏。有一次，肖永智同志负伤，在老乡家休养。当时，部队的医院分散在有工作基础的村庄里，伤员安置在可靠的农民家里。肖永智同志听到我们的部队在附近打上了，就拄着拐棍来了。干部、战士劝他回去好好休息，他说，我能走一走，

^①一说是五月。

听见枪响就想来看看。他听了汇报的情况，又亲自做了观察以后说，我们冲一下，敌人就垮了。部队的干部也这样看，就指挥部队冲杀过去，一下子就把敌人打垮了。他有丰富的战斗经验，能够正确地分析和判断敌情，得心应手地指挥战斗，每战辄胜，因而指战员们都很信赖他。平大路西是我们三分区的腹心地区，也是穿过平汉铁路和太行山根据地之间的交通要道。一九四二年以后，日寇几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凶恶地进行“蚕食”，敌伪碉堡林立，斗争尖锐残酷。肖永智同志带领小部队胜利地坚持和开展了对敌斗争，保证了和太行山领导机关的交通联系，在几次反“扫荡”、反“铁壁合围”中，他多次负伤。腿部的伤损及筋骨，使他不能快步行走了。即使他身负重伤仍然坚持指挥战斗，不下火线。肖永智同志在部队里有威信，打仗有把握，战士们听说他来了，劲头就上来了，战斗情绪为之高涨。他身先士卒，也起了很好的表率 and 模范作用。有人赞誉地说，肖政委“作战赛猛虎，待人如处女”，这是群众对他的评价，确实如此。新八旅主要是在卫河以西、邯郸以东的地区活动。为了开辟卫河以东，莘县、冠县、聊城、阳谷、寿张一带的工作，要拔除盘踞阳谷一带伪军齐子修的据点，肖政委接受命令后带领骑兵团远距离奔袭。他征求意见后作了认真的考虑，毅然决定白天穿过敌占区。沿途据点上的敌伪看到这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吓得关门闭户不敢出来，眼巴巴地看着我五百余骑兵部队一溜烟地通过了。他们准时到达阳谷县指定地点，把马匹安排好，部队运动到阳谷城下。城上的伪军发现我军“从天而降”，慌忙射击堵截我军前进。肖政委

跑在部队前头，拔出左轮枪，大喊一声，同志们，跟我来，冲啊！伪军闻风丧胆，纷纷逃窜，我部队一举冲进城里。日寇闻讯急出动兵马来援，我随即转移，待机予以打击。肖永智同志到新八旅后，听说过去在吕洞崮突围中，部队受过损失。肖政委认真进行了分析研究，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当时，敌寇采取“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战术。我发现敌情后，应就地突围，不要往根据地中心跑。因为，敌人的包围圈正逐渐合拢，兵力尚未集中，容易打开缺口突围冲出。如果往根据地中心跑，则适得其反而陷于敌人重重包围中，增加了突围的困难。在吕洞崮突围战中，我们部队发扬了英勇顽强的革命传统，坚持一天战斗，夜晚突围而出。但是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是，遭遇敌人合击时，应及时跳出包围圈，转入外线作战。后来这样做了，就顺利地完成了突围任务。那是在肥乡一带活动，天刚拂晓就发现敌情，肖政委立即组织部队突围。这时，枪声四起，弹片纷飞。肖政委站在交通沟沿上指挥部队突围，首先叫旅直属部队转移出去。旅政治部组织科长李福尧同志过来了，感到肖政委的危险，把他从交通沟上拉了下来，和大家一齐安全突围出去。

肖政委的这些事迹在部队里传为佳话，深受指战员的敬佩，成为部队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楷模，指战员学习的榜样，肖政委的威望更高了。

肖永智同志原则性强，是非明确，多谋善断，密切联系群众，从不以领导者自居而自以为是。他不耻下问，常常求教于其他同志，也常指名叫某某同志讲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情。旅军法处长张升同志是一个博学多才的“秀才”，能写

会画。一九三八年在聊城政治部时，常和抗战移动剧团一起写标语、画宣传画。肖政委常听张升同志讲历史故事。有一次讲了秦始皇修长城抵御匈奴入侵和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肖政委说，秦始皇修长城，劳民伤财，搞得妻离子散，民不聊生，不得人心。孟姜女哭长城是传说，可是像她这样遭遇的妇女何止孟姜女一个人呢？当讲到秦始皇焚书坑儒时，肖政委感慨地说，我在红四方面军时，因为认识几个字，张国焘搞“肃反”，也被关押起来。后来有的同志说我太小，才释放出来，不然，也被杀害了，今天也不能和大家坐在一起了。要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干革命，不能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没有马列主义，干革命离不开知识分子。

在一次行军作战中，肖政委看见警卫连关押着十几名犯人，影响部队的行动和战斗力。肖政委命令张升同志到达驻地后立即处理，不要拖累部队和分散兵力而影响打仗。张升同志不顾疲劳，立即紧张地处理完毕，得到肖政委的表扬。肖政委是非观点明确，奖惩分明，他的表扬和批评都是爱护同志，为了工作，为了战争。在肖政委领导下工作，心情是舒畅的，精神是愉快的。肖永智同志可亲可敬之处就在这儿。

肖永智同志来自工农群众，成长在群众之中，他一貫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处处想着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深受群众的爱戴和拥护。工农红军创立川陕苏维埃根据地时，肖永智同志在红三十一军担任宣传队长。宣传队的任务主要是深入边缘山区，协助地方苏维埃政府，宣传红军主张，扩大红军队伍，发动群众，打土豪，分土地，组织地方武装，配合红军主力作战，建立和巩固乡村苏维埃政权。

宣传队里有来自鄂、豫、皖、川的老同志和新队员。最大的三十多岁，最小的不过十四、五岁。正象陈赓同志常说，刚从娘肚子里出来，学会跑就跟着红军跑到四川了。宣传队员每人一支马枪或一把马刀，一支用棕片扎成的笔或者一个小铁桶。这支年轻的队伍走遍了通、南、巴、广、旺五个县的许多山区。他们“集中起来打反动，分散乡村搞宣传”。每到一地就张贴标语布告，在石崖、牌坊上镌刻“打倒田颂尧”“打倒邓锡庚”、“解放全四川”的标语口号。全国胜利后，有的红军老同志返回通、南、巴老根据地时，看到这些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标语口号仍然保存完好地历历在目。宣传队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动员苦大仇深的贫雇农、“五匠”带头建立苏维埃政权，把土豪劣绅的土地、财物分配给穷人，组织群众团体和赤卫队。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地方，宣传队主要是进行调查研究，帮助地方发展党群组织，清除坏人，组织群众生产支援红军。宣传队的流动性大，生活十分艰苦，到偏僻山区去还要自己背上乾粮，夜宿石岩、山林，还要站岗放哨。新队员不会打草鞋，走不来崎岖山路，更不会宣传和组织群众。肖永智同志从不以队长自居，总是以身作则处处带头，耐心帮助新队员。晚上和大家一齐念文件，读《红光报》，讲述鄂豫皖苏区的革命历史和粉碎国民党大军“围剿”的经验教训，使大家深刻地懂得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对于支援红军、打击敌人的重大意义。大家情绪很高，再苦也不怕，再累也不嫌。宣传队既是一个工作队，又是同土豪劣绅进行斗争的战斗队。新开辟的山区，群众不敢起来斗地主，宣传队就给干部和群众撑腰，工作很快

开展起来。宣传队深受群众欢迎，走到那里，那里的群众纷纷前来慰劳红军，送粮，送肉、送鞋袜支援红军。在近两年的工作里，向红军输送了上千名新战士。在粉碎国民党蒋介石五次“围剿”中，红军收缩阵地，转移到山区，到处有粮食供应，群众给红军送情报。红军所到之处，都受到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宣传队的工作给红军打下了群众基础。红军得以进则攻，退能守，赢得了对敌斗争的胜利。宣传队人数不多，可是影响蛮大，这都和肖永智同志领导的好是分不开的。

一九三八年五月，七七二团在河北彭城的遇袭战斗中，我特务连连长简国湘腹部受重伤，不省人事。有的同志以为简连长牺牲，想就地掩埋。恰好肖政委在旁边，非常悲痛地大声制止，他说，“死了也要抬回去！”第二天，简连长慢慢地甦醒过来，恢复了知觉，经过治疗，半年后全愈了，重新回部队担任原职。肖政委处处关心和爱护同志，要不是这一句话，险些儿葬送了简连长的性命！

有一次，新八旅召开大会，肖政委讲到密切军民关系整顿纪律的问题。他说，“我们八路军是扛起枪的农民，农民是扛锄头的八路军，我们打日本鬼子是为了老百姓。农民种田生产粮食，是为了我们，为了国家。现在行起军来，踏坏庄稼。住下来，马啃树皮，这还了得嘛！”肖政委说到做到，率先执行，督促检查。以后各团、营、连分别向连队进行教育，检查纪律，于是部队住在群众家里，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水缸里打满清水，借物送还，损坏赔偿，三大注意八项纪律得到认真地落实和执行。肖政委带头做了，其它旅首长也都认真执行。军爱民、民拥军的热潮蓬勃兴起。

百团大战以后，新八旅军法处处决一个临阵脱逃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的连长。一位旅首长硬要把另一个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拉到刑场上去陪绑。当即被旅组织科长李福尧同志发现制止。肖政委当即表示，李福尧同志做得对。肖政委这种铁面无私，坚持原则的精神，确实令人敬佩，也教育干部注意克服军阀主义残余。

肖永智同志思想敏锐，看问题深刻透彻，多谋善断，善于分析研究问题，处理问题明快周全，善于关怀和教育干部，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因而和他一道工作的干部和认识他的群众都很尊重他，敬佩他，至今缅怀不忘。长征途中的地方干部和群众常常打听肖永智同志。

肖永智同志思想开朗，诚恳热情，平易近人，雷厉风行。这一位高高的个儿，白净面皮，脸蛋儿挺丰满还有点嫩，看上去还有点胖，叫人看着就觉得和蔼可亲。他的绑腿打得紧紧的，腰间扎着一根小皮带，挎着一支左轮手枪。可是他那忠实敦厚的形象，倒是象一个斯斯文文的学者、书生，真不愧是人们所称赞的少年英俊。他的身体健壮，体质结实，负过几次伤，没有很大影响他的身体健康，只有腿骨受伤，行动不方便。他的头脑清楚，敏于判断，作事决心大，说干就干，言行一致，说到那，作到那，从不拖泥带水。勇敢，坚决，有魄力，不怕困难，有些别人办不成的事，他可以想办法办成。他和群众关系好，作风朴实，平易近人，有说有笑，谈笑风生，笑起来还有些稚气。初来先遣纵队时，穿一身旧军衣，行军时和大家一块步行。走起路来，雄赳赳、气昂昂的一副威武劲头。谈话时和蔼可亲，笑声朗

朗，没有官架子，给人以革命同志的亲切感。如果不是他那一口的湖北话，谁也看不出他是纵队的政委来。他很有口才，口齿清晰，善于讲话，不打官腔，有啥说啥，单刀直入，直来直往，简明扼要，干脆利落，干部和战士都爱听他讲话，易懂，易记，也易做。在先纵活动的地区，广大群众都认识李聚奎司令员和肖永智政委。有时夜间叫门，群众一下子分辨不清，等两位南方口音的首长一说话，老乡就热情地开门接待。肖永智同志为人天真、活泼、愉快、爽朗，举止行动象个学生。可是，青年学生没有他这样老练。肖永智同志对自己、对同志要求严格，军风纪很严特别是严格要求直属机关的同志，强调领导机关要有优良作风，要起表率作用，他自己是身体力行的。他经常注意教育干部和战士，他能体贴别人的困难，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百团大战时，肖永智同志因事未能参加。他把未参加作战的人员集中起来上政治课。他和大家漫谈，讲红军长征的故事。讲得津津有味、生动活泼，饲养员、炊事员，特别是宣传员都爱听，在说说笑笑中，就进行了革命传统教育。

最使人悲痛的是上级已经决定调肖永智同志去学习。在打了一个胜仗准备转移时，遭到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二十二旅肖建国部勾结日寇的突然袭击，在战斗中，肖永智同志牺牲在山东省清平县陈官营（现属临清县）。冀南军区四分区政治部主任袁鸿化同志（一九二七年入党，一九三四年参加工农红军，陕西高陵人）同时牺牲。一九五〇年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建成后，肖永智、袁鸿化同志的遗体移葬在陵园。一九五四年三月陵园为肖永智同志立的墓碑碑文是：

肖政委湖北黄安人，十五岁参加红军，一九三二年加入共产党。历任宣传科长、共青团委书记、师政治部主任、新八旅政委、冀南三分区、七分区政委。为部队中少年优秀干部。一九四三年六月在山东清平县陈官营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二十八岁。冀南军民改清平县为永智县以示纪念。

（本文包括王波、韩正夫、张昇同志提供的材料，特此注明。）

一九八三年四月于北京

怀念宁都兵暴的发起人

刘振亚同志

袁血卒

刘振亚同志领导宁都兵暴那年，不过二十二、三岁，依他的家谱记载是宣统三年生人，如果活到今天也是七十三、四岁的老人了。他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县刘垓公社吕堂村，家庭富裕，自幼爱看《水浒》，喜鲁智深一类英雄人物，父亲盼他长大成材，但刘振亚看不惯他父亲收租吃利息的那套作法，颇有抵触，他父亲看到刘振亚不是顺心的儿子，利用家长特权给他娶了个漂亮媳妇，满想过个一年半载，生个孙儿或孙女，这样就把刘振亚缠在家里，达到他“子承父业”的目的。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西北国民革命军正在向打倒奉鲁军的目标前进，威胁到日本侵略者的利益。日本军阀把中国外交官蔡公时绑在电线杆上割掉鼻子，用来威胁反日的中国人。这时冯玉祥先生的部署孙良诚的一个先锋营，刀出鞘，子弹推上膛，威风凛凛，在群众欢呼声中进入了济南日本租界地。这样把依靠日本势力的蒋介石吓坏了，给西北国民革命军以紧急命令，立即停止冲突，也就是要停止一切抗日行为，各大报上头版头条新闻，宣布了蒋介石的声明：“三年以内不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请杀予以谢国人”。以这样的欺骗手段把全国范围内掀起的抗日怒火压了下来，但人民不服，大批青年涌入了西北国民革命军，抗日怒火依然燃

烧在心里，由于北伐军“会师中原入北京”的胜利，张作霖退到关外，东北军打起了“青天白日”的旗子，军阀内部矛盾暂时妥协得到全国统一的局面，实际上割据一方，招兵买马，积草存粮。西北军依靠自己占领的地盘加紧扩军备战。自从“宁汉合作”，西北军清洗共产党以后，逐步恢复了军阀的黑暗统治。在洛阳西官重新集合分散在连队参加北伐的军官学生，校长徐庭瑤日本士官学生，很反动，进攻矛头指向共产党。把杜宗周同志弄到校部上了镣，强行审问，关押个余月，没有找到有关共产党的证据，恢复自由并放在第二大队工兵队任分队长，命令第一大队大队长×××留苏学生组织劳动党，企图以此笼络人心对付共产党。

不久军官学校搬到开封演武厅十八营房，校长换了张自忠，山东临清人，治军严格，以打人著名，外号张扒皮，是位强烈的抗日派，利用家乡关系到了临清地区，招了部分青年学生，刘振亚就在此时考入了西北军官学校。

旧社会是以财产决定人的命运，所谓金钱社会，一般人是视钱如命，有的是舍命不舍财。刘振亚是抛弃富裕家庭，抛弃了娇妻和襁褓中的婴儿，为着抗日救国的目的，加入了全国著名的纪律森严不发薪饷的西北军官学校，编在二大队工兵队，认识了李大钊同志派入西北军秘密工作的共产党员杜宗周（也叫杜一民，后来牺牲在天津，是李运昌同志乐亭中学的同班同学），接受杜的领导。刘振亚同志就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黑暗时期秘密加入了我们共产党，他就由一个抗日爱国的战士转变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

一九三〇年閏，冯反蒋大战失败后，冯玉祥的残部被蒋

介石改编为国民党反动派的二十六军，刘振亚同志编入了七十三旅任上尉参谋，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与党保持着单线联系（刘任二十六路军特支书记），以军官学校同学的身份，广泛联系进步青年。我们这批西北军官学校的学生受过大革命洗礼，受过著名共产党人刘伯坚等同志的熏陶，在军阀眼里确是反动分子。韩复矩投降了蒋介石，蒋介石委任他做了山东省主席。

韩复矩想多杀几个共产党人，以表现他是忠心归顺了蒋家，单说在济宁这个小城市，凡是绑赴“土山”枪毙的“犯人”背上都插着“反动分子”的标志，抗租抗债的是“反动分子”，拦路抢劫的是“反动分子”，不遵守妇道的是“反动分子”，韩复矩与蒋家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在反对共产党这一点上他们有着共同的天然的默契。改编时，他们把掌有实权的军官学生排长、连长以至个别的营长，统统编余下来，编入军官教导团的第四队，住在济宁归韩复矩直接管辖，其用意是显而易明的。二十六路军临开赴江西之前刘振亚来到这个我所在的第四队，与我们取得联系。后来，提起这档危险事，刘振亚说：“在韩复矩的大刀下，大不了脖子上落碗口大个疤”。

我从济宁开小差到了江西宜黄的东坡找到刘振亚拉着手他哈哈笑一阵，走进小饭铺一边豪爽地笑着一边说：“怎么这样快地跑到这地方来了呢？”我把在济宁过元旦时的自由讲话说了一遍。我说：“西北军被老蒋打败了，大家都不服气，当官的不服，当兵的不服，我们军校同学更不服”。刘振亚插嘴说：“我听同学们说过你骂蒋介石是军阀，大家没

意见，骂阎锡山是军阀，大家没意见，你骂冯玉祥是军阀大家接受不了，官们的想法和我们军官学校同学的想法不一样，主要是政治观点不同，象他们自己说的那样大老粗斗大的字识不得两升，管他妈什么国民党什么共产党，有奶就是娘，端蒋家的碗，吃蒋家的饭，就该为蒋家管，跟韩复矩的哲学一样，以反对共产党向蒋介石摇尾乞怜，献媚求荣。”

我向刘振亚说明来意，从济宁一起开小差的八个，各奔前程，但约定谁找到共产党的关系，谁就介绍谁，我就到江西来找你，你这地方有办法吗？

刘振亚咧着大嘴习惯地哈哈大笑说道：“有办法又没有办法”，我来江西摸了摸情况，无论是当官的还是当兵的都对蒋介石有怨气，大战河南的怒火未消，调到江西打红军是蒋介石老小子没有安好心，是想借红军的手来消灭咱们这个二十六路军，大伙都是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的穷苦人，头上没有一片瓦，地上没有一脚泥，与红军无仇无恨，开到江西来剿他妈的什么匪，看到听到的都是江西老表，看他们打倒了土豪，分得了土地，共产党领导他们有吃有穿多幸福，老百姓跟红军一心一意，一见戴‘青天白日’帽徽的叫‘白鬼’”。他说着说着不由地哈哈大笑起来说：“你看这个称呼稀奇不稀奇”。我说：“第一次听到这个新名词”，刘笑着说：“不要稀奇吧，伙计！你戴上这顶帽子你也是白鬼，当然我也是白鬼啦”。江西老表把所有国民党的军队统统叫白鬼。白鬼是抓兵抢粮、强奸妇女、杀人放火的代名词，你看看这个“东坡”吧。

这个东坡是也有百余户人家的圩场，对衬着两排整整齐

齐的瓦房，南方雨多，街道是用鹅卵石镶起来的，路左边是崇高峻岭，右边是湾湾曲曲的溪流，好象怀着深仇大恨的少妇潺潺凄凄地流着，好房屋没有了，有的是被大炮烧后剩下的半截墙头，没有烧尽的梁柱和七歪八倒的没有掩埋的尸体，间或成群的乌鸦从这里突然飞起。

我说“真惨哪”，说到这些刘振亚一反爱说爱笑的常态，咬紧牙关，紧握着拳头骂道：“糙他娘都是白鬼子干的，是蒋介石老小子下命令干的”。他自己慢慢把气压了下去，话锋转回来他说：“光生气有啥用，气是打倒不了蒋介石的，总得想个办法开展工作才好，没有到江西前，我想见到红军给他们作自我介绍就说，我是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我们是同志，象串亲戚样就取得了联系，实际情况复杂多了，那是想象的那么容易，赤白对立完全是两个绝然不同的世界，红区的人跑过来是敌人，白区的人跑过去当然也是敌人，两军对战，戒备森严，谁也不允许对方的人钻进自己的防线里来，假使钻进对方管辖的地区，必须事先准备适应对方生活的一切条件，才能生存下来，就是我们到苏区去了，脸上没有写共产党字样，单凭一颗革命的红心，红军是不会相信的，说不定送到国家保卫局受审，扯不清的皮，说不清的嫌疑那才糟糕哪”。我点点头说不出什么，刘振亚他接着说：“万一敌人要向红军进攻了，这就给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提出难题，是跟敌前进冲锋陷阵呢？还是在红军的枪口之前做一个不明不白的冤死鬼呢？或是举手交枪向红军投降，领三块白洋的路费，做名‘光荣’的俘虏呢？要是这条路那条路都走不通，为了避免无意义的牺牲，那就只好装病，为

要装得像，吃点巴豆，上吐下泻，病倒床上送到后方，要不就开小差，脱离战场；这样比到反革命的前线送死强得多，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太消极了，如果这样敌人有几百万军队，怎么能达到掉转枪口或瓦解敌人的目的呢？这样想，那样想，想得睡不着觉，睡不着还是想，想不出个好办法，你看我脸都想瘦了，还是想呀想的，我看没有党组织的领导，个人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你来得正好呀”，他把说话的口气缓和下来，商量的说道：“你是不是回开封找组织关系去？”我说：“我开封没有熟人，没有组织关系”。刘振亚说：“我给你组织关系到开封去吧，就说我叫你去的，陈立他是机关枪队的学生，你认识吗？他的嫂子是位漂亮的医术专科学校的学生，在那里搞交通站，就说我叫你找他去的，事不宜迟，说定了就这么办”。他两只圆圆大眼放着希望的异彩，亲切地望着我，同时也洞察我的困难，毫不犹豫地从他腰包里掏出二十元崭新的钞票，“辛苦点，路上勉强够用了，这是我从蒋家手中领得的第一次薪饷”。

再见不是预计的地点，而是南京的下关码头，老年人都记得这个在蒋家王朝鼻子底下的下关，三十年代是多么凄惨，又是多么紧张，远望田野一片金黄，正是三月好风光，但码头上堆满了军用物资，都是运往江西的枪炮弹药，准备进攻红军用的，常住南京的人有这个经验，军运吃紧时河内扣留民用船只，逢场赶会时，突然宣布戒严，不管三七二十一抓来大批人，关在仓库里或关在大院里，年轻力壮的补兵，胡子长的，瞎眼跛脚的，拉来做搬运夫或者做挑夫，搬货上船。正值战云密布，蒋介石准备大举进犯红军的时候，

刘振亚向董振堂请假，离开了“剿赤”的前线，拟到上海找刘伯坚，找共产党的关系路过南京，恰好我与王超、李肃同志三人离开上海来到南京，在下关幸遇。商定都不走了，寄宿“江南一枝春”旅馆。刘振亚圆睁大眼哈哈不停，兴奋起来话就多了，他说：“你走的那天晚上南昌行营命令二十六路军快速进入准备进攻阵地，我的心急的像火烧，赶紧跑来找你们”。大伙听了他的话都紧张起来，他说兵们还是蒙在鼓里，当官的有知道情况，三三两两议论纷纷，各打各的牌，各做各的梦。

叫来“茶房”买了“竹签”打来开水，刘振亚倒了满碗喝了一口骂一声“糙他娘好烫呀”，吹口气又喝了一口，继续说道“最担心的最难斗的是七十四旅的官们，团长都是日本士官留学生，我给你算算吧，一团长黄中岳是日本士官生，二团长刘毓琪是日本士官生，一团的苏进、二团的吴子涵（即吴以容），老袁你在辎重队，张思育、吴子涵都给你兼过课吧，这是冯玉祥与共产党分手以后，学习日本军国主义，依靠这把子日本士官留学生来掌握他的军队，旅长季振同是他亲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亲信，他们这一伙，客观上是反对蒋介石的，与红军没有仇恨，但有恐惧心，他们暗中与冯玉祥先生联系。

赵博生、董振堂还有卞章五是保定军官讲武堂的，他们是反对蒋介石的，七十四旅趾高气扬，瞧不起他们，他们严守西北军的“爱国家不扰民”的教导，不克扣军饷，不打骂士兵，但对七十四旅的骄横不满意，为着面子勉强过得去。行武出身的官们营团长不算少数，以大老粗自豪“咱们是枪杆里出来的，拿起枪来再跟老蒋干一火不定谁死在谁手里”，

大多数出身贫贱对红军有好感，剩下来就是我们军官学校同学这一伙了，都是下级军官，其中最大的有当营副的，学过军事有些文化是块“香饽饽”大家争着拉拢，因为二十六路军的前身是西北军受过大革命洗礼，从上到下对共产党留着好影响，不少人亲眼见过共产党人，听过共产党人的声音，特别是总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同志他的形像是大家伙希望的象征。

北方人到了江西大多数水土不服，拉肚子的较多，打摆子的特别多，很少有人没有打过摆子的，大家都朦胧着找新的出路，要求回北方是多数人的思想，王起同志插了一句话：“从政治上看二十六路军像堆柴禾堆在炸药包上，堆在蒋介石‘剿赤’的前线。”李肃翘着上颚操山东腔“奶奶，我们给它放把火吧。”刘振亚哈哈大笑眼睁得圆圆的“好！让我们把它们领向光明！”

“九一八”日寇侵略的铁蹄踏进了我们的东三省，民族危机加深了，全国掀起了抗日高潮，这就把二十六路军积压的革命怒火集中的推到反对日本侵略的高潮上来了。

刘振亚同志当机立断，要我到红军总司令部请示，我说：“与赵博生同志商量一下吧”。他断然地说：“不！紧要关头这件事由我两个决定吧，事后再告诉王明武同志”为的严守机密，这时他才告诉我接头的口号是“朱瑞叫我来的”。当我从苏区返回宁都向他汇报了红军总司令部对暴动的指示后，刘振亚立即表示说：“争取实现全部暴动的方案”。“我觉得说服赵博生容易些”，刘振亚不等我说完他抢着说：“董振堂也是可以说服的，总指挥这个有决定性职位一定让给季振同，新领来的饷款虽是大笔财富，也要让季

振同有支配的主动权”。当准备开“扩大会议”时，刘振亚断然说：“我不参加，为了使暴动前不露形迹，我带着我这个独立排保持与苏区的交通联系，万一失败这是保证安全撤退的重要环节，由你与李青云、赵博生商量，请董振堂参加。虽说董还不是党员，这样信任他，对争取全部胜利有好处……”。

我们尊重了刘振亚这些意见，我们胜利了，我们当红军了，而且我们分别当了红色指挥员。革命斗志高昂，陕北话说“热火朝天”。在反“五次围剿”的前线，我与刘振亚同志又见面了。他在广昌前线担任警备司令，这次见面有个很大不同的印象是他老练多了，无休止地哈哈大笑变了，微微的笑脸也是很有节奏的，该笑的时候才笑，也可能是在前线的缘故，他说：……我有点想不通，毛主席说得清清楚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吗，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这有多主动，指挥员赢得战争的主动权是取得胜利的关键，现在可好，山头对山头，碉堡对碉堡，敌人的碉堡钢筋水泥，我们的碉堡是树桩土坯稻草和稀泥，敌人炮弹落到我们碉堡上大窟窿带小窟窿，房侧几颗杨树炮火打得只剩下几根树桩桩，还要把这些树桩送到前线做碉堡，我们的炸弹丢在敌人碉堡上好象老虎屁股搔痒痒。今天你就住下来吧，我这里有烧鸡有烤鸭，还有烤肉，都是敌炮火打死的，我们给老乡都赔了钱的，要是留下来就拿这些招待你，我还要问你一桩事：

“听说毛主席不指挥军队了，是真的吗？”头几天博古同志领着顾问来到我们前线的，把我们训了一顿，翻译给我说：‘碉堡构筑的不好要加固’，我的马克思主义在天之灵哪，连老表娶媳妇洞房的门板都搬来了，还要加强，拿什么

加呀！见鬼。

“你记得吗，军校战术教员讲专守防御是兵家大忌，可我们现在是死守，有人发明了新的战术原则——短促突击——敌人仗凭他们火力优势，躲在碉堡里，象乌龟样，脑袋缩在肚皮里根本不露头，实行标定射击，机关枪有效射程一千二百米，交叉起来构成扇面形的火网，迫击炮在短距离内是百发百中，再勇敢的战士，再快的速度，再严格的命令，怎么也逃不出火力封锁，“鸟飞不下，兽挺亡群”人变成焦炭，在火海里怎么个突击法，真是洋大人放洋屁，没有中国味，（这几句话不礼貌，但表现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不信请洋大人到前线来试试……”这次爽朗的谈话，没有想到我与刘振亚这是最后一次谈话。他牺牲在长征路上。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光辉照耀下，我们社会主义建设走向了新的时期，我们军队建设走向了新的时期，我们的国际关系也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我想起了我亲密的战友宁都兵暴发起人刘振亚同志，想起他那欢欢的大眼，鼻梁稍有塌陷与他那硕大的鼻头不相配衬的憨厚样儿，想起他无私无畏永远乐观的样儿，深切体会到他的见识比我们远些，他的愿望和毅力比我们强些，但这并不说他是个超人，能阻止和改造客观规律，不是的，完全不是的。而是说他的活动是认识了客观进程的必然性，自觉地自由地掌握它驾驶它，使它变成“俘虏”。对二十六路军这一客观事物的认识是这样的，对组织二十六路军在反动派的“剿赤”前线举行胜利的暴动也是这样的，他的作用全在于此，他的毅力全在于此。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九日

聊城地方党组织

一、二战时期发展演变概况

(一九二五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谢玉琳 吕保明 整理

为了给编写抗日战争以前的聊城地方党史提供资料，根据阳谷、莘县、冠县、临清等县党组织大事记（草稿），部分老同志回忆录和有关资料，整理出《聊城地方党组织一、二战时期发展演变概况》（一九二五——一九三七、七、七）。由于掌握的资料和水平有限，遗漏差误之处在所难免，请了解情况的同志予以补充指正。

一九二五年

本年秋，聊城的省立第二中学学生王寅生（阳谷县安乐镇人）、赵以政（聊城县姚家园子人）、聂子政（聊城县北周店人）、孙大安（莘县后老宅村人）和青年农民田乃武①（高唐县人）等四、五十人奔赴南方，进入广州黄埔军校和农民讲习所受训学习。冬季，王寅生、孙大安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加入共产党。次年，赵以政、聂子政在北伐途中加入共产党。

阳谷：冬季，阳谷县石佛、石门宋、赵家海、大布一带农村，有万余农民为抗粮抗税，夜聚明散，晚出早归，鼓号喧天，连续夜游数天，先后抄袭了小迷魂阵、八里营等村乡绅之家。当年，在日本求学的申仲铭（原名申兰生、阳谷县安乐镇人），在日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脱党）。

临清：张干民（原名张存礼、现名赵文栋，临清县李圈村人）在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加入共青团。

①有的说田乃武是一九二六年去广东农民讲习所。

一九二六年

聊城：二月城西南乡为抗粮运动，由李太黑（现郑家公社五圣庄人）组织带领四、五千农民进逼城下。李太黑一辆车被骗进城后杀害，未进城的农民自散回乡，遂告失败。下半年，聊城省立三师学生张廷焕（原名张文玉，原清平县马张庄村人）在济南开会时由济南省立第一师范李思孝（夏津县人）介绍加入共产党。张返校后与李建华（夏津珠泉石人，后脱党）晋驼（又名刘月舟、刘荫昌夏津人，后脱党）刘维鲁（夏津人）等人发展党、团组织。次年春发展宋占一（聊城人）入党，发展黄惠文、许先登（后叛变）、李晋卿等入团。次年夏秋党、团员发展至五十多人。

阳谷：秋季，王寅生奉黄埔军校党组织指示，回山东从事发展党的组织工作，在济南王与关向应介绍杨耕心（又名杨一斋、阳谷县九都杨村人）加入共产党。王又在阳谷安乐镇介绍朱华亭（女，又名朱庆荣）加入共产党（后脱党）。八月，县城北部有五万余农民，为抗捐抗税，围城十多日。

同时，杨耕心在九都杨、宋堤口、郭店屯、邵楼一带组织农民协会。冬季，杨耕心在九都杨办农民政治夜校，王寅生常来夜校讲演。是年寒假，杨耕心在九都杨发展党员三、四人，并建立中共阳谷县九都杨支部。

临清：夏季，张干民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后脱党）。暑假，张干民介绍赵儒昌（又名赵亮，临清县人）加入共青团。十月，张干民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

高唐：秋季，金谷兰（高唐县谷官屯村人）由杨笙甫介绍加入共产党。金入党后在高唐县城北谷官屯一带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团。

冠县：元月建立冠县共青团组织，负责人齐耀蕴，有团员六人。七月，建立冠县儿童团，有团员二十人。

朝城：红枪会和贫农，为反抗当地驻军的压迫举行暴动。

一九二七年

国民党汪精卫政府“七一五”叛变革命以后，在南方工作、学习的共产党员王寅生、赵以政、聂子政、孙大安、申仲铭等根据党的指示返回鲁西地区，从事党的建设和农运工作。首先与省立三师的党员取得联系，并在聊城省立二中、三师积极发展党团员四、五十人，并建立党团支部。在聊城北周店、博平袁楼，阳谷郭店屯组织农民协会。十月中旬，省委派团省委秘书长张干民来聊城，建立中共鲁西（又名东昌）县委，张干民任县委书记，王寅生为宣传委员，赵以政为组织委员，聂子政为军事委员，袁果为青年农运委员。鲁西县委辖：聊城、阳谷、博平、临清、东阿、莘县、东平等

县。冬季，增补宋占一、杨耕心为鲁西县委委员（有的材料提到郭庆江也是委员）。

聊城：本年二月在济南高中读书的傅弼菴（聊城县人），加入共产党。秋季，聂子政在北周店一带发展党员数人，其中有苏连景（西苏庄人，后脱党）、刘子桂（周庄人）、韩聚奎（韩庄人）吴效珠（焦庄人）苏毅然（波苏庄人）等，并建立北周店党支部。下半年，二中学生王筱湖（阳谷县梨园人）、申怡之（阳谷县安集镇人）等人加入共青团。是年建党团支部三个，全县约有党团员五十多人。

堂邑：本年下半年在凤凰集和张庄、关帝庙一带农村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起党支部。

博平：二月郭庆江（博平袁楼人）在济南由杨耕心介绍加入共产党（后脱党）。七月，郭庆江从济南回到袁楼家乡，先后介绍青年农民袁果（后脱党）、袁本恒（现名袁寿宸）等人加入共产党，并建立党支部，郭庆江任支部书记，袁果、袁本恒为支部委员。十月，以袁楼党组织为基础，建立博平区委，郭庆江任区委书记，袁本恒为组织委员，袁果为宣传委员。有党员十余人。冬季，成立博平农民协会、共青团、儿童团等组织，有农民协会会员一百多人。

临清：年初李阴荣（临清县李堂村人）、孙荫堂（临清县张堤村人）在省立三师加入共青团。十月，赵儒昌在聊城二中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高唐：上半年金谷兰先后介绍王金习、田乃之、徐馨斋等六、七人加入共产党，冬季，金与来高唐检查工作的省委委员李春荣介绍姜占甲、李玉洪、李金俄、田益三等八人加

入共产党，并建立中共高唐县谷官屯村支部。金谷兰任支部书记，李玉洪、田益三、李金俄等人为支部委员。年底，杨厚吉（高唐县二杨庄村人）在济南加入共产党。是年，高唐共有党员十六人。

阳谷：春夏之间，杨耕心被山东大学附中开除回到阳谷家乡，先后在九都杨、七级、安乐镇发展党员六人。是年，阳谷约有党员十四、五人。

一九二八年

一月十四日（旧历腊月二十二日），鲁西县委通过杨耕心，争取了阳谷县北部绿林武装领袖韩建德、王朝举，接受了我党的政治主张，和聂子政领导的部分农民协会会员举行暴动，占领了勾结地主豪绅、压迫剥削群众的坡里教堂。随后，张干民、王寅生等人进入教堂。当即共同商议将暴动武装组织起来，并继续组织邻近县的暴动。暴动队伍由韩建德任司令，王朝举任副司令，程宗岳任参谋长，聂子政任政治部主任，孙大安任军事部主任，申仲铭、宋占一负责宣传工作，申兼韩建德的秘书，郭庆江负责谍报工作。下设宣传、谍报、民政、总务、财务科和军法处，总指挥（受司令直接领导）等机构和人员。暴动武装发布文告，揭露军阀的黑暗统治，提出开放民权，民选县政府的主张。同时，将教堂储存的粮食分发给贫苦农民。参加这次暴动，并在其中从事工作的党员有：张干民、王寅生、杨耕心、聂子政、孙大安、申仲铭、宋占一、郭庆江、林梦白、袁圣绪、袁敦臣、王筱湖（团员）、曹万年（阳谷县曹庄人）、宋励华、杨保善（阳谷县

九都杨人)、宋子美(阳谷县宋堤口人)等等。坡里暴动对敌人震动很大。一月十八日,东临道尹陆春元调动二十余县的军警团队千余人攻打教堂,军阀张宗昌派军队协助。暴动武装顽强抵抗,打退敌人数次进攻,坚守教堂二十余天,终因寡不抵众,于二月七日午夜有计划地撤出教堂。暴动武装撤至大名一带,在直隶督办褚玉璞和张宗昌军队的镇压下溃散。因暴动失败,党组织暴露,省委为了保存力量,三月间将张千民、王寅生和宋占一、张廷焕调省工作。同时,通知其他同志视其情况暂时隐蔽或外出。张千民调省工作后,由赵以政代理鲁西县委书记(也决定让他离家)。此时,杨耕心、聂子政、申仲铭相继外出。五月,省委派马守愚来鲁西,在原堂邑县凤凰集改组了鲁西县委,由农民党员林梦白任县委书记,袁本恒为组织委员,郭庆江为宣传委员,赵以政、孙大安、宋占一、袁平之为县委委员。县委改组后,县委派郭庆江去省委汇报,数月未归(留省委工作);派袁本恒去聊城、堂邑、莘县、阳谷等地找基层党组织,也均未联系上。六月八日,赵以政被捕,十九日被敌杀害。八月,郭庆江、袁果先后被捕,出狱后外出。秋末,县委派袁本恒去省委汇报请示工作,省委指示鲁西县委:今后活动采取秘密方式,不要公开,单线领导,防止敌人破坏。从此,鲁西县委工作只限于博平袁楼一带,做些地下工作,进行秘密地活动,谨慎地发展党员和农民组织。

高唐:年初金谷兰介绍谷官屯的李长瑞、李金亮、高英利,阎寺村的赵长华,太和庄的靳广东五人加入共产党。二月,金谷兰将“红门”改为“红团”,金自任团长,进行抗捐

抗税、打土豪的宣传。省委派李春荣来高唐谷官屯，加强对这支农民武装的领导，在李春荣、金谷兰的领导下，“红团”镇压了恶霸地主李洪楼和贯匪郭景芳，枪决了作恶多端的盐警。四月，鲁北特委成立，李春荣任书记，金谷兰、李宗鲁（儒）、于赞之、王旭朋、张干民（后派来）为委员。特委机关设在高唐谷官屯，将“红团”改为“农民自卫团”，设立总团部，团长金谷兰，副团长姜占甲、靳兴荣。总团下设一、二两个团，团下设大队。金谷兰兼任第一团团团长，姜占甲、靳兴荣兼任副团长。郑安吉任第二团团团长，许传孟任副团长。各正副团长和七个大队长均有共产党员担任。同时，鲁北特委根据省委指示，决定于五月四日举行暴动。由于暴动日期泄露，在五月四日黎明，敌高唐县警备队和豪绅土匪等武装包围了谷官屯，袭击了特委机关和农民自卫团总部，李春荣、姜占甲等十多人在战斗中牺牲。金谷兰暂时隐藏，其他党员多数外出东北，少数转入地下。六月，省委决定：将鲁北特委改为鲁北特支，由王旭朋、徐新斋、王心岐负责。八月，金谷兰、郭庆江在高唐县城西袁庄被捕，金解往济南（后判刑五年），郭解回博平。

博平：十月有农民协会会员一百二十多人，在县城以西组织农民抗粮抗税运动。是年，博平区委辖支部两个，有党员十多人。

临清：五月敌人通缉张干民、赵儒昌。赵儒昌不久赴河南开封进西北军冯玉祥军校。是年内，成立临清县农民协会，由共产党员沈廷相任会长，刘良臣任武装部长。刘振亚在外地加入共产党。

一九二九年

鲁西县委在春、秋、冬季三次派袁本恒去济南找省委请示汇报工作，因省委内部出了叛徒，省委连续遭受破坏，仅秋天一次在大街上碰见省委的同志，省委的同志当即指示：照以前的指示办，以后省委与你们联系。三〇年，鲁西县委又几次派人去济南一带均未找到省委。从此，鲁西地区党组织和上级党失断联系。鲁西县委所辖党组织除博平袁楼党支部在县委直接领导下活动，其他党组织有的独立活动，有的处于瘫痪，有的党员消极。

聊城：十月王路宾（聊城县王洪木村人）在济南省立第一乡师加入共青团。

临清：李锡友（临清县林园村人）在外地加入共产党。

一九三〇年

聊城：年初王路宾在济南市立第一乡师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是年内省立三师师生中尚有在大革命时期入党、入团的党团员隐蔽下来，但都没有什么大的活动。

清平：七月清平县李圈村青年学生李恩荣在恩县由刘子蔚（又名刘书林、恩县人，平原县中学学生、中共鲁西北临时委员会书记）、郎凤山（恩县人、恩县师范讲习所学生）介绍加入共产党。

阳谷：申云浦（又名申景蕴，阳谷县安乐镇人）考入聊城省立三师初级部八级二班读书。

濮县：徐宾（原名徐洪来，濮县徐庄人）考入濮县、范

县联立乡农简易师范一级读书。

一九三一年

聊城：上半年省立三师党员（个别关系，无党组织）孙芳茜（博平县人）等组织读书会 and 介绍谢鑫鹤（博平县谢天贡村人）加入共青团（下半年转为共产党员）。秋季，刘子蔚根据党的指示考入三师高级师范部七级二班读书，刘入校后即恢复了三师党、团组织。

临清：九月李恩荣考入临清六县联立乡村简易师范学习，李入校后先后介绍李朝杰（又名李魁，清平县小薛楼村人）、高景赐（清平县人）、牛兰桥（临清县人）和临清县城关一高教师柴××加入共产党。十二月，建立临清联立简师党支部，李恩荣任支部书记，李朝杰为组织委员，高景赐为宣传委员。临清联立简师隶属中共鲁北临时委员会（鲁北临时委员会，成立于一九三〇年，书记刘子蔚，组织委员马云祥，宣传委员李振山，地址在平原中学。组织名称是自己命的）。柴保忠（临清县人）在济南正谊中学加入共产党，李光斗（清平县丁马庄村人）在东北义勇军马占山部加入共产党，梁子超（清平县侯寨村人）在东北宁安县中学加入共青团。

十二月，原国民党二十六军，中共特支书记刘振亚发起和参与了震动全国的宁都武装起义。

冠县：任长山（冠县城里人）在外地加入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冠县一高以青年学生赵健民为首，组织学生停课上街游行，宣传抗日，反对蒋介石卖国，号召群众抵制

日货，誓雪国耻。

范县：高庆云（范县北关人）在大名县加入共产党。高入党后根据大名中心县委指示先后介绍本县张景先、李云阁、吕福胜、范在田等人加入共产党，并建立党支部，隶属直南特委大名中心县委。高庆云任支部书记。范县联立简师学生管守律在濮县加入共产党，管在简师先后介绍同学刘培臣、于子元、张诚一、毛修文、马功臣（岑）、王继魁等人加入共产党，并建立范县联立简师党支部，由管守律任支部书记（据徐宾谈：支部书记为张诚一）。

一九三二年

下半年省委派省委组织部负责人田××（章邱县人）来聊城省立三师，经与刘子蔚、孙芳茜、桑艮阳（肥城县人，八年级二班学生）、于清泮等人商议，建立鲁西总支委员会。负责鲁西北地区聊城、临清、寿张等地中等学校党组织的发展建设工作。刘子蔚任书记，桑艮阳为组织委员，孙芳茜为宣传委员，总支设在三师。

堂邑：王乐亭（堂邑县段张庄人）郭庆云（堂邑县人）在聊城省立三师加入共产党，范怀人（堂邑县范寨村人）在外地加入共产党。

阳谷：十月申云浦、盛北光（阳谷县人）在聊城省立三师加入共产党，朱保明（阳谷县安乐镇人），韩子栋（阳谷县韩庄村人）加入共产党。冬季杨耕心从东北返回阳谷家乡，不久去阳谷阿城完小任教。

冠县：四月郭英（冠县朱霍三里庄人）在东北珠河县加

入共产党。秋季，冠县一高领导人压制学生宣传抗日和阅读进步书刊，学生停课两月之久，冯干才、王志浩、孙洪等十六名学生被开除学籍。十一月，赵健民在济南省立第一乡师由姚仲明（东阿县韩堂村人）介绍加入共青团，不久转为共产党员。

范县：是年有党员九人（据邯郸地委党史办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直南党史资料》第一期）。

临清：春末夏初临清联立简师党组织领导学生反对助学金使用不合理，派人去各县教育局交涉，临清国民党当局为此拘役李恩荣、李朝杰等人，后学校强迫李恩荣、李朝杰退学。五月，李恩荣在李圈教书，先后介绍李全仁、李继耀、李文聪等十六人加入共产党，建立李圈党支部，隶属鲁北临时委员会，李恩荣任支部书记，李全仁为组织委员，李继耀为宣传委员。夏季，刘子蔚、李恩荣商议以李圈村党支部为基础，建立清平县委，上报李继水为县委书记，李恩荣为组织委员。初属鲁北临时委员会，当年秋由刘子蔚移交省委组织部负责人田××领导。是年底清平县有党员二十一人。

东阿：姚仲明在济南省立第一乡师加入共产党。

濮县：濮阳党的组织从阳东固发展到濮县。六月（或七月）濮县党组织派人参加两河（即河南、河北）盐民总会成立大会（据邯郸地委党史办一九八三年一月《直南党史资料》第二期）

范县：濮县教育局决定停发濮县在范县联立简师读书学生的助学金。简师党组织二十九人去濮县教育局交涉。取得胜利。（范县党组织隶属大名县委，有党员九人，据邯郸地

委党史办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冀南党史资料》第一期）。

莘县：冯子华（莘县冯庄村人）考入寿张省立第八乡师二级一班学习。

一九三三年

夏，山东省立三师鲁西总支根据省委指示，为配合苏区反围剿斗争，一夜将“中华苏维埃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反对蒋介石投降主义！”等标语贴在聊城城内一切公共场合和驻军住地。同时，组织领导拉水工增资活动。由于二月，团省委书记陈衡舟被捕后叛变，七月，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省委和一些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从此，鲁西党组织与省委第二次失断联系，只好一面独立工作，一面设法和上级党取得联系。

东阿：七月姚仲明利用在东阿县姜楼完小任代课教师机会，进行马克思主义、抗日救亡的宣传，并介绍苏广才（东阿县西程铺村人，现名苏民）王玉珍、尹延（燕）桂、刘万明、赵传耕等人加入共产党，建立了东阿姜楼党支部，苏广才任支部书记。

清平：六月以李圈村党组织为主组织发动附近农民进行麦收暴动未成功，党组织受到一定损失。

临清：九月临清省立十一中学学生党员刘××领导学生反对校长贪污罢课数日，有七十多名学生被开除。

冠县：冠县师范讲习所进步师生成立读书会。青年学生冯干才（冠县朱庄人）、王维群（原名王宪武、冠县王辛村人）考入寿张省立第八乡师读书。

阳谷：申云浦、朱朗霄、盛北光、韩子栋分别在安乐镇、熬盐场、韩庄一带发动农民秋收运动和盐民运动。同时，盛北光在熬盐场一带组织“穷人社”，社员有李金贵、王汝祥、王金印、陈怀科、陈怀林等。

范县：秋，范县党组织根据上级党的指示，为配合苏区反围剿和反对韩复矩派兵进驻濮县、范县，将标语、传单张贴到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军警驻地和大街小巷。是年，高庆云被捕后，国民党县长到简师指名抓于子元、王继魁，王、于被迫离校外逃。

一九三四年

暑假刘子蔚毕业离聊城师范（一九三三年聊城省立三师，改为聊城师范），鲁西总支工作由申云浦、盛北光、陈景文（恩县人、后脱党）负责。聊城师范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两年时间先后发展党员三十几名（刘子蔚介绍）。五月，聊城省立二中学潮延续近两个月，谢惠民、田维新等十八人被开除。

堂邑：二月徐运北（原堂邑人）在济南由赵健民介绍加入共产党。下半年宋鸿恩（又名宋保印，现名宋秋潭，原堂邑县宋月河村人），在聊城师范加入共产党。

冠县：二月赵健民在冠县城内介绍冯干才、钱洪勋（现名钱伯生、冠县城里东街人，冠县师范讲习所学生）、孙洪（原名孙锡恩，冠县梁堂村人，济南商惠学校学生）加入共产党。冬季，冯干才在寿张省立第八乡师介绍王宪武（现名王维群，冠县王辛村人）、时玉泉（冠县庞田村人）、沙延

孝（冠县陶村人）加入共产党。

寿张：春，赵健民来寿张，建立寿张省立第八乡师党支部，王福昌任支部书记。

莘县：六月冯子华在寿张八乡师由赵健民、冯干才介绍加入共产党。

阳谷：一月上级党给杨耕心恢复党的关系。三月，建立阳谷安乐镇中心党支部，杨耕心任支部书记，盛北光为组织委员，翟子超（鱼台县人）为宣传委员，党员有申子君、武子升，隶属鲁西总支委员会，负责阳谷一带党的工作。七月，安乐镇中心支部开会讨论政治形势，并邀请申云浦、韩子栋、朱朗霄参加了会议。秋季，由安乐镇中心党支部组织领导成立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杨耕心为“中坚社”负责人，杨肅负责交通宣传工作。并办一个刊物“中坚”，举办“晨光书社”作为联络点。社员有申云浦、王福昌（一九三六年牺牲）、孙寒光、王筱湖、张冠军（抗日时期牺牲）、段延明、赵尧、郑痴夫、周子厚（病故）、郑继忠等十六、七人。冬季，“中坚社”社员赵风升（已故）、姚修文、王伯谨（已故）等六人，经审查批准为共产党员。是年内上级党组织给王筱湖恢复党的关系。

濮县：六、七月徐洪来（现名徐宾）于范县联立简师毕业时，由同学李旭光（又名李永昶）介绍加入共产党。是年冬徐洪来在徐庄家介绍徐光简、徐临东，徐玉峰、徐光泗、徐洪俊等人加入共产党。并建立濮县徐庄党支部，徐洪来任支部书记。徐光简、徐临东、徐玉峰为支部委员。在徐庄支部的基础上很快地建立北、东、南三个区委，徐庄、古云集、

孙堤口、李桥都建立党支部（徐洪来同志回忆）。

东阿：上半年谭波（原名谭秉岱，现名新斧，东阿谭庄村人）在济南由赵健民、姚仲明介绍加入共产党。夏季，苏广才、刘子明、赵传耕等于姜楼完小毕业回乡，先后在自己家乡西程铺、柳林屯、广粮门和官庄、归德铺等村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支部。

临清：是年郭少英（临清县毗陵村人）在济南加入共产党。八月，临清联立简师党组织通过上海党的关系定期邮购进步书刊和党内文件。

范县：本年于子元、王继魁从外地返回范县做教育工作，介绍教师贾克斌加入共产党。（据邯郸地委党史办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直南党史资料》一期：范县有团员十五人。）

观城：县党组织隶属濮阳中心县委（据邯郸地委党史办八二年十二月《直南党史资料》一期）。

一九三五年

二月六日（农历正月初三）赵健民以给徐运北父亲拜年为名，在堂邑县城里徐运北家里召开寿张八乡师段延明、聊城师范王晋亭（又名王连级）、钱杰东，冠县钱洪勋和徐运北等党员会议，经与会同志协商成立鲁西特委，徐运北任特委书记，钱洪勋为组织部长，申云浦为宣传部长（未到会）。特委辖：冠县、堂邑、聊城、阳谷、寿张、东阿、茌平、博平。特委成立后，徐运北奉赵健民的指示去北京、曹县找党的关系和在济南做联络工作。秋季，徐运北到堂邑柳林武训完小，一方面教书，一方面从事党的工作，

年初，中共北方局为适应革命需要，将直南特委分设冀鲁豫边区特委、冀南特委，临清、范县、莘县、朝城等县党组织归属冀鲁豫边区特委，黎玉任冀鲁豫边区特委书记，王从吾为组织部长，王卓如为宣传部长，陈少敏、张增敬、李段光、刘晏春为委员。

聊城：年初聊城师范党组织负责人申云浦被迫离校回乡，党的工作由王晋亭、郭庆云、钱杰东、宋鸿恩负责。春末，王晋亭被迫离校（到馆陶房儿寨高级小学任教员），由宋鸿恩等人负责。党员有盛北光、李松林、钱杰东、郭庆云、耿荆山、周乐亭、杨序明、任汝舟、耿炜、解长年等十九人。夏初，李松明（原名李相三、共产党员，郛城县人，济南乡师学生，因闹学潮被开除）考入聊城师范。九月二十五日，聊城师范十二个班学生向学校当局提出去南京请愿，罢课数月，学校提前放寒假，破坏学生去南京请愿。

堂邑：二月鲍廷干（原堂邑县鲍海子村人）在堂邑县城里由徐运北介绍加入共产党。

阳谷：年初，申云浦到阳谷县城崇实小学任教。夏季，翟子超回家乡鱼台工作，增补申云浦、朱朗霄为安乐镇中心支部委员。

寿张：八月，寿张乡师党组织以“同学会”名义，与临清十一中、堂邑武训中学和兖州四乡师等组织旅外同学“读书会”。以共同学习为名，团结进步学生，从中培养党员对象。

冠县：二月孙洪介绍王志浩加入共产党。六月，冯干才介绍于龙（于树森）、于树菖、于东鲁加入共产党，并建立

冠县王村党支部，于树菴任支部书记，于龙为组织委员，于东鲁为宣传委员。秋季，沙延孝介绍许梦侠、沙晓鲁加入共产党。何金三（冠县城里西街人）在聊城师范加入共产党。冬季，许梦侠在冠县师范讲习所成立“读书会”。冠县这时共有党员十九人。

临清：七、八月王志浩、沙晓鲁和卞其昌在十一中成立“读书会”。本年内共产党员，红军团长、军作战科长（曾任红军广昌前线警备司令）刘振亚在长征途中病故。

濮县：春，徐洪来调区工作，徐光简接任徐庄村党支部书记（后为徐玉峰）。秋末，徐庄党组织建立三、四人的游击队，徐光泗任队长。同时发展徐洪即、徐耀先等人入党。（据徐宾谈：黎玉同志一九三五年秋天到濮县古云集、徐庄一带工作，常住徐庄，黎玉同志亲自领导了两次“分粮吃大户”的斗争，实际上是打土豪。）十月，徐庄党支部将反对韩复矩派兵驻濮县的标语贴在韩军路过地方。秋冬济南地方党组织负责人赵健民两次来古云集，通过古云集徐庄党的组织先后和直南特委领导人黎玉、刘晏春见面，并谈了山东的党的工作情况，后经黎玉同志回报请示北方局。从此，山东党组织与上级党接上关系。是年，孙堤口裴文英、袁青春（现名袁隆）先后加入共产党，葛楼、南海、张庄等村有了党组织。

范县：上半年范县五个区都有了党员，不少村建起党支部。在下半年一次党的会议上，经过讨论，选于子元为范县工委书记，王继魁为副书记兼作组织工作，金瑞作宣传工作，丁汉三负责交通联络工作。会上也明确了各区委的负责人：一区于庆臣，二区于汉三，三、五区贾克斌，四区王继

魁。旧城以东沿黄一带由王性钦负责（王继绍同志回忆），（另据范县县委党史办八二年《范县党内大事记》：一九三一年建立范县中心县委，一九三五年范县中心县委改范县工委，工委负责人为于子元、于汉三、王心莲）。

东阿：夏，谭秉岱回东阿家乡谭庄从事党的工作。本年内谭庄、韩堂、姜楼、王小楼、耿集等村建起党支部。阳谷县党组织在东阿县南部的葫芦头、狮子宋一带发展了党员。

高唐：八月金谷兰在济南被释放出狱，又开始从事党的活动。

博平：本年，中共博平县委成立，由谢鑫鹤任县委书记。

一九三六年

六月省委决定：将原冀鲁豫边区特委所属的濮县、范县、临清、莘县、朝城等县党组织与寿张八乡师、聊城师范党组织，以及冠县、阳谷、东阿、博平、茌平、堂邑等县党组织合并，成立鲁西北特委。刘晏春任特委书记，徐运北为组织部长，刘仲莹为宣传部长（后为申云浦）。

东阿：二月在韩堂村西头大庙召开党员骨干分子二十多人会议，赵健民参加了会议。会后，赵健民经与苏广才、刘万明、谭秉岱等商议，成立东阿县委，苏广才任县委书记，刘万明为组织委员。县委机关设在姜楼完小的小楼上。县委成员分工包庄做工作，刘万明负责柳林屯一带，何友信（后为秦彦宾）负责大寨一带，谭秉岱负责谭庄一带，苏广才负责上下联系，召集会议。到年底，东阿县有二十多个支部，二十多个个别党员关系，共有党员一百三十多人。

寿张：上半年赵凤升受鲁西北特委委托去寿张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介绍阎龙光(寿张县城东街人)加入共产党。十月，王福昌被捕后解往济南省监狱。冬初中共冠县县委根据鲁西北特委指示派王宪武来寿张恢复省立八乡师党组织，指定时玉泉为八乡师党组织负责人。这年寿张八乡师，共有八个班有六个班建立党小组，共有党员二十多人。

阳谷：冬，申云浦因赤色嫌疑，被辞退崇实小学教师，去幼儿园工作。这一年阳谷籍的高天功、陈鲁、史书成等二十五人在本地和外地加入共产党。

濮县：在濮县陈楼陈绍程家由黎玉同志主持，成立濮县工委，王世希任县委书记。秋季，濮、范、朝三县教师会考试王世希、王登明、陈东生、刘培臣等八人被捕。(据范县工委党史办八二年《范县党史大事记》：一九三四年秋，建立濮县工委，刘茂斋任工委书记，刘培领为组织部长，毛多文为宣传部长。一九三五年建立濮县工委，王世希任县委书记，白玉光为宣传部长)九月：徐庄村建立“白皮红心”的村政权，由党员徐洪袍任村长、村公所管事的十人中有七人是共产党员。是年，孙堤口袁守军(又名袁正平)、王朋成加入共产党。

冠县：夏，刘宴春帮助冠县党组织建立冠县党支部，王维群任支部委员。秋季，刘宴春、刘仲莹在冠县许辛村召开冠县部分党员会议，传达省委指示，建立冠县工委，王维群任工委书记，任玉民为组织委员，冯子华为宣传委员。会后先后建立县师范讲习所支部，许梦侠负责；城里南街支部，钱洪勋负责；城东三里庄支部，朱月桐负责；城北街支

部，朱冠富负责，许辛村支部，王维群负责，共有六、七个支部，有党员近三十人。秋末冬初，刘晏春、刘仲莹在冠县兰沃，许辛村召开县委会议，传达省委决定：冠县工委改为冠县县委，下设三个区委，原工委成员为县委成员。同时，责成冠县县委派人去寿张乡师恢复建立党的组织。会后先后建立城东北许辛村一带为一个区许乃昌任区委书记，钱文奎、卞其昌、李一香（后增补）为委员；城里和三里庄为一个区，朱月桐任书记，许梦侠、朱冠富参加；城南（城里南街）为一个区，钱洪勋任书记。冬初，王维群、钱洪勋、钱文奎等党员教师去聊城六专署受训，在学习过程中成立临时支部，王维群任支部书记。本年又有王登明、郭芳臣、李一香等二十人加入共产党。

堂邑：徐运北、鲍廷干在辛集、鲍海子一带农村介绍卞云如、赵安邦等九人加入共产党。

馆陶：共产党员杨陶夫在三六年发展满登法、郭冠英、李丽、满洪太、满林春、满席光等人为共青团员，并建立团小组。是年十二月，满登法、满席光、满洪太、满林春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同时，又发展满登林、满林胜为共产党员。

茌平：共产党员于州（又名于醒夫）因胶东暴动失败来茌平，以办“读书会”为名进行党的工作。

博平：袁楼党组织发展袁动（博平袁楼村人）、秦希友（博平杜庄人）为共产党员。

范县：冬季，于子元工作调离，由王继魁接任书记，金瑞任副书记兼做组织工作，丁汉三作宣传工作。（据范县县

委党史办八二年《范县党史大事记》：一九三六年建立范县工委，金瑞代理书记。）

聊城：清明节前后聊城师范应届毕业生盛北光、钱杰东、宋鸿恩、郭庆云等去济宁受训，聊城师范党的工作，由任汝舟负责。此年，王学信（齐河县人，共产党员）、贾敦芳（齐河城北后仁里庄人）考入聊城师范。冬季，“双十二事变”后，聊城师范军事教官强行学生庆祝蒋介石“脱险”游行，党组织部署不喊教官的口号，而喊“要求蒋介石遵守诺言，停止内战，立即抗日”等口号。

一九三七年

春末夏初省委根据革命斗争形势发展，工作的需要决定，将鲁西北特委分设两个特委。以冠县、馆陶、茌平、博平、聊城、堂邑、临清、邱县等县组建新的鲁西北特委，范明生（即刘仲莹）为特委书记。以莘县、阳谷以南诸县组建鲁西南特委，刘晏春为特委书记。夏季，范明生在堂邑鲍廷干教书的地方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宣布：王维群为鲁西北特委组织委员兼冠县中心县委书记，分工冠县、馆陶工作，鲍廷干为宣传委员分工聊城、堂邑工作。六、七月鲁西北特委确定王维群、钱洪勋、王晋亭和王的爱人去延安学习，王维群等八月底九月初离鲁西北奔赴延安。

冠县：春，省委指示将冠县县委改为冠县中心县委，辖莘县、堂邑、馆陶三个特区，王维群任中心县委书记，任玉民为组织委员，郭芳臣为宣传委员，县委成员冯子华兼任莘县特区书记，沙延孝任馆陶特区书记（后改工委）、于少畲

任堂邑特区（后改工委）书记。到抗日战争暴发前，冠县约有十七、八个党支部，四、五十个党员。

堂邑：年初在老范（即范明生）领导下成立堂邑特别支部，鲍廷干任特支书记。特支成立后在柳林、辛集、候堙一带小学教师中发展一批党员，同时，在鲍海子发展了七、八名农民党员。春季，成立堂邑特区（不久改为工委），于少畲任特区书记，隶属冠县中心县委。

馆陶：年初聊城师范九级毕业生、共产党员宋鸿恩分到南馆陶乡农学校、周乐亭分在馆陶县北边一个农村小学任教师。沙延孝（共产党员）在房儿寨乡农学校工作。春季，成立馆陶县特支，宋鸿恩任特支书记，王晋亭、沙延孝为特支成员。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在北馆陶、南陶馆、南拐渠的几处高小和县师范讲习所，有我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杨陶天、梁毅民、焦善民、郝连仲、刘春振、季××、李培夫等人，向学生进行抗日救国的教育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等活动。

临清：四月徐运北在临清县城里介绍临清县一高教师李葵元（临清县姚楼村人）、颜竹林（原名颜景隆、临清县颜朱楼村人）、黑若仙（原名黑丽卿，临清城关后关街人）加入共产党。同月，成立临清县特别党支部，李葵元任特支书记，颜竹林为组织委员，黑若仙为宣传委员。四、五月间，黑伯理在清平县乡农学校由申云浦介绍加入共产党。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六年，临清一带有党员二十人左右。

清平：上半年党组织活动以李圈村党支部为主。从一九

三二年到一九三六年李圈、小薛楼、王五营、丁马庄等一带发展农民党员三十一名。

博平：三月，申云浦通过谢鑫鹤到博平教书。该县党组织活动以袁楼支部和谢鑫鹤、申云浦、赵荣锦所教书的村庄为主。博平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六月底，在本地和外地入党（不包括入党后又脱的）的有二十一人。

茌平：春，于州介绍张庆甫加入共产党。此时寿张八乡师毕业生、共产党员段斌三（现名肖鸣）已在茌平琉璃寺乡农学校任教。

高唐：高唐县一、二战时期在本地和外地入党的有二十七人。

东阿：春，何友信暗地参加国民党被清除出党。秦彦宾接任县委宣传部长。东阿县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以前入党的共有九十三人。

阳谷：本年春赵风升在七级、大杨庄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两个党支部。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六年阳谷先后发展了三十六名党员。另据阳谷县委党史办统计：“七·七”抗日战争前阳谷有党支部六、七个，约有党员（包括寿张乡师和在外地入党的）一百三十至一百四十人。

寿张：春，赵风升在寿张发展一批党员，并建立党支部。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六年，寿张乡师有党员二十多人。据阳谷县委党史办统计：寿张抗日战争前入党的党员有三十四人。

聊城：二月贾教芳由任汝舟、王学信介绍加入共产党。五月，中共中央驻山西太原做统战工作的代表彭雪枫应张维

翰之邀来聊城，听取了在山东第六区专署工作的共产党员牛连文和张维翰、赵伊萍的汇报，彭雪枫同志对如何做国民党专员范筑先的统战工作做了指示。彭雪枫在聊城期间恢复了赵伊萍同志党的关系，发展张维翰为共产党员。聊城师范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六年有党员十五到十八人。

莘县：春，建立莘县特区，由中共冠县中心县委成员冯子华兼任特区书记。

附：聊城地区一战、二战时期党员统计表。

聊城地区一战、二战时期党员统计表

数 目	年 度	合 计	县 别										备 注
			合 计	高 唐	莘 县	茌 平	冠 县	聊 城	清 水	阿 城	东 阿	阳 谷	
一 九 二 五	3	3	3	1									
一 九 二 六	6	6	1					2				3	
一 九 二 七	3	3	1	5			9	5				3	
一 九 二 八	5	5	5										
一 九 二 九	3	3			1	1	1						
一 九 三 〇	1	1										1	
一 九 三 一	8	8			1	2		5					
一 九 三 二	2	3				3		1	5	1	5	4	
一 九 三 三	1	3		3				2				2	
一 九 三 四	3	5		3			8		7	2	1	5	
一 九 三 五	2	4		2			1	2		2	8	2	
一 九 三 六	1	5		9	4	3	0	2	1	8	3	5	
一 九 三 七.七.七 前	6	0					1	1	1			2	
合 计	367	6	21	27	30	57	13	42	93	84			

说 明：

(1) 各县统计范围，均为现辖地区。

(2) 《聊城地区一战、二战时期党员统计表》数字，是各县一九八三年五月上报。地区未复核。

(3) 高唐六人，莘县一人，茌平三人，临清五人，阳谷八人合计二十三人。只知是一九三六年底以前入党的，不知入党的具体年、月。聊城十一人，阳谷二十六人，合计三十七人。只填一九三七年入党，不知是“七·七”事变前或后入党的。以上两项党员数字未统计在《聊城地区一战、二战时期党员统计表》之内。聊城师范的党员也未统计在内。

(4) 据赵健民、姚仲明、苏民（原名苏广才）近年所写回忆录，均谈到东阿县一九三六年春，全县有党员一百多人。今年五月东阿县委党史办公室上报一九三四年——一九三六年入党的党员中有八十三人，不知确实入党年月。在统计时，我们将此党员人数，统计在一九三六年内。

中共聊城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中国共产党几个时期党员人数

1921年7月（党的“一大”时）	53人
1922年7月（党的“二大”时）	195人
1923年6月（党的“三大”时）	420人
1925年1月（党的“四大”时）	994人
1927年4月（党的“五大”时）	57,900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	10,000人
1928年6月（党的“六大”时）	40,000人
1931年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时）	120,000人
1934年（红军长征开始前）	300,000人
1937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	40,000人
1940年（抗战初期）	800,000人
1945年4月（党的“七大”时）	1,211,100人
1947年12月（解放战争时期）	2,700,000人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	4,488,000人
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时）	6,500,000人
1956年6月（党的“八大”前）	10,734,000人
1959年夏（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时）	13,500,000人
1961年6月（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	17,000,000人
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时）	35,000,000人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时）	38,923,000人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时）	39,000,000人

